高　昌

CHOTSCHO

普鲁士王家吐鲁番考察队第一次考察重要发现原样影印图录
附考察记述与出土地点描述

〔德〕阿尔伯特·冯·勒柯克　原著

余亦舟　译注·增订

罗　懿　　谭　理　　资料整理与研究协力

原书：柏林　迪特里希·赖默尔书局（恩斯特·福森）　1913 年

中译增订本·卷一

前言 · 行程 · 高昌城与其居民 · 城内与周边的发掘

千佛洞美术馆　×　SOLUM TAIS

二〇二一年

增订本说明

本书是阿尔伯特·冯·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所编《高昌》（Chotscho）的中文全译增订本。原书 1913 年由柏林迪特里希·赖默尔书局刊行，收录第一次普鲁士王家吐鲁番考察队——即德国方面的第二次吐鲁番考察，详见卷内相关按语——所获重要文物的原样影印图版七十五幅——彩色四十五幅、单色三十幅——前冠考察记述、高昌城史论与各出土地点的详细描述。原书作者逝世于 1930 年，其著作权保护期早已届满。

这部书对千佛洞美术馆而言不是一般的西文旧籍。1904 至 1905 年间，勒柯克一行从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的甬道墙上切割运走了那批巨幅誓愿图壁画，运抵柏林后以水泥嵌固于馆墙；1945 年柏林陷落，因无法拆卸转移，其中相当一部分连同馆墙一同化为尘土。原址空空如也，原件大半不存，而它们最完整的形象，保存在这本由带走它们的人所编的书里。我们复原工作的起点，因此不得不是这本书。

既然如此，仅仅把它译出来是不够的。故本次整理在全译之外，做了三件事：

其一，加按。凡涉及今日学界已有修正的论断（如「吐火罗人即月氏之一支」、回鹘入据高昌的年代等）、原书语焉不详而读者易生误会之处（如四次德国考察的编次与经费来源）、以及与本馆复原工作直接相关的段落，均另出【增订者按】加以辨正或补述。原文一律照译，不作更改——原作者的判断是他那个时代的判断，改掉它，便看不出这门学问一百年来走过的路。

其二，配图。自卷二起，凡千佛洞美术馆已完成复原的画面，均与原书图版左右对页并置：左页为勒柯克 1913 年的珂罗版影印，右页为本馆依矿物颜料复原的实物。两者的著录信息分别标明，绝不混淆。

其三，存疑。底本为扫描影印本的文字识别稿，凡字符讹误据德语正字法与上下文径改；确实无法复原之处以〔原文此处漫漶〕标出，绝不臆补。原书脚注以〔原注〕标出，翻译上的技术性说明以〔译注〕标出，本人的考订与发言以【增订者按】标出，三者严格区分。

其余体例：人名、地名、术语首次出现时夹注原文；遗址编号保留原书形态（α 号遗址、K 号遗址群、T^1 号寺院遗址、「俄国人 Z」寺、第 9 号寺院等）；尺寸单位保留原书写法。

文中插图，二〇二一年八月重出一过。原书的插图随文排印，四周即是正文，早先自扫描件截取时，边上的德文正文被一并截入，图与字混杂；此次逐幅重切，只留图形本身与原书随图排印的德文图注，正文的侵入一律除净。重切后计三十三幅，较初版多出六幅——原书第 8 页的书封两件、摩尼教绢画残片、泥制十字形物线描，第 9 页的优楼频螺（Urubilvā）神变摹绘，以及第 17 页的城门与守护神长卷线描：前五幅初版失收，末一幅初版虽已切出而未曾排入。每幅的德文图注均译为中文，另以小字标出出土地点或所属遗址、与该图在原书中的页码，以便复核。

又，遗址编号「T^1」一处，初版依底本 OCR 作「T′」。核原书第 6 页分节标题作 RUINE T^1，上标数字一，非撇号；同例尚有 v^1、u^1 诸号。今全书径改为 T^1，并出此说明。

我们涉足的学术与历史尚有许多空白，本书的整理与判断难免有未尽善处，甚至有误解的部分，欢迎专家学者与热爱丝绸之路文化的朋友指正。

余亦舟　二〇二一年　于杭州

目　次

增订本说明.....
前言.....原书 V
绪论　一、行程.....原书 1
绪论　二、高昌城与其居民.....原书 4
绪论　三、高昌城内的发掘.....原书 6
绪论　四、高昌周边的发掘.....原书 11
附录　专名与体例统一表.....

前言

〔原书 VORWORT，OCR 第 7 页，原书页码 V–VIII〕

本书所呈现的，是以摄影方式制作的图版复制品[v1]，所摄为由我主持的第一次普鲁士王家吐鲁番考察队（Erste Königlich Preußische Turfan-Expedition）各批藏品中最重要的古物。这些藏品中另有一些并不次要的物件——例如齐干湖（Tschyggan Köl）出土的古画——在摄影取像上遇到困难，因而未能影印收入；此外，要把绢画与细密画的全部残片、以及全部小件出土物都在此提供给学界研究，也是办不到的：这类出土品的数量实在太大，本书无法容纳。极其重要而数量众多的写本出土物[v2]，虽然我们有一些重要认识[v3]全赖于它们，本书却不予收录：它们将按其应有的分量，另行以专门出版物刊布，或刊于王家科学院（Kgl.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的会议报告等处。

图版之前，先安排了一篇简短的、带有个人色彩的旅行记述，以及对各处出土地点的描述。此外，考虑到读者对这一地区、它的历史及其文化联系多半不太熟悉，为了给他们对这些重要物件提供一个总体的概观，我在「高昌城及其居民」一节中插入了一篇小文，置于旅行记述与出土地点描述之间；在文中我试图陈述我的看法，这些看法来自：一、我在当地的亲眼所见；二、我们对携回的写本材料所做的研究；三、部分来自汉文与西方文献所传下来的当地历史。

各图版本身都附有详尽的说明。特别是在只能提供单色图片的地方，这些说明因深究种种细节，也许会让人读来生倦。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对这类细节的详细讨论是重要的。

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木头沟（Murtuq）附近柏孜克里克（Bäzäklik）第 9 号寺院甬道中的大幅壁画；然而对这些画面的解释，我不得不放弃，理由很简单：这些图像所描绘的，是迄今尚未考定、或许根本不为人知的本生故事场景。只有其中一幅大画，即第 7 号誓愿图（参见图版二三），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解读（参见该图版的说明文字）；但可以确定的是，所有这些绘画所处理的传说，其中都有释迦牟尼佛的前身诸佛、或佛陀本人在其中扮演角色。

> **【增订者按】** 勒柯克在此坦承他无力解释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甬道中的那批大画，理由是画面所本的传说尚未考定。一百余年之后，这批画的处境比「未能考定」严重得多：它们中的大多数已经不存在了。本书图版一七至二九所影印的十三铺誓愿图，是勒柯克一行从甬道墙上切割运走的成果；1945 年柏林陷落之际，其中相当一部分连同嵌置它们的馆墙一同毁于战火。今日世上关于这些画面最完整、最可靠的实物形象，恰恰保存在这本由带走它们的人所编的书里。
>
> 千佛洞美术馆自 2015 年起复原丝绸之路壁画，第一期计划所选定的对象，正是这条甬道。2019 年 5 月，八幅巨幅誓愿图依其一千年前刚绘成时的宝石矿物色重新出现；同年，四十八块分割画面经扫描、标记、拼合，在一条高 5 米、长 21 米的甬道中复原完成。我们把复原件与本书的原始图版并置刊出（见卷二以下各图版），并非要以今人之作与古人之迹争胜，而是要让读者看清：勒柯克镜头下那些褪成灰白的照片，其本来的颜色是什么样子。

既然关于图像题材的这种不确定性——在摩尼教绘画那里这种不确定丝毫没有减轻——依然存在，我们便把这些以机械方式精确制作的复制品公之于众，供大家共同研究。

在指出了本书的性质与用意之后，这里还应简短地追述一下这次考察的倡议者与赞助者。

两次普鲁士王家吐鲁番考察[v4]——尽管这些科学考察的构想产生于民族学博物馆（Museum für Völkerkunde）——是由柏林大学梵文正教授、枢密顾问 R. 皮舍尔（R. Pischel）博士先生一手促成的。

正是靠他的奔走，才争取到文化部（Kultus-Ministerium）的支持，随后又与后来成立的柏林吐鲁番委员会（Berliner Turfan-Comité）合作，组织起这两次考察。对这位目光远大的学者的无私努力，我要在此首先致谢。

经费（32000 马克）由皇帝陛下从最高特支款项中拨付；考察队的人员由笔者与博物馆职员特奥多尔·巴图斯（Th. Bartus）先生二人组成，后者此前在格伦威德尔—胡特（Grünwedel-Huth）考察队中就已立下卓越功劳。我借此机会怀着感激之情特别指出，巴图斯先生在我这一次考察中同样功绩卓著：他以繁重的劳作把巨幅的蛋彩壁画从寺壁上剥离下来，并以堪称典范的方式包装妥当；在其他各处，他也凭其敏锐的直觉、灵巧的手艺和乐于干活的劲头，把我们的事情办得极好；他与当地人打交道，分寸拿捏得极稳，而且幽默感十足，令人精神一振。

> **【增订者按】** 关于经费，勒柯克此处所记为德皇最高特支金拨付的三万二千马克（后文原注补记为共四万二千马克），这是他本人主持的这一次考察的款项。此前 1902 至 1903 年由格伦威德尔教授与胡特博士率领的第一次柏林吐鲁番考察，经费则主要来自军火巨商克虏伯与若干私人赞助者——本书正文对这一层未加说明，读者易生误会，故为标出。
>
> 又，「第一次」「第二次普鲁士王家吐鲁番考察」是就普鲁士国家正式派遣的次序而言；若以自柏林出发前往吐鲁番的科学考察计，格伦威德尔—胡特一行才是最早的一次。德国方面前后共四次，时在 1902 至 1914 年间。作者在本书原注中已作辨析，此处再申明之，以免与后世著录中的编次相混。

[v1]: 〔原注〕这些图版由柏林 A. 弗里施美术制版公司（A. Frisch, Kunstanstalt, Berlin）制作，完成度极高。至于文中发掘记述部分所载那些较小画迹残片的、借助明箱（camera lucida）绘制的极精确的图稿，我要向画家、以民族学绘图知名的 W. 冯·登·施泰宁（W. von den Steinen）先生致谢。

[v2]: 〔原注〕经由我们三次考察带回柏林的此类编号品，数目当在三万件以上。

[v3]: 〔原注〕例如对摩尼教绘画残片的确认。

[v4]: 〔原注〕「第一次」与「第二次普鲁士王家吐鲁番考察」诚然是按这一先后次序由普鲁士国家派出的；但最早一次从柏林出发前往吐鲁番的科学考察，乃是 1902 年冬由格伦威德尔教授、胡特博士与特奥多尔·巴图斯以几位高层赞助人筹措的经费实施的（参见 A. v. Le Coq：《在中国突厥斯坦的旅行与工作报告》，载《人类学、民族学与史前学杂志》，柏林 1907 年）。

给我这次考察下达的任务中，特别强调了古写本的搜求；起初甚至曾计划把此行完全限于这一目的。不过这个问题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允许考察队长在以搜寻写本为主要任务之外，其次也可从事各类考古物品的采集。

在文化部内，与考察相关的事务由枢密顾问艾尔斯贝格尔（Eilsberger）博士先生经办；他本人对我的工作抱有学术兴趣，总能以对我们有利的方式解决那些往往骤然出现的种种困难：请允许我在此向艾尔斯贝格尔枢密顾问先生表示感谢，谢谢他不知疲倦而卓有成效的关照。

我觉得有义务在此公开致谢的朋友与恩人为数甚多；其中有中国、英国和俄国的官员与军官，有德国和瑞典的传教士，还有几位当地居民。

首先，我要感谢喀什噶尔（Kaschgar）的政务代表（Political Agent，现任英国总领事）乔治·马继业（Geo. Macartney，C. I. E.）先生及其夫人；他们对我的考察队、也对格伦威德尔教授的考察队，给予了数不清的关照和实际的支持，使我永远成为他们感恩的债务人。

我还要向驻喀什噶尔的俄国皇家总领事科洛科洛夫（Kolokolow）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我的考察队和格伦威德尔教授的考察队都以最友好的方式受到过他的款待。

对塔城（Tschugutschaq）的索科夫（Sokoff）领事先生和乌鲁木齐（Urumtschi）的博布罗夫尼科夫（Bobrownikow）领事先生，我也要在此感谢他们的种种美意和有益的建议；我怀着友谊的感激之情，回忆起与乌鲁木齐代理领事、医生科哈诺夫斯基（Kochanowskij）博士先生的交往——他悉心照料那批载着我们工作成果的商队，还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出极大的个人善意，我对他实在感激不尽。

同样，我要向圣彼得堡的**俄国皇家科学院**恭敬致谢，感谢他们为我的货物免税通过俄国境内运输所作的善意斡旋。

喀什噶尔与叶尔羌（Yärkänd）瑞典传教团的成员，也都留在我们所有人极亲切的记忆中；其中尤以喀什噶尔的赫格贝里（Högberg）、博林（Bohlin）、安德森（Anderson）、特恩奎斯特（Törnquist）诸位先生及其夫人，以及叶尔羌的 G. 拉凯特（G. Raquette）博士夫妇，以最友好的方式在言语与行动上给予我们支持。后者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顺带说一句，也是我在全国的外国人当中所遇到的最精通东突厥语的人；正是靠他，我才摆脱了那些迫使我中途折返的病痛，即牙痛和痢疾样的肠胃失调。

在当地人中，我怀着感激之情要提到鲁克沁（Luk-Tschun）与哈密（Qömul）的王，以及吐鲁番的厅（Ting）方大老爷（Fang Ta-Lau-tz），他们始终友善地、有时还相当费心地给予我们支持；平民百姓当中，应当记下哈拉和卓（Qara-Chödscha）的水官（miräb）玛玛西特（Mämäsit）、库车（Kutschä）的阿克萨卡尔哈勒·穆罕默德（Chal Muhammed）、以及我的随从、马尔吉兰（Marghilän）人埃詹·巴尔迪·阿洪（Ecäm-Bärdi Ächon）的效劳——后者在我们这里服务了约一年，在翻越喀喇昆仑（Qara-Qoram）山脉那段艰险行程中，证明自己是一名忠实的仆人。

最后，在旅程终点、拉达克（Ladäkh）的列城（Leh），我得到了赫恩胡特弟兄会（Herrnhuter）传教士彼得（Peter）先生与肖韦（Shawe）博士先生的友谊与照拂；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由于我返回欧洲时，拨给我使用的经费已全部用罄，因此不仅为携回古物的保护与陈列、也为它们的出版，都必须另筹新款。

前一项用途所需的款项，靠文化部的居中斡旋，由王家博物馆总管理处从国库中争取到了；至于本书出版所耗的巨额费用，我们要深深感谢王家博物馆总馆长博德（Bode）阁下的善意斡旋，以及贝斯勒研究所（Baessler-Institut）拨付这笔款项。

最后，我要向王家工艺美术博物馆馆长、教授 O. 里特尔·冯·法尔克（O. Ritter von Falke）博士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正是由于他对东方织物的精深造诣，我才请他在我的织物与刺绣类出土品的刊布上给予帮助；同时也要感谢 M. 埃伯特（M. Ebert）博士先生，他非常热心地承担了处理我在高昌等地所获陶片的辛劳。谨向二位为本书所作的惠赐文稿致谢。

一九一二年十月，于柏林。

A. v. 勒柯克

绪论

一、行程

〔原书 EINLEITUNG · DIE REISE，OCR 第 11–13 页，原书页码 3–7〕

在收到拨给我作为此次考察经费的款项之后——数额为 32000 马克[r1]——我们尽快采买并打包了必需的装备，这项工作我们用了大约八天完成。

考察队于 1904 年 9 月 12 日离开柏林。下一站是圣彼得堡，我们在那里拜会了俄国的院士们，并把我们二人——即笔者及其同伴、技师特奥多尔·巴图斯先生——引见到德国大使馆。此后前往莫斯科，从那里乘西伯利亚铁路的豪华列车，五天抵达鄂木斯克（Omsk）。我们很走运，赶上了抵达当天下午由该地逆流开出的轮船，在额尔齐斯河（Irtysch）上航行五天之后，于 9 月 29 日在最后一个轮船码头塞米巴拉金斯克（Ssemipalatinsk）上岸。在这里必须把装备补齐、并雇好运输，这又花去几天。由于从塞米巴拉金斯克到中国边境是搭乘俄国邮驿旅行的，为免在各驿站上耗时费力地倒换行李，就有必要自置车辆；因此我们买了一辆塔兰塔斯（Tarantass）供我们自己乘坐，另买两辆特列加（Telega）装载我们数量多、分量重的行李。我们偶然遇上一名来自萨马拉（Ssamara）一带的德裔俄国青年，便雇他做仆人；这个年轻农夫并不称职，因为他懒散；不过他懂俄语，这在我们必须穿过的西伯利亚小城镇里对我们大有用处。

尽管我们在情况允许的范围内已尽力赶路，但由于种种事故耽误了从柏林出发的时间，寒冷季节还是比人们所希望的来得更近了；因此我们必须加紧赶路，尽早到达中国边境。我们于 10 月 2 日离开塞米巴拉金斯克，到 10 月 4 日走完了直到谢尔吉奥波尔（Ssergiöpol）的头十个驿站，到 10 月 8 日走完其余十一站。这一天我们宿于俄国边境小镇巴克图（Bachty）；终于在 10 月 9 日抵达中国塔尔巴哈台（Tarbagatai）地区的塔城（Tschugutschaq）。这一段路之所以能走得这样快，只是因为我们——凡是能弄到马的地方——连夜赶路；由于沿途给养只有面包和茶，偶尔还有几个鸡蛋，我们到塔城时已经饿得够呛。在这里编组了前往乌鲁木齐的商队，俄国领事索科夫先生极为友好地帮了忙。在拜访了中国官府并取回护照之后——这又花去很长时间——我们才得以在 10 月 17 日启程前往乌鲁木齐。

可惜特列加对那些相当劣等的马来说装得太重，而中国车夫又不断把这些笨拙的车子弄翻、损坏我们的行李，我不得不在下一站多尔博尔津（Dörböldschin）为我们两个欧洲人买了骑乘用马，把我们的塔兰塔斯改作货车使用。

从多尔博尔津起，道路逐渐上升，进入一片荒凉贫瘠的山地；给养供应极其困难——只有茶和面包——因此当我们越过这条路线上最糟糕的一段、于 10 月 25 日抵达石河（Schi-cho）时，都松了一口气。在这里我们第一次重新吃上热食，客栈（serai）虽然很脏，但对夜里已经相当刺骨的寒冷多少能挡一挡。

我们终于在 11 月 2 日到达位置极为如画的乌鲁木齐城（Urümtschi，迪化）；城北陡崖临河而立的那座小小的中国庙宇红庙子（Hung-miao-dzu），是全国最富浪漫气息的地点之一，有时城名也借用于它。

这段旅程极其辛苦；由于俄国官员再三警告我们提防吉尔吉斯和蒙古强盗，我便把考察队的钱——多半是俄国金币——分装进若干皮制小袋，藏在衣服底下、挂在胸前。可是压迫感实在难以忍受，到第五天我不得不卸下这份重负；这场粗暴而非自愿的「按摩」所留下的后遗症，让我吃了很长时间的苦。不过我们在塔城听说了那么多的杀人放火之徒，最终并未来打扰我们——他们存在的唯一痕迹，是一个吉尔吉斯女人带着两个小孩逃到了其中一个驿站（亚玛图 Yamatu）；她的丈夫头一天刚被强盗打死。

在中国巡抚（Hsün-Fu，抚台）驻节的乌鲁木齐，我们是俄国领事馆的客人。领事馆当时由博布罗夫尼科夫先生主持，后来由科哈诺夫斯基博士先生主持。两位先生对我们关照备至，尤其是博布罗夫尼科夫先生离任之后，科哈诺夫斯基博士先生以最亲切的方式在言语和行动上支持了考察队。在履行了通常的礼节之后——其中抚台设的一次隆重宴席，作为我与浸透着古老文明的中国礼仪的第一次接触，格外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们于 11 月 13 日带着新组的商队离开乌鲁木齐，取道达坂城（Daban-tsching）山口前往吐鲁番。在这条路上、靠近赛约巴（Sai-yo-pa）驿站、达坂城以北，有我在突厥斯坦所注意到的唯一一处史前遗迹：由两块独石和若干冢墓组成[r2]。我们于 11 月 17 日抵达吐鲁番，再走一天，于 11 月 18 日中午到达此行的目的地——阿斯塔那—哈拉和卓（Ästäna—Qara-Chödscha）这一对村落。这是一处由突厥族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组成的现代聚落，紧贴着已毁的古代地方都城高昌（Chotscho，当地名亦都护城 Idiqut-Schähri、达奇亚努斯 Dägiänüs、阿卜苏斯 Apsüs）的北墙。我们在农夫萨乌特（Saut，即 täbit）那栋嵌建在古城墙里的房子里租了住处，随即开始工作。

我们在以下各处进行了工作：（a）高昌城本身；（b）齐干湖；（c）胜金口峡谷（Sängim Aghiz）；（d）木头沟；（e）吐峪沟（Toyoq）；（f）布拉依克（Bulayiq）；（g）小阿萨古城（Kitschik Assa Schähri）；（h）交河（Yär-Gholi）。（对这些发掘的记述，凡与本书有关者，将在相应的标题下陆续叙述；此处先把行程报告讲完。）

高昌的发掘从 11 月一直做到 2 月。格伦威德尔教授曾嘱托我完成若干项专门工作，这些工作的执行带来了大量劳作，可惜没有带来预期的成果。我们主要在「x」号与「」号遗址上施工〔原文此处漫漶：原书此二处为希腊字母遗址编号，OCR 讹误，无从确认〕，此外还搜查了 E、D、「»」、I、「」号诸遗址，以及「y」号附近的大寺院遗址〔以上加引号的编号原文亦漫漶〕，还有一批位于 K 号与「y」号遗址之间成排分布的小型窣堵坡式寺院，结果都极其贫乏。相对收获较好的，是在 K 号、T^1 号遗址，以及城东城外的「俄国人 B」和「俄国人 Z」两处建筑群中的发掘；此外还有城墙外、河东岸、两组窣堵坡以西的那座很可能属于基督教（景教）的寺院建筑。

然而所发现的写本仅有寥寥数件，壁画的收获就数量而言也不多。

在此前不为人知的齐干湖遗址上，我们找到了几幅损毁相当严重、但以较古老风格绘成的壁画。该遗址位于胜金口下峡谷北端附近、木头沟以东；但由于只发现了考古遗物，几乎完全没有写本，我们便把对这些遗址的最终清理推迟到——按照家乡来信所说——即将到来的格伦威德尔教授抵达之后。

到这个时候（2 月）为止，收获并不算丰厚；不过毕竟陆续攒下了 40 只箱子，每只重约 60 公斤，我们得以在 4 月中旬用一支骆驼商队把它们发往塔城的涅日达（Nadjeshda）公司，转运欧洲。

我们在胜金口峡谷的发掘（3 月）成绩略好一些；那里的寺院，我们是按格伦威德尔的编号顺序（《亦都护城》第 117 页）依次清理的。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有意思的考古遗物，并且幸运地还找到了两座寺院藏书的残余；不过大多数寺院曾多次因邻近高地积雪融化而被大量洪水淹没，以致埋在那里的多数珍宝，恐怕在此前的几十年间就已经归于毁灭了。

我们从胜金口峡谷出发（4 月），造访了木头沟河所形成的支谷；在这条谷地的高耸崖岸上、距木头沟村不远处，坐落着今天的居民称为柏孜克里克的那一大片寺院与石窟建筑群。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批被沙土深埋、因而免于毁坏的寺院。我从其中保存最好的一座里，把全部壁画都命人切割下来，尽管格伦威德尔教授曾要求我把这个地点留给他。但是，为博物馆抢救出一批像样的壁画收获是必要的；而当时的消息又使格伦威德尔教授能否成行重新变得可疑，我便毫不迟疑地把这些画确保到我们手里：我对这处建筑群所做的谨慎而不为人察觉的勘查，已使我确信，即便取走了一座寺院的壁画，留给主任的材料仍然极为丰富[r3]。

5 月这个月，大半消耗在费力的包装工作上；在又有 60 只箱子——平均每只约重 230 斤（中国斤）——具备发运条件之后，由于筹措运输工具和当地货币的困难极大，我不得不两次前往乌鲁木齐。所幸我最终弄到了运输工具。由于箱子分量很重，必须装上当地通用的大型两轮车（araba）：其一，这些箱子对骆驼来说太重；其二，这些牲口在炎热的夏月里不会进入吐鲁番洼地。第二次去乌鲁木齐时，我遇到了我们逗留突厥斯坦期间唯一的一场「历险」：在部分居住着东干人（Tunganen）、名声不佳的小城达坂城，夜里有人从街上把我随从歇息的客栈房间墙壁挖穿，抢走了他们的一部分鞍具和衣物。我虽然设法逮住了那个窃贼的马匹和行李，人却让他逃脱了我的追捕。

在第一次去乌鲁木齐期间（6 月），我曾派巴图斯先生前往交河[r4]；第二次（7 月）则派他去布拉依克附近（吐鲁番以北，参见图版七十一，h）的舒伊庞（Schüi-pang）遗址；他每次都主持了一场写本收获甚丰的发掘。

7 月中旬箱子顺利上路之后，我决定不在吐鲁番度过这个几乎热得难以忍受的夏天的余下时日，而是趁这段时间去考察凉快得多的哈密（Qömul）附近的古代聚落。于是我们在 8 月 2 日动身前往鲁克沁（Luk-tschun），在那里受到公和卓（Gung-Chödscha）——即（当时不在的）额敏和卓王（Ämin Chödscha）之弟[r5]——的接待与款待。我们从鲁克沁经辟展（Pi-tschang）骑行至七克台（Tschygtym），由此进入荒凉的砾石平原。此后道路在鄂敦郭孜（Ötun-göza）附近翻过一道不高的山口，通向赤谷罗镇（Tschi-gü-lo-tschän）；我们又从那里经楼东（Lou-dung）、塔兰奇（Tarandschi，汉名三道岭 Sän-do-lin）、托胡奇（Töghutschi）和阿斯塔那（Astäna），于 8 月 13 日抵达哈密。托胡奇西南约十公里处，有一条秀丽的溪谷，谷中是拉甫却克（Laptschug）古镇；不过那里为数众多的废墟，凡保存状况还允许的，都已被今日的居民住用或另作他用。这条谷地夹在两道山脊之间，西边一道由深色的含砾砾岩构成，东边一道则是红色岩石。两道山脊上我们各数出三座建筑，除了保存最好的那座寺院之外，其余都已被掏空。那座保存最好的，是西侧山脊上位置最北的一座窣堵坡建筑。在通往拉甫却克的路上、村落前不远、路的东侧，有一座形制罕见的小寺，其甬道是用奇特的尖拱砌成的。

〔插图说明〕拉甫却克附近一座寺院的平面示意图。甬道剖面。

另有一处古代聚落，名叫拉赫苏姆（Lachsum），大致位于拉甫却克与阿斯塔那之间路程的中点；它已被彻底掏空。8 月 14 日清晨六点，我们在相当刺骨的凉意中骑入大哈密（Tschong-Qömul）。当地的王公沙·麦克苏德（Schäh Maqsüd）[r6]是一位亲王（tschin-wang），也是鲁克沁王的岳父，他极为亲切地接待了我们，并准许我们在他位于阿拉塔木（Ara-tam，城西北约 25 公里）的园林中的废墟（图版七十五，b—e）里发掘。我们随即对这些废墟进行的清查毫无结果：由于紧邻山地，融雪对可能埋在废墟中的古物是致命的，我们的辛劳未获回报。

就在阿拉塔木这里，8 月 18 日我收到一封电报，要我到喀什噶尔去，与将于十月中旬抵达那里的格伦威德尔教授商定下一步的行动；因此我不得不放弃刚刚计划好的一次远足——去据说

距哈密有十七天路程的敦煌（Tun-hwang）——而动身前往喀什噶尔。敦煌就是后来 M. A. 斯坦因（M. A. Stein）博士先生、继他之后又有伯希和（Pelliot）教授先生得以购得那批奇异写本与绘画的地方，这些东西构成了英、法两国考察队收获中极为宝贵的一部分。我早在托胡奇就听说 1900 年在敦煌发现了一座古代藏书室，并已计划前往一游，尽管起初我对我的报信人——来自塔什干（Täschkänd）的俄国属民卡西姆·阿洪（Qäsim Ächon(d)）——的话并不怎么相信。这次行程如今只好作罢，原打算对某些废墟的清查也一并搁下；我们于 8 月 21 日离开哈密，同月 30 日回到哈拉和卓。在吐鲁番筹措运输又花去一些时日，直到 9 月 11 日我们才得以继续前行。路线经托克逊（Togsun）、苏巴什（Sü-Baschi）、阿哈尔布拉克（Aighyr-Buläq）、库米什（Kümüsch）、喀拉克孜勒（Qara-Qyzil）、乌沙克塔勒（Uschäq-Täl）和塔维尔噶（Täwylghä）前往焉耆（Qara-Schähr）；这条路线有一部分相当艰难，我们克服之后于 9 月 17 日抵达。从焉耆经丹齐勒（Dänzil）和硕尔楚克（Schör-Tschuq），我们在同月 18 日到达库尔勒（Kurla）[r7]。我们在库尔勒歇脚，在那里有人向我详细讲述了硕尔楚克的古城与石窟建筑群；9 月 20 日我们继续经商河（Schang-chö）、察尔齐（Tschärtschi）、阿什玛（Aschmä）、英吉沙（Yängi-Hissar）和恰迪尔（Tschädyr）前往布古尔（Bügür），于 9 月 24 日抵达。从库尔勒起道路尚可，简陋的旅舍里也能弄到简单的食物（鸡蛋、牛奶、面包、水果）；到了布古尔，人便置身于一片耕作良好、土地肥沃的绿洲之中。由此我们的路线经阿瓦提（Awät，即 Abäd）、却勒阿瓦提（Tschöl-Äwät）和牙哈阿日克（Yaqa-Aryq）前往库车，9 月 27 日抵达。

从库车出发，我们造访了库车西南约 30 公里、库木吐喇（Qum-Tura）不远处那一大片佛教石窟寺群；这类建筑在民间都有一个通用的名称「明屋」（Ming-Öi，意即「千间房」或「千间屋」），我们在那里拍摄了几张照片——至于在那儿动一动铁锹这一极诱人的念头，我们只得强行忍住。

9 月 30 日我们离开库车城[r8]。此城与和田（Chotän）一样，以从古代保存下若干工艺技术而享有声名——（我在那里能找到的却不多：陶器、铁工和银饰）——我们经托格拉克丹（Töghraq-Dän）和克孜尔（Qyzil）山口前往拜城（Bäi，10 月 2 日）；再从那里经库什塔玛（Quschtämä）、牙哈阿日克（Yaqa-Äryq）、却尔尕（Tschörgha）和喀拉玉尔滚（Qara-Yulghun）到达贾姆（Dschäm，10 月 5 日），由此再走一天路程，便到了阿克苏（Aqsü）这座重要城市。由于我担心格伦威德尔教授可能已经到了喀什噶尔，我便在这里把商队的领导权交给我的同伴巴图斯，自己由哈拉和卓的前任水官（miräb）玛玛西特（Mämä-Sit，即 Muhammad Sayyid）陪同，兼程骑行赶往喀什噶尔。路线经艾库勒（Äi-Köl）、赛阿日克（Säi-Aryq，10 月 8 日）、却勒库都克（Tschöl-Quduq）、齐兰（Tschyläп）、亚依达（Yäidä）、牙哈库都克（Yaqa-Quduq，10 月 10 日）、图木舒克（Tumschuq）、恰哈尔巴格（Tschähär-Bägh）、玛喇巴什（Maral-Baschi）、图舒尔尕（Tüschürgä，10 月 12 日），再经喀拉克尔沁（Qara-Qyrtschyn）到厄尔德克里克（Ördäklik，10 月 14 日）。最后我从这里经英吉羊苏拉克（Yängi-Yangsuläq）、龙口（Lungku）、英吉阿巴德（Yängi-Abäd）、法伊兹阿巴德（Faiz-Abäd）和亚曼牙尔（Yamän-yär）诸站，于 10 月 16 日抵达喀什噶尔。在喀什噶尔，我受到英属印度政府「政务代表」（现任总领事）乔治·马继业先生及其夫人无与伦比的款待——我有幸在他家中度过的那段时光，将永远是我那段本已多有美好经历的岁月中最美好的回忆。然而使我大为惊愕的是，格伦威德尔教授并没有到喀什噶尔：由于俄国的政治动乱，他的行李在途中丢失了，过了好一段时间他才把它找回来。

直到十二月初，我们才得以在喀什噶尔迎接格伦威德尔教授和他的同伴、见习官波尔特（Pohrt）先生；遗憾的是前者病得不轻，一开始只能卧床。格伦威德尔教授受到瑞典传教士赫格贝里先生以最亲切的方式接待和照料，而巴图斯先生与波尔特先生则得以在俄国领事馆里享受总领事科洛科洛夫先生慷慨的款待。

直到 1905 年 12 月 30 日，我们才得以离开喀什噶尔，去寻访我们打算首先开工的库车一带的聚落。

我们沿着我此前骑马赴喀什噶尔时走过的同一条路线，于 1906 年 1 月 8 日到达图木舒克。我在那里与巴图斯一同察看了驿站以北的废墟。那是一处佛教寺院或僧院建筑群，巴图斯只挖了几铲，就从火烧过的瓦砾中掘出一只漂亮的陶塑小像的手；可惜我们不得不放弃更细致的清查[r9]。我们本想从这里经乌什吐鲁番（Üsch-Turfan）前往阿克苏，以便熟悉这条路线，但这个计划没能实现，因为据说那些道路只能通骑马者，大车（araba）走不了；而格伦威德尔教授却不得不使用这样一种车子——这是一场苦刑，他一路忍到焉耆，始终以极大的耐心承受着。

在前往库车的途中，玛玛西特水官（Miräp）给我带来了关于克孜尔（Qyzil）大型寺院建筑群的消息；它们和所有同类建筑一样叫作「明屋」（ming-öi），位于克孜尔旅舍西南约二十里、木扎特河（Muzart）畔。我立刻与巴图斯前往作了一次踏勘，结果向我们表明：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一处出土物极其丰富的地点。不过我们先继续前往库车，在那里几天里享受了俄国阿克萨卡尔[r10]哈勒马特（Chalmät，即 Chäl Muhammad）的款待，随后迁往库木吐喇附近的小村落。

那里明屋中的工作，对考察队的工作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过由于我们此时已有四名欧洲人，通过合理分工，各人的负担得以减轻，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果。

波尔特承担了给寺院拍照和测绘平面图的辛劳，我有时也参与其中；巴图斯和我，有时还有波尔特，负责寻找并找到那些洞窟寺院、把它们清理出来、并管理与工人的往来事务，好让格伦威德尔教授能够专心致志于他的考古研究，特别是壁画的临摹与拓描。

作为汉语翻译，波尔特先生有时不得不出面；除此之外，与官府以及常常成群前来的病人打交道这一摊，则留给我这个熟悉突厥语的队员；我也常常同水官玛玛西特一道作较远的外出，去发现新的发掘地点。这样，我从库木吐喇出发访问了四处位于库车与沙雅（Schäh-Yär）之间的古代聚落，即所谓克孜尔沙里（Qyzil-Schähri）、琼沙里（Tschong-Schähri）、乌什喀特沙里（Uschqat-Schähri）和托帕沙里（Töpa-Schähri）。这些地方虽然被称作「城」（schähr），其实不过是些围着劣质墙垣的圈地，里头大多连建筑的痕迹都没有。只有在察尔沙木巴巴扎（Tschär-schämbä-Bäzär）以西的一座这类无名「城」中，我才辨认出一排排低矮单薄的墙基残迹，是用抹了泥的芦苇编织物筑成的[r11]。

最后提到的这座城的示意平面图见下——（较长的）那道墙长约 80 米。库木吐喇的工作了结之后，我们便在前面提到的、位于同一条河即木扎特河上游更远处的克孜尔那处大聚落中发掘，在那里我们获得了极其丰富的壁画、写本和小件出土物。

我还曾与哈尔马特·阿克萨卡尔（Chalmat Aqsaqal）一道，从库车出发前往通古斯巴什（Tonguz-Baschi）聚落作了一次徒劳的远足，该地在通往和田的古道上。这处废墟同样是一座城堡式的建筑群，但它与其他那些「城」不同之处在于城墙的厚重，以及此地还能查出为数众多的建筑遗迹。在这次远足中我们迷了路，在浓密的尘雾中兜转了好一阵。在这番迷途中令人惊愕的一项观察是：在极其辽阔的地面上，黄土层里掺杂着数量惊人的陶片残屑，而且简直是步步皆

有青铜器物的残件——都被盐碱严重侵蚀——映入眼帘。人由此得到的印象是：这里必定曾有极其众多的人口连续定居了无数世纪。无数古代灌溉渠道的遗迹，可以循迹追踪好几英里之远。

〔插图说明〕库车附近察尔沙木巴巴扎一带一座古「城」的示意平面图。

第二次与玛玛西特水官从库车出发的踏勘骑行，把我带到了克日西（Kirisch）这个小聚落。它位于天山（Thienschan）前山地带、牙哈阿日克以北；其附近有一列有意思的寺院，我们把格伦威德尔教授领到那里之后，在那些寺院中卓有成效地工作了几天。

沿同一列前山向东约二十里，是由为数不多的几座寺院组成的阿其克伊来克（Atschygh Iläk）建筑群；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寺院甬道中绘有誓愿图，与柏孜克里克的那些相似。据我们看来，这处聚落出自相对晚近的时代，即回鹘统治时期；在阿其克伊来克诸寺兴建之时，那些更古老的寺院已被废弃、毁坏了。

我们从库车前往库尔勒附近的硕尔楚克，在那座有城墙环绕的古老寺院之城的明屋中工作。古城以北那座几乎完全被填埋的洞窟，我们戏称之为「城窟」，是由我发现并部分清理出来的。窟中藏有极大量的写本（吐火罗语与梵语，也有几叶属于「第二语言」），用印度字体书写。这些写本原是从主尊像——一尊立姿佛像——的身体内取出的，取出时窟室内已积起了相当厚的黄土。这些写本在佛像前构成薄薄的一层：其上覆盖着干燥的黄土，其下则因潮气把地面弄得极硬，因此在把藏有写本的那一层清走之后，我就停止了工作。

其间我们得到消息，说 M. A. 斯坦因博士先生正准备从和田向该地区东部推进；由于我希望格伦威德尔教授留在木头沟的那些寺院，即使由他来处理，也仍是为我们博物馆所得，我便催促大家动身前往吐鲁番。在我离开时，库木吐喇、克孜尔和硕尔楚克三处发掘的收获约装满 80 只箱子。

我却无缘陪同考察队回到我最初工作的那个场地；我的健康已经受损，因此不得不在 1906 年 6 月底，在这片土地上逗留了二十个月之后，与考察队分手；其中与我那位不辞劳苦、手艺灵巧而忠实的同伴兼合作者巴图斯的告别，尤其令我难受。

八月初我到达喀什噶尔，在马继业先生家里再次受到极友好的接待，并在那里遇见了来自俾路支斯坦奎达（Quetta）的英国炮兵上尉 J. D. 谢勒（J. D. Sherer）先生。

在喀什噶尔短暂停留之后，我与谢勒上尉一同前往叶尔羌，在那里受到瑞典传教士拉凯特先生及其夫人非常友好的接待。为了利用我们那位阿富汗商队首领组建矮种马队所需的时间，我们又顺道短程去了一趟和田，最后于 9 月 12 日开始向高山地带攀登。

我们于 10 月 31 日到达拉达克的列城。在这里我不得不把病倒的旅伴托付给摩拉维亚弟兄会的亲切照料；在他们当中，我对肖韦博士先生[r12]、彼得先生以及传教士施密特（Schmitt）先生尤其怀有感激的追念。我自己则于 11 月 4 日带着我的商队继续赶往斯利那加（Srinagar），11 月 17 日抵达。

在这里，驻扎官弗朗西斯·荣赫鹏爵士上校（Col. Sir Francis Younghusband）、斯利那加的爱德华兹上校夫妇（Colonel and Mrs. Edwards）以及白沙瓦（Peschawur）的哈罗德·迪恩爵士（Sir Harold Deane）对我极为亲切，我在此怀着由衷的感激提及。

我从克什米尔于十二月初抵达印度；一艘漂亮的意大利轮船把我迅速地从孟买送到热那亚，最后我于 1907 年 1 月 7 日怀着喜悦与感恩之情，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家乡。

[r1]:〔原注〕除这笔款项外，我后来又收到 10000 马克，故共计 42000 马克。这笔总额中有略多于 15000 马克用于运送装有成果的箱子。

[r2]:〔原注〕图见 Donner：《中亚旅行记》（Resa i Central-Asien），赫尔辛福斯 1901 年。

[r3]:〔原注〕不言而喻，关于他来或不来的消息反复变动——遗憾的是这是由格伦威德尔教授受损的健康所致——而这些消息不断地影响着我们的决定。

[r4]:〔原注〕Yär-Gholi、Yär-Choto，或称「崖上（或崖畔）之城」，即位于吐鲁番以西二十里的高昌第二座都城；唐代汉人称之为交河（Kiao-ho）（沙畹〔Chavannes〕：《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occidentaux〕，圣彼得堡 1903 年，第 101 页）。

[r5]:〔原注〕我们从额敏和卓那里得到许多善意；总的说来，我们与中国官员以及与突厥居民各阶层的关系都是愉快的。额敏和卓在官方文书中的全衔为：hazräti qasäq yui-bo cün-wang bägim。其世系如下：Ämin wang ibn Sultän Mahmüd wang ibn Afridün wang ibn Mähmät Sayyid wang ibn Färidün wang ibn hazrät Ämin yanliq（yalliq）。

[r6]:〔原注〕应在信函上标注的完整汉—突厥—阿拉伯文头衔为：「Yüi-Cän sin-zö Qömul-nuäg qasäq hazräti Cin-wang bägliktä sälläm Alläh ta'ala gänäp Alt kärämläriyä」〔原文此处漫漶：该头衔转写多处 OCR 讹误，未能复原〕。我设法弄到了这位王公的家谱，其世系如下：（1）Yüi-cän Sin-zö wan-l〔漫漶〕-bö qasäq Cin-wang Sah Maqsüd，其父为（2）qasäq Cin-wang Bahädur，其父为（3）qasaq Cin-wang Bäsir，其父为（4）qasaq Lün-〔原文此处漫漶〕Ardäsir，其父为（5）qasäk Cün-wang Ishäq，其父为（6）qasäk cün-wang Yüsip，其父为（7）qasäk fuko-gung Ämin，其父为（8）qasak Wäpa，其父为（9）qasak 'Abdulläh（'Ubeidulläh？）。

[r7]:〔原注〕由斯文·赫定（Sven Hedin）引入的拼法 Korla，就瑞典人而言是正确地转写了 Kurla 这个名字，因为瑞典语的 o 大致相当于我们的 u。同样，Bugur 是德语 Bügür 的瑞典式拼法。

[r8]:〔原注〕Kuchar 这一拼法一部分是英国人、一部分是安集延（Andidschan）人带进来的；参见 M. 哈特曼（M. Hartmann）：《中国突厥斯坦》（Chines. Turkistan）第 87 页注 46（Gebauer-Schwetschke 出版社，萨勒河畔哈雷 1908 年）。在钱币上和当地人出具的文书上，只见 Kutschä 一种写法〔此处原书所附阿拉伯字母原文 OCR 漫漶〕。

[r9]:〔原注〕后来伯希和教授先生（参见 Maybon：《东突厥斯坦的佛教艺术》〔L'art bouddhique du Turkestan oriental〕第 54 页）清查了该处废墟，并在那里发现了因一场大火而烧结的、年代较早（五世纪？）的精美陶塑小像。／紧挨着那座佛教建筑另有一座伊斯兰教建筑；据说是约一百年前由一位名叫托赫塔什（Tochtasch）的伊玛目为其女祖拜达·比比（Zübaidä Bibi）所建。旁边还有一座仍被沙土深埋的古老的 qumdän 即窑炉——附近四处散落着绿釉古器皿的碎片。

[r10]:〔原注〕aqsaqal（突厥语）意为「白胡子」，或许是借自波斯语的一个词，用以称呼村中长老；此处则是俄国籍突厥商人、即所谓安集延人的首领的头衔。

[r11]:〔原注〕玄奘所记的睹货逻（Tu-ho-lo）人的「城」，大约就是这一类（参见 F. 冯·李希霍芬男爵〔F. Frhr. v. Richthofen〕：《中国》〔China〕，D. Reimer 出版社，柏林 1877 年，第一卷，第 489 页）。

[r12]:〔原注〕肖韦博士先生可惜已不在人世——在我们造访之后不久，他便作为其克己奉献的职业的牺牲者被召回了。关于这次因季节已晚而益加艰难的翻越喀喇昆仑之行中的个人经历，请容我提请参阅《本季纪事》（Notes of the Quarter，1908 年 10、11、12 月），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Journal Royal Asiatic Soc.），第〔原文此处漫漶〕页，1908 年 11 月 30 日。

〔译注〕本篇底本为 OCR 扫描件，原书页面在 OCR 中被合并：OCR 第 11 页含原书第 3、4 两页，第 12 页含原书第 5、6 两页，第 13 页为原书第 7 页。原书页眉「EINLEITUNG · DIE REISE」与两幅插图说明在 OCR 中被移位，译文已按原书正确阅读顺序复原。

二、高昌城与其居民

〔原书 DIE STADT CHOTSCHO UND IHRE BEWOHNER，第 4—5 页〕

现代的哈拉和卓（Qara-Chödscha）集镇由三个小村落组成，即哈拉和卓、阿斯塔那（Astäna）与阿瓦提（Awät，或作 Awäi Äbäd），每个村落各有自己的镇长（däröya）。这些聚落共约一千一百户人家；它们自东向西沿废城的北墙分布，并侧护着西墙的一段；不过那些房屋，尤其是哈拉和卓的房屋，是沿着那条自北方流来的小河的河道向上游延伸的，一直到河水流出胜金（Sängim）峡谷（äyiz，Eriz）之处。今日的居民是不甚虔诚的穆罕默德教徒，属于与喀什噶尔、库车、阿克苏（Aqsü）诸城以及突厥斯坦其余聚落中的突厥居民同一支的突厥人种。他们是一个混合民族，其中既有面貌全然欧洲型的人，也有同样鲜明的东亚人种的代表。只有玛拉尔巴什（Maralbaschi）一带的居民，即多兰人（Dolänen），据说另有来源，即蒙古来源。

> **【增订者按】** 本书对高昌城的历史着墨甚简，读者若无背景，难以领会这片废墟的分量，故略述其大要。
>
> 高昌因「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得名，本为汉军屯戍的军事堡垒，地当北道丝绸之路必经之处。公元五世纪起，汉人麴氏据此称王，历一百四十余年，是出土罗马、波斯与唐朝钱币最集中的城邦之一。贞观初年，玄奘西行至此，气力已尽；高昌王麴文泰崇佛惜才，强留他为国师，玄奘绝食以拒，终得成行。临别时二人结为兄弟，麴文泰以举国之力赠以随从、马匹与沿途诸国的厚礼，并亲修书致西突厥可汗为之关说——玄奘得以西抵天竺，此为关键的一节。640 年，唐灭高昌，置西州；麴文泰已先卒，玄奘归途再不能见其义兄。
>
> 安史之乱后，河西路绝；840 年回鹘西迁，据有此地。此后随着陆上丝路衰落、伊斯兰教东渐，高昌渐归沉寂，城池与壁画一同埋入沙土，直至十九世纪末重新被外部世界发现。

这座哈拉和卓废城【1】——它又以亦都护城（Idiqut-Schähri）【2】、Dägiänüs【3】、Apsüs 以及「艾勒白塔苏丹（Älbättä Sultän）之城」【4】（汉文作 Kao-c'ăng，高昌）等名称为人所知——在我们所获的古突厥文写本中名为 Chotscho（高昌）。

正如通过对废墟的研究所得知的那样，它是一座由厚重城墙牢固设防的寺院之城与墓地，其全部建筑无一例外都是寺院、佛殿与窣堵坡（其中有些是坟墓）。城中唯一可以设想的世俗建筑，是王室的宫殿【5】。平民大约就住在今日现代村落所在的地方——那里有大片以夯实黄土筑成、今日多被用来营造坟墓的台基——住在以芦苇或柳条编成、用泥抹缝的房屋里。一旦有战事之危，高昌这座寺院之城，以及那座因坐落于难以攀登的黄土崖上而更为坚固的「崖上之城」（即交河故城，在高昌以西八十里），大概都曾充当城外居民的避难堡垒。高昌的一座寺院有据可考是在五世纪建立的【6】；至于其余寺院的年代，则缺乏文献记载【7】。

吐鲁番—哈拉和卓地区在汉文史册中早在公元前 60 年前后即已称为 Kiü-schi 或 Ku-schi（车师／姑师）【8】。这一地区的居民属于哪个民族，我们不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不是汉人。倘若我们可以依据在当地发现的大量写本来判断——这些写本以印度文字（婆罗米文，Brāhmī）书写，所用却是一种外来的、属于印欧语系欧洲语群的语言；而我们可以把壁画中屡屡出现的那些蓝眼睛、红头发的人物头像所代表的那个人种，视为这种语言的承载者——那么高昌居民中有一部分是属于欧洲—印欧血统的；我们暂且依据推测应归于他们的那种语言，把这些人称为「吐火罗人」（Tocharer）【9】。

我们认为这些「吐火罗人」是月氏（Yüe-tschi）的一支：在这些部族回迁【1】之际，他们以某种方式流落到了高昌，并凭借其尚武的品性，对定居当地的建城者后裔取得了影响。至于说这座城本身即为「吐火罗人」所建，则不大可能：我们毋宁相信，东突厥斯坦最早的建城者到处都是伊朗系的粟特人（Soghdier），他们的城邦社群则依地理位置与时代之不同，分别由匈奴（Hiung-nu）、吐火罗人、嚈哒（Hephthaliten）、柔然（Zuan-Zuan）、汉人、突厥人、回鹘人或吐蕃人的守臣或君侯来治理。「吐火罗人」是否与车师人（Kü-schi）为同一族，我们无法断定。

> **【增订者按】** 「吐火罗人」与月氏的关系，是勒柯克写作此书时德国学界的通说，今日已不能成立。所谓吐火罗语（学界分作甲、乙两种方言，即焉耆语与龟兹语）确属印欧语系，且分类上偏于西支，这一点勒柯克没有说错；但把使用者径指为月氏的一支、并推想他们自南俄草原东迁而来，是当时以语言比定族属的做法所致，缺乏考古与文献的支撑。今日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吐火罗语人群在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居住可上溯至更早，与月氏的关系并不能直接等同。
>
> 此类论断在本书中还有数处。凡遇之，一律照原文译出，不作更改；有须辨正者，别出此按。原作者的判断是他那个时代的判断，改掉它便看不出这门学问一百年来走过的路。

高昌居民的文化与艺术，不是从东方、而是从西方与西南方获得的。使他们得享这些财富的，首先尤其是印度的佛教信仰，它经由两条道路传来：一条来自粟特（Soghdiana）、大夏（Bactrien）与边地犍陀罗（Gandhāra），另一条则直接来自印度本土。只是到了后来，当中国本身已被佛教的这一播种所化育之后，在阿拉伯人切断了与西方的交通之后，大概有一股回流的浪潮，把那些古老的、此时已经中国化了的母题重新带回到中国以西的诸地。

除印度之外，伊朗（也许恰恰是我们所知尚少的伊朗东部）似乎对这个中亚国度的文化施加了特别巨大的影响：凡建筑不依印度范式之处，其式样便是伊朗的；兵器、衣装、纺织品【2】，乃至马匹鞍辔上的小铃与流苏，都指向波斯【3】。

居民所用的文字同样显示出这双重的来源；自很早的时代起，人们一方面使用印度文字的各种类型，另一方面使用东伊朗的粟特人所用的、源出闪米特的字母，即粟特文【4】。在某些时期——尤其是在某些突厥民族统治的时期——人们也曾从事汉语的学习。

除佛教之外，叙利亚的景教（syrisch-nestorianisches Christentum）与波斯人摩尼（Mani）的宗教也曾被移植到这个国度。这两种宗教传入的确切时间无法确定；依我们之见，叙利亚基督徒的人数与影响恐怕要到较晚的时代——大约自七世纪起——才取得一定的分量。无论如何，我们所获的叙利亚文文书指向一个更晚的时代，即九世纪。在基督教写本中，只有一件书籍残片属于更早的时代，即五世纪，那就是以中古波斯语、用帕拉维钱币体字母（Pehlevi-Münzschrift）书写的《诗篇》集【5】。它是与那些基督教内容的粟特文、叙利亚文写本一同，在布拉依克（Bulayiq）附近的舒伊潘（Schüi-Pang）遗址发现的。

意义远为重大的是摩尼教【6】。这一宗教在突厥斯坦最初传布的时间同样不能确定，但很有可能摩尼本人到过东突厥斯坦；而且我们毫不怀疑，在他死后，个别摩尼教徒可能已在当地定居并为其信仰而活动。然而他们取得影响却要迟至八世纪，其时回鹘的可汗（当时高昌似乎正在回鹘人手中）皈依了摩尼的教义。

回鹘是一个突厥民族，就语言而论，与奥斯曼人的亲缘关系比与阿尔泰突厥人更近。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在什么时候夺取了高昌城的，但相信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大约在八至九世纪——该城以及全境的粟特居民与吐火罗居民中有一部分融入了突厥—回鹘的民族之中。

【增订者按】 回鹘入据高昌的时间，今已可确指。840 年，漠北回鹘汗国为黠戛斯所破，部众四散西迁，其中一支进入吐鲁番盆地，以高昌为中心建立政权，史称高昌回鹘（亦称西州回鹘），历时约四百年。故本书屡屡提及的「回鹘统治」，起点在九世纪中叶，而非勒柯克所拟的「八至九世纪」这一较宽的范围。

须辨明的是：840 年是回鹘人到来之年，不是高昌毁灭之年。这一年份在本书及同时代西文著作中时或被系于城池的破坏，实为误会。

高昌的宗教面貌亦随此转折而变。回鹘人西迁之初奉摩尼教——即汉籍所称明教——高昌一度是其东方教务的中心；此后数百年间渐次转向佛教。本书 K 号遗址群所出的摩尼教写本与绘画，正属前一阶段的遗存；而柏孜克里克诸窟的佛教壁画，多属后一阶段。同一座城中层层叠压的两种信仰，是高昌最值得注意的特征之一。

民众的大多数似乎一直信奉佛教，直到大约八世纪中叶国王卜古汗（Buyuy Chän）改宗摩尼教【1】，而且必定有相当数量的贵人随之效法。

这一事件重新把伊朗的影响带进了这个国度，尤其是波斯的细密画（Miniaturmalerei）似乎在摩尼教团中得到了培育。摩尼文（die manichäische Schrift）为这一宗教团体所使用，而信佛的回鹘人则使用晚期粟特文（即「回鹘文」），较少使用婆罗米文【2】。若干以古突厥卢尼文（köktürkische Runenschrift）书写的摩尼教残片，则证明回鹘与伊朗的摩尼教徒也使用这种文字【1】。

摩尼教的引入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回鹘王国的鼎盛，这一鼎盛大约持续了百年上下。约在九世纪中叶，这个国家的势力败于吉尔吉斯人（Kirgisen）的进攻【2】；依我们的看法，该城遭到的一次灾难性毁灭正落在这一时期（约 843 年）。

此后该城似乎曾部分重建，但回鹘人的强国地位已被彻底摧折：这个衰弱下来的国家在此次败绩之后，只能再展开一段相对微弱的复兴期繁荣。这一复兴时期一直延续到十四世纪末——随后它也因伊斯兰教的传入而告终结。

〔原注·原书第 4 页〕

〔原注 1：波斯语词 xöga（< wāga）在东突厥斯坦虽已取得「君侯」之义，但圣徒之墓亦可以此词称之。在哈拉和卓，似乎有一个（也许晚出的？）关于一位黑色的（印度的？）君侯的传说构成了这一地名的由来（民间词源）。〕

〔原注 2：字面意思为：亦都护之城。德经（DE GUIGNES）《匈奴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第二卷第 215 页作「Idicutt = 回鹘王之称号」。此称号由两个突厥语词构成，应读作 idug qut，可译为「神圣的陛下」（参见 F. W. K. 缪勒《回鹘文献》〔Uigurica〕，《普鲁士王家科学院论文集》1908 年，第 56 页）。〕

〔原注 3：由于七眠子传说（Siebenschläfer-Legende）与高昌附近吐峪沟（Toyoq）的圣地相联系，人们有时便以以弗所（Ephesus，Apsüs）之名，或以皇帝德西乌斯（Decius，= Dägiänäs）之名来称呼高昌城。〕

〔原注 4：艾勒白塔苏丹（Älbättä-Sultän）是（现代突厥语）传说中那位据说征服了此地并引入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教君主的名字。〕

〔原注 5：顺带一提，它们的位置迄今尚未查明。民间把格伦威德尔平面图（《报告》第 8 页）上的 E 号遗址称作「汗王宫」（Chänspalast），但是否确有可靠的传说为据，我们不得而知。那座大型寺院遗址〔原文此处遗址编号漫漶〕同样有一个突厥语名字：称作「χitai mädräsä」，即「中国人的学堂」。〕

〔原注 6：参见 O. 福兰阁（O. Franke）《吐鲁番附近亦都护城出土的一方汉文寺院碑铭》（Eine chinesische Tempelinschrift aus Idikutsa̓hri bei Turfan），《普鲁士王家科学院论文集》附册，柏林，1907 年。〕

〔原注 7：关于吐鲁番等地的记载，可参见（其中包括）：

A. 雷格尔（A. Regel）《我的吐鲁番考察》（Meine Expedition nach Turfan, 1879），载《彼得曼氏通报》（PETERMANN's Mitteilungen）1881 年第 X 册。

同作者《吐鲁番》（Turfan），《彼得曼氏通报》1880 年第 VI 册。

G. 与 M. 格鲁姆-格尔日迈洛（G. und M. Grum-Grshimailo）《西中国旅行记》（Beschreibung einer Reise nach West-China），圣彼得堡，1896—1907 年，三卷本（俄文）。

D. 克莱门茨（D. Klementz）《关于圣彼得堡帝国科学院 1898 年所装备的吐鲁番考察队的报道》，圣彼得堡，1899 年。

布莱资奈德（Bretschneider）《中亚与西亚中世纪地理与历史札记》（Notices of the Mediaeval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伦敦，《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875 年。

唐纳（Donner）《1898 年中亚旅行》（Resa i Central-Asien 1898），赫尔辛福斯，1901 年。

A. 格伦威德尔（A. Grünwedel）《亦都护城等地考古工作报告》（Bericht über archaeologische Arbeiten in Idikutschari etc.），巴伐利亚科学院论文集，慕尼黑，1906 年。

A. v. 勒柯克（A. v. Le Coq）《第一次普鲁士王家（第二次德国）吐鲁番考察队之缘起、行程与成果简述》（A short Account of the Origin, Journey and Results of the First Royal Prussian [Second German] Expedition to Turfan），《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伦敦，1909 年 4 月。

同作者《吐鲁番考古勘查》（Exploration archéologique à Tourfan），《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巴黎，1909 年。

E. 亨廷顿（E. Huntington）《亚洲的脉搏》（The Pulse of Asia），伦敦，1907 年。〕

〔原注 8：沙畹（Chavannes）《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occidentaux），圣彼得堡，1903 年，第 101 页注。〕

〔原注 9：参见 F. W. K. 缪勒《对中亚未知诸语言更精确判定之一贡献》（Beitrag zur genaueren Bestimmung der unbekannten Sprachen Mittelasiens），《普鲁士王家科学院会议报告》1907 年。

这种语言并非仅仅随着藏书才被带到高昌、硕尔楚克（Schör-tschuq）与库车，这一点似乎可以从下述事实看出：胜金口峡谷中的一方寺院题记，以及库车（克孜尔，Qyzil）的许多壁面题记，都是用它写成的。神圣的语言是梵语，有时——显然是在尚无自身文化的柔然统治之下——则是汉语；由此可知，吐火罗语必定是高昌以及库车、硕尔楚克居民中一个有影响的部分所使用的语言。

此处必须提及：这种语言以两种方言存留下来，我们以「A」与「B」标记之（参见西格博士与西格灵博士〔Dr. Sieg und Dr. Siegling〕《吐火罗语——印度-斯基泰人的语言》

〔Tocharisch, die Sprache der Indoscythen〕，《普鲁士王家科学院会议报告》1908 年第 XXXIX 期）。在我们于高昌及其周边、以及硕尔楚克所获的写本发现物中，两种方言的实例都有；但在库车—克孜尔的写本发现物中，却缺少「A」方言。

克孜尔与库木吐喇（Qumtura）诸画上的供养人固然有红色的头发（即大概是用染料〔指甲花？〕染成的），却绝无蓝眼睛，而始终是黑眼睛。因此他们又属于另一个人种；这个人种也许试图通过人工染发，在外表上尽可能地向红发的统治阶层看齐。但由于库车的图画比吐鲁番的更为古老，因此——如果并非画风本就舍弃了此类细节的话——此处仍有许多谜团。

值得注意的是：由突厥语音「Chotscho」传给我们的这个城名（汉文以「Kiü-schi, Ku-schi」译写），与库车城的汉名（「Kiu-ts'ê, K'iu-ts'ê」；该城在其他古代语言中的旧称我们尚不知晓）并非不相似（沙畹，前引书，第 114 页）；汉文名称之间的差异，或许可以追溯到两种方言的并存。

吐鲁番的汉文名称「Kao-c'ang」（高昌）——依我们之见它本应属于高昌城——也许也不过是以汉语转写这一古名的一种尝试。

至于是否可以在此援引弗吕格尔（Flügel，《摩尼》第 387/88 页）与马夸特（Marquart，《历史杂考》第 180 页）所提到的马苏第（Mas'ūdī）的记载——即九姓乌古斯（Toyuzyuz）的都城名为「Kwsän」——我们姑且存而不论；它出自一个晚近的时代。无论如何，Chotscho、Kutschä、Kao-c'ang 等名称彼此之间有某种相似，而这也许并非纯属偶然。〕

〔原注·原书第 5 页〕

〔原注 1：我们不能不在此提及：依我们之见，月氏是在基督纪元前从欧洲的某一部分（南俄罗斯？）推进到中国的。由这一见解引出的问题是：西伯利亚、特别是米努辛斯克（Minussinsk）一带的库尔干（Kurgane）冢墓，是否可以与月氏联系起来。〕

〔原注 2：我们深信，中国人是经由突厥斯坦从伊朗人与印度人那里获得织造、缂织、刺绣与染色的各种精巧技艺的。〕

〔原注 3：斯坦因与伯希和（Pelliot）二位先生在敦煌（Tun-hwang）的寺院藏书中所能购得的突厥文写本如此之少，而粟特文写本如此之多，以致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即便在那座藏书被封砌起来的晚近时代，那一带也必定还生活着许多粟特人。F. W. K. 缪勒的一项论定极大地强化了这一印象：他确认哈拉巴喇哈孙（Kara Balgassun）的石碑并非以古突厥文（Kök-Türkisch）、汉文与回鹘文写成，而是以古突厥文、汉文与粟特文写成的。（参见 F. W. K. 缪勒《一件出自蒙古北部的伊朗语文献》〔Ein iranisches Sprachdenkmal aus der nördlichen Mongolei〕，《普鲁士王家科学院会议报告》1909 年第 XXVII 期。）〕

〔原注 4：吐火罗文写本始终只以印度文字书写；以粟特文字书写的，则除大量佛教与摩尼教内容的粟特文文本之外，还有突厥文写本的残片。甚至汉语也偶尔以粟特字母转写。关于粟特文发现物的最初报道，参见 F. W. K. 缪勒《粟特语新约残篇》（Neutestamentliche Bruchstücke in soghdischer Sprache），《普鲁士王家科学院会议报告》1907 年第 XIII 期。〕

〔原注 5：F. C. 安德烈亚斯（F. C. Andreas）《萨珊时代帕拉维语〈诗篇〉译本残篇》（Bruchstücke einer Pehlewi-Übersetzung der Psalmen aus der Sassanidenzeit），《普鲁士王家科学院会议报告》1910 年第 XLI 期。〕

〔原注 6：关于这一论定，参见 F. W. K. 缪勒《写本残卷 I》（Handschriften-Reste I），1904 年，《普鲁士王家科学院会议报告》1904 年第 IX 期，第 351 页；及同作者《写本残卷 II》（Handschriften II），《普鲁士王家科学院论文集》附册，1904 年，第 9 页。〕

〔原注·原书第 5 页（续，摩尼教与回鹘部分）〕

〔原注 1：参见 A. v. 勒柯克《高昌出土的一件摩尼教书籍残片》（Ein manichäisches Buch-Fragment aus Chotscho），载《维尔海姆·汤姆森纪念文集》（Festschrift für Vilhelm Thomsen），莱比锡，哈拉索维茨书店，1912 年。〕

〔原注 2：参见施特纳（Stönner）《婆罗米文中亚梵文写本（一）》（Zentralasiat. Sanskrittexte in Brāhmī-Schrift [I]），《会议报告》1904 年第 XLIV 期。〕

〔原注 1（关于古突厥卢尼文之摩尼教残片者）：原文此处漫漶〕

〔原注 2：〔原文此处漫漶〕……吉尔吉斯人被描述为这样一个民族：在他们中间，浅色的面容配以蓝眼睛与红头发极为常见。施莱格尔（Schlegel）《……哈拉巴喇哈孙的汉文碑铭》（Chines. Inschrift … in Kara Balgassun），《芬兰—乌戈尔学会纪要》（Mém.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赫尔辛福斯，189〔末位数字漫漶〕年，第 140 页。〕

三、高昌城内的发掘

> 原书 *Chotscho*（Albert von Le Coq, Berlin 1913）第 16—20 页，章节 "DIE GRABUNGEN IN CHOTSCHO"。

α 号遗址

在格伦威德尔（Grünwedel）教授特别嘱托我勘查、以求获得写本的建筑名单上，位于城西南的 α 号遗址列在首位。第一次考察队（格伦威德尔—胡特）正是在这一建筑群东侧的寺院中获得了他们最珍贵的写本；格伦威德尔教授希望，西侧一处类似的寺院建筑也许同样藏有无可估量的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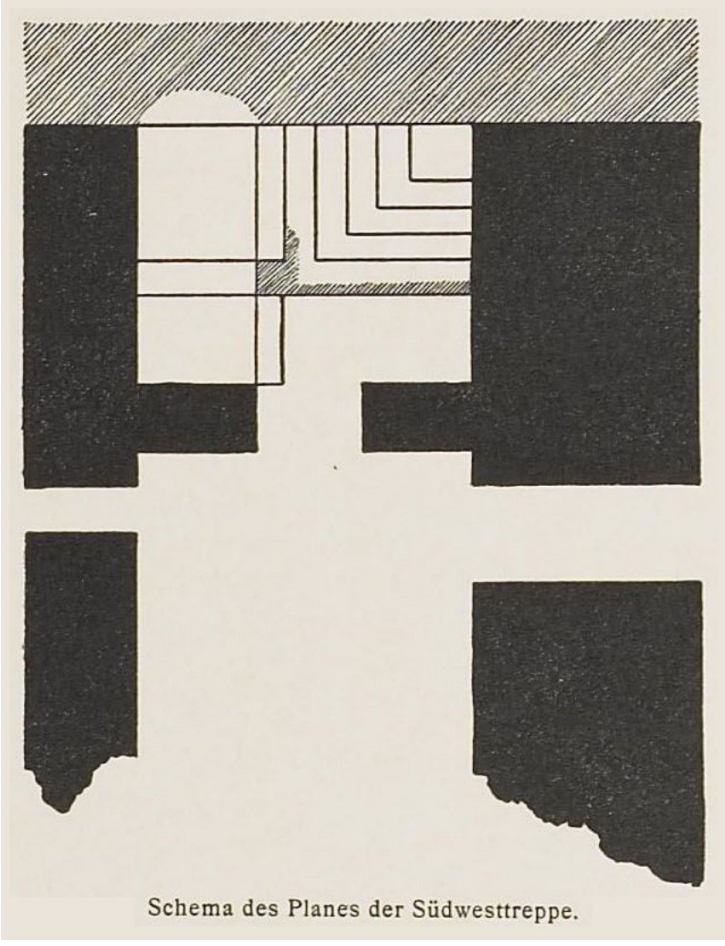
因此，勘查这座依城堡形制而建的寺院（其描述见格伦威德尔书第 55 页以下），就成了我的考察队的第一项任务。我们在这些工作上花了约三个星期，可惜没有取得值得一提的出土物：西侧毋宁说呈现为一整块坚实的黄土体，依我看，它是按照今日东、西突厥斯坦仍然通行的做法，用揉和并夯实的黄土筑成的〔原注 1〕。这块黄土体的侧面并不垂直上升，而是以一个不大的角度斜收；构造上的凹凸不平，则由外侧贴附的一层优质土坯来找平——这层土坯在上部各层为单层，往下则为双层，甚至三层，各土坯之间以泥浆〔原注 2〕相黏结。

我们对格伦威德尔教授关于此建筑群的描述所能作出的唯一多少算得上重要的补充，涉及通向这座奇特建筑的两道台阶。其中一道位于东侧，在格伦威德尔平面图中 A 号寺院的北面，并由一处夹在中间的〔原文此处漫漶：此处因插图版式，德文原文有一段脱落〕……（参见图版七〇 m）。这道台阶尚可辨认出约 17 级破坏严重的踏步（高约 30 cm，宽 150 cm〔下部各级〕与 100 cm〔上部各级〕，进深已无法确定），并无值得注意之处。另一道台阶（参见图版七一 a、b）位于建筑群的西南侧。它处在一间原高约 3½ m、近乎方形、早先覆有穹顶的房间内；这间房紧靠着那座大黄土方体的斜升墙面，其旁另有一座大厅。进门时，右手（东）一侧可见一个宽约 1½ m 的龛，龛内立有一低矮的泥台座；左手一侧则有两级踏步，由此可登上第二处形状不规则的休息平台。自此平台起，六级踏步向上，在房间上部的东北角到达最后一处平台；由此穿过穹顶上的一个开口，沿着砌体中尚可隐约辨认的更多踏步，即可抵达高处的那组建筑。引人注目的是，上述最后六级踏步中的上面四级，是环绕着最上方那个近乎方形的平台砌筑的，以致在观者看来大致呈现为一段室外大台阶转角的样子。有一道门，从东侧贴靠黄土块体建造的那座大筒形拱顶室，通向台阶间入口前方的前室；此前室的比例关系今已无从辨识。此前廊的西侧另有一道较小的门。



文中插图 1　西南侧台阶视图

α 号遗址（Ruine Alpha）　|　原书第 6 页



文中插图 2　西南台阶平面示意图

α 号遗址　|　原书第 6 页

〔原注 1：关于此类墙体的筑造方式，参见 v. Schwarz, *Turkestan*, Freiburg i. B. 1900，第 156 页、第 230 页。〕

〔原注 2：从未使用过别种灰浆。土坯大小不一；巴图斯（Bartus）在高昌量得的土坯长 0.30 m、宽 0.20 m、厚 0.15 m，在胜金口峡谷与柏孜克里克量得的则长 0.36 m、宽 0.22 m、厚 0.16 m。〕

T^1 号寺院遗址

在 α 号废墟群的发掘无所收获之后，我们转向 T^1 号遗址。它奇特的建造方式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而其显然填满了古代堆积的主体建筑，看来有望带来收获。这座主体建筑是整个建筑体系的西部：它由一座原本呈方形的穹顶建筑构成；其北面前方并列着两间狭长的矩形小室，两室之间有一条甬道通向穹顶室的入口门。这就是门楼；其屋顶已完全毁坏。南面有一座筒形拱顶室横置于穹顶室后墙之前；一条狭窄的拱顶甬道开在后墙东侧四分之一处（也许是后来才开的），将筒形拱顶室与主体建筑即穹顶室连通起来。

东面紧接着一间大的矩形房间，其中央立有一座同样呈矩形的台座，可安置 4 尊佛像；此房间依附于将穹顶室与筒形拱顶室在这一方位上共同封闭的那道墙。一间横置的、庭院式的房间，同样为矩形，则与门楼的东壁及台座室的北壁相接。在穹顶室外侧西壁上，我们发现一道巨大的、在整个高度与宽度上支撑该墙的扶壁式墙体（图版七〇 a、c），其用意我们随即就明白了。

其余各室仅有少量堆积，穹顶室则不然：其穹顶起拱部分连同南侧的角拱尚存，室内填满了大量堆积与砖石；这堆积在南面一直堆到穹顶起拱处，而向北壁上所开的入口门方向陡然下落。这道门只有右侧（东侧）门柱尚存，柱上可见这类建筑中常见的斜收做法。

清理工作费时甚久。清理完毕后，穹顶室首先显现为一个与门楼相横置的矩形；地面覆有一层保存完好的白色石膏平整铺面。此时可以看出，这座寺院早在佛教时期就已经历过重要的改建。显然，穹顶相对于墙体过于沉重，或者已变得不稳固；它有倾塌之虞，为此古代的营造者在西侧筑起了那道巨大的扶壁墙，并在原本方形的房间南侧四分之一处、平行于旧南墙加筑了一道厚重的支撑墙。这道墙支住了穹顶，这一使命它履行了很久——因为此建筑内的堆积物，正如许多砖块的弯曲形状所证明的那样，无非就是后来坍塌下来的穹顶北半部的残余。支撑墙内含一条拱顶甬道，高过人头，沿墙的纵轴自东向西贯通，并以两道门与穹顶室的两个部分相连。

因此，依我们之见，最古老的壁画遗存应当到原有的旧南墙与新建的支撑墙之间那条狭窄的空间里去寻找；为此，支撑墙不得不被部分拆除。我们先不看这一较早房间的残余部分，而先看因支撑墙的修建而形成的那个矩形的较新的寺院空间。

南壁，亦即较新的支撑墙的北面，处处仍可见丰富彩绘的清晰痕迹；可惜这些也许曾表现极乐世界的壁画破坏严重，尤其在东段，已看不出多少内容。在此墙西侧四分之一处、约与人等高的位置上，还能看到山石、树木与花卉，以及带莲花的池沼的表现残迹。墙的中部立有一座低矮的木质台座（52×48 cm），台面为圆形（在平面图 x 处）；其做工极为粗劣，与那些极为精美的壁画形成奇异的反差。这些也许表现阿弥陀佛（Amitābha）极乐世界的风景图，在同一高度上一直延续到该室西壁的南段。在这些壁画上方，是一朵红色莲花的图像，其上可辨认出一个行走中的人物的双足以及黑白两色衣着的一部分；此人物所绘略小于真人。西壁的中段被刮擦得极其厉害，壁画已无法解读；再往前则又出现身着印度装束的人物形象，其旁靠北处、在 α 位置上蹲踞着一个持棒的小恶鬼。最后，在角落里原先有格伦威德尔教授带回的那组恶鬼群像（参见《亦都护城》[Idikutschari]，第 39 页）。

充塞整个房间、以至于较新墙体的北面完全隐没其后的成堆砖块之下，我们发现了数十件用陶土塑成的半真人大小的手指和手的部件，其中一部分还贴有金箔，每件手的内侧掌面上都有一只眼睛。它们无疑属于一具巨大的背光，而这背光的存在表明此处早先立有一尊观世音（Avalokiteśvara）像。它的位置当在正对入口门处，大约就在发现那座木台座（x）的地方。在（新的）房间中央一带的地面上，还发现了数量甚多的木榫——古代匠人用它们来插接以模具制成的塑像各个肢体部件——以及炭迹和被烧成红砖的土坯，这证明该建筑的一部分（也许只是那尊观世音像用木料与芦苇制成的内芯）曾被烧毁。但在台座上却看不到任何火烧的痕迹。

除这些物品之外，只还发现了一部藏文书籍的书叶残片；此书以金银两色极精美地书写在厚实的蓝色纸上。

我们随即勘查了（新）墙以南那间狭窄的（较早的）房间。在东壁上，介于穹顶室原有南墙与新南墙之间的抹灰面上，仍可清楚地看到那处切割痕迹（图版七〇 d）——格伦威德尔教授当年从这里取走了「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表现图的一部分（《亦都护城》第 40 页）。这幅表现图覆盖了整面旧南墙；而且正如我们在拆除新墙东、西两端时所确认的，它还覆盖了被这些新墙段所占据的整面东壁以及西壁的一部分。

东壁上被新墙遮蔽的那一部分，在墙体移除之后，于上述切割痕迹以北显现出一座中国式房屋的画面，屋前两身菩萨像仍清晰可辨。与此画面相接、向北是以梁木构成的栏杆的表现。旧南墙的北面则有如下图像：中央是一具蓝红两色背光的残迹，它环绕着一尊坐在中国式房屋前红色莲台上、身着蓝衣的小佛像的头部；整幅画面破坏严重，无法进行精确研究。往东是第二尊坐在中国式房屋前的佛陀，旁有两身礼敬的菩萨（参见平面图 e 处）；再往东，画面被门旁后期开凿的一处壁龛所打断，龛的西侧只还保存着一身菩萨或女性神祇的精美画像（图版九）。而在构成墙面中心的那尊佛像以西，则有一组两身菩萨。

在取下这一组像时，露出了一条与东侧甬道相对应、但已被封堵的拱顶通道〔原注 1〕。此通道以西的角落，又由一座中国式房屋以及屋前两身保存完好的坐姿菩萨像所填满（参见图版八）。最后，西壁的南角同样绘有一座（斜置的）中国式房屋，屋子宽阔的侧立面上，窗前垂下以细木条制成的遮阳帘，帘前坐着一身菩萨；屋子窄的一面斜向观者，其上有类似的表现。这一部分已有一部分被新墙的接合处遮住，但保存良好。相邻的一组则大部分毁坏，只有靠北的部分——同样是一尊佛陀与一位礼拜者——尚存。在切取这一组像时发现，它掩盖着一道较早的门，门通向一条甬道；这条甬道因西侧扶壁墙的修建而变得无法使用。因此，寺内各壁上的所有画面看来都晚于寺院本身——除非有人愿意假定：穹顶构造的缺陷在建筑落成之初就已引起古代营造者的忧虑，因而扶壁的修建在壁画绘制之前就已促成。不过，穹顶最下一道弧线处出现的某些浮雕纹饰似乎证明，这座寺院早先曾以一种全然不同的风格加以装饰。

因内部支撑墙的修建而形成的较晚寺院空间，其墙面上的壁画在风格上与我们前面描述的、位于内部支撑墙之后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表现图完全不同；后者在我们看来属于更早的时代：我们把它们定在 8 世纪的第一个二十五年（参见正文，图版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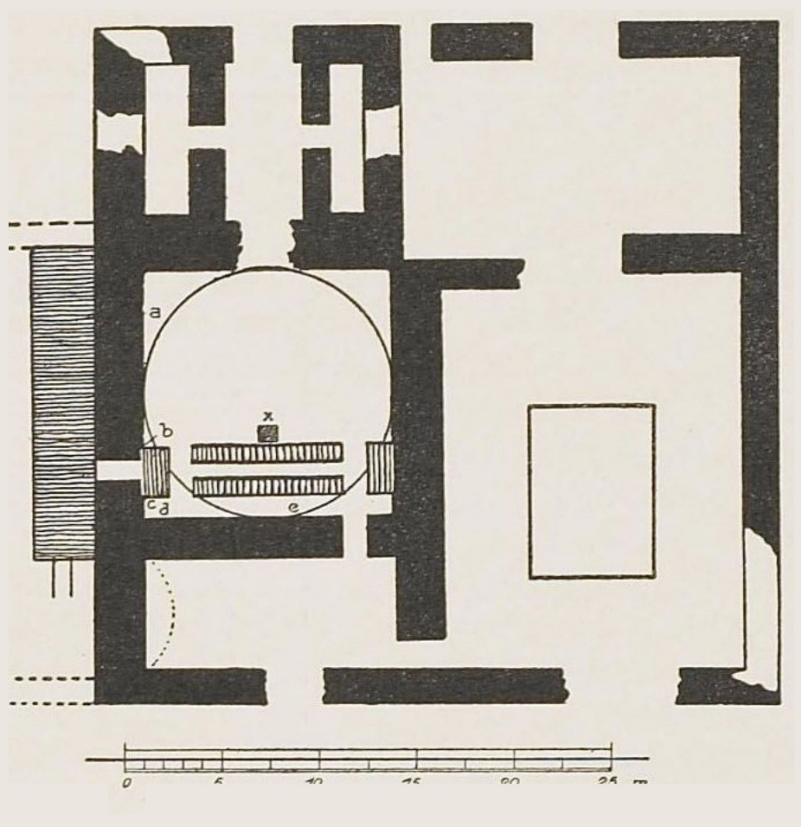
穹顶起于这座方形建筑约 2.20 m 高的墙体之上；起拱线被一道仅以泥灰抹成、饰有已严重磨损的卷草纹的檐口线脚所遮蔽。在方形平面上安置圆形穹顶时留下的各个转角，通过特制的、半球形的较小拱券与穹顶相连接。这些角拱在东南角与西南角保存良好——在北壁的两个角上，其起拱部分也还完全可以辨认。（门楼的顶盖看来曾是筒形拱顶。）

如前所述，支撑墙阻止了穹顶南侧四分之一部分的坍塌；在穹顶的这一部分上，正当旧南墙中段的上方，绘有一身略向右转、坐于莲台之上的菩萨像。其左右两侧各绘有两身望向中央画面

的同类神祇。最后，在这些形象的上方是一排坐在各自莲座上的小佛像。衣饰与坐具用红色，肢体轮廓等则以黑、白、褐三色画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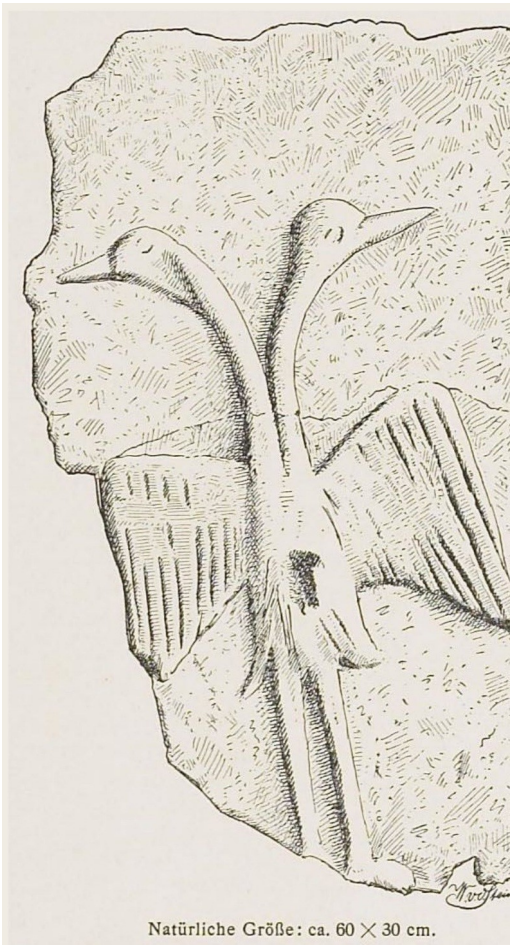
一种全然不同的装饰做法，仅在唯一一处得以保存，即在建筑的西壁上，也就是新墙以其最外侧的西北角抵住此西壁的地方。拆除该墙之后，此处发现了一件以微红色陶土做成的浅浮雕，塑出一只长腿、长颈的双头鸟（图版七〇 e），其间是同样以浮雕做成的、陡然上升的卷草状植物纹饰。这一小组图像自有其独特的风格；它究竟是穹顶原有装饰的一部分（其出土地点似乎支持这一点），还是覆盖着新寺院的整个穹顶部分都曾采用这种装饰方式（我们觉得这不大可能），我们姑且存而不论。

该建筑的照片见图版七〇。



文中插图 3　T[1] 号遗址平面图

图下附比例尺，0—25 米　｜　原书第 6 页



文中插图 4　原大约 60 × 30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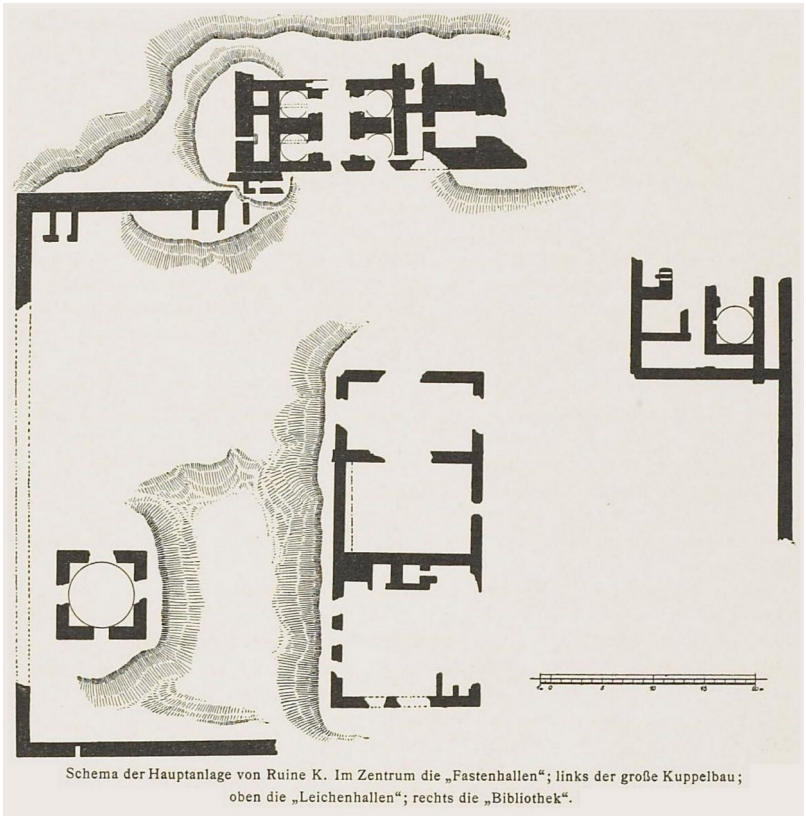
双头长颈鸟浅浮雕，微红陶土；出 T' 号寺院遗址西壁（据卷一「T' 号寺院遗址」一节，另见图版七〇 e）　|　原书第 7 页

〔原注 1：此通道未在平面图上标出。〕

K 号遗址群

> **【增订者按】**　K 号遗址群是本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此处所出的摩尼教写本与绘画，使摩尼教这一在中西两端都被扫灭殆尽的宗教，第一次有了成规模的、出自教徒之手的实物证据。勒柯克本人在本书前言中提到「对摩尼教绘画残片的确认」是这批写本给学界带来的重要认识之一，指的正是这里。
>
> 摩尼教即汉籍所称明教。它自唐代中期传入中国，回鹘西迁后以高昌为西域教务的中心。本书图版一至六所影印的摩尼教壁画、幡幢、细密画与丝绣，绝大多数出自此处；其中若干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散失或损毁，本书图版遂成孤证。

在格伦威德尔的城市平面图上以此字母标示的这一片广阔废墟群，由于我们如今可以在其中看到一座原本供摩尼教崇拜之用的建筑，其重要性大为提高；以致我们不得不把那份原非为发表、而只是为我们自己辨明方位并标记出土位置而绘制的平面草图，尽管它十分简陋，也一并公之于众〔原注 1〕。



文中插图 5　K 号遗址群主体建置示意图。中央为「斋堂」，左为大穹顶建筑，上为「殓房」，右为「藏经阁」。K 号为摩尼教建筑群　|　原书第 7 页

这份草图只包括建筑群的北部与西部；向东还连接着范围广大、但破坏极其严重的废墟，我们认为它们无疑属于同一体系；一道局部尚存的、十分厚实的墙看来在东面封闭了这一组建筑。南面也有若干废墟与这一体系相连，但在这里，我们觉得那道西南角出现在我们草图上的墙才是这组建筑在此方向上的界限。为更准确地说明遗址位置，谨作以下描述。

从 K 号遗址北侧那组小型穹顶建筑的西北角，用照相机向西瞄准，可以望见一长列小型窣堵坡寺院，在其西端耸立着 γ 号窣堵坡寺院的秀美塔柱〔译注：OCR 作 "Stüpentempels y"，"y" 当为希腊字母 γ 之讹〕（参见图版六七 c）。自该处向东瞄准，则可望见大型台地建筑 Y（参见图版六七 d）。若从〔原文此处漫漶：原书此处遗址编号缺失〕号遗址主寺主室向 K 号建筑群瞄准，则左前方是那座小型建筑（只能看见其墙的一角！），我们所藏最古老的画作（图版一〇）即取自其中；画面中央是 K 号遗址的大型方形穹顶建筑，其左方远处则耸立着 Y 号遗址（参见图版六九 a）。自 v^1 号遗址〔译注：OCR 作 "Ruine v!"，其中「!」为撇号 ′ 之讹，参照上文 T! = T^1〕西缘拍摄，则得到图版六七 f 所示的 K 号遗址的图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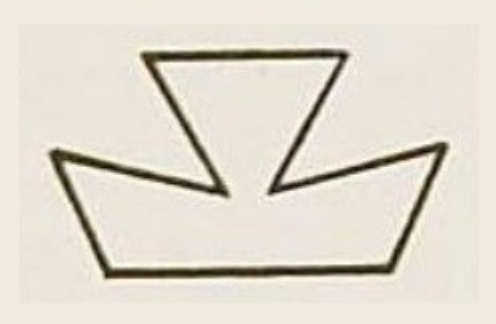
就我们在此所描述的范围而言，整座建筑分为四个部分，即：北面的一组小型穹顶建筑、东面的藏书室组群、中央的几座大厅，以及西面的大穹顶建筑。

那组四座穹顶建筑（图版六九 d）坐落在一处形状与高度都不规则的地面隆起之上，因而各个房间不得不置于不同的标高上。这组建筑基本上由一条宽阔的中央甬道构成；该甬道南北走向，显然向东、向西各开有入口，通向成对布置于其东、西两侧的穹顶室。由于甬道东侧的墙体破坏极其严重（大约是被一次地震撕裂的），而西侧的墙体则经过后期改建，因此这一说法只能视为假设。西侧两间穹顶室的这种改建，显然发生在穹顶或已坍塌、或被拆除之后：人们在向各个方向都已封闭的西侧穹顶室之上兴建了新的房屋；不过对这些新建筑已看不出多少东西。只有在新建筑的西壁上、恰在分隔两间穹顶室的那道厚墙的正上方，保存着若干彩绘残迹。一头公牛的形

象以及若干恶鬼形象的残迹，也许可以推断这一较晚的建筑是供佛教、甚或喇嘛教崇拜之用的。位于穹顶建筑以西的那两个房间，其一（北面的）是一间方形、无入口、其用途我们无从理解的屋子，其南连接着一座筒形拱顶室。此筒形拱顶室有一道朝西的门；两级踏步下到室内，其地面比东邻的、上文提到的那间新的礼拜空间的地面略低。就在这个房间里，靠近台阶、约在地面以上一英尺处，我们发现了一捆被压扁的摩尼教写本，其中一部分用粟特语、更大一部分则用突厥语写成。这些写本大多以粟特文与回鹘文书写，少数以摩尼文书写（柏林所藏摩尼教忏悔文《忏悔词》[Chuastuanift] 文本中以摩尼文书写的残片，即出自此处）。此外，Zärösc Burchan 传说的残片，以及我们所藏摩尼教细密画残片中保存最好、幅面最大的一件（图版五），也在这一捆之中。这些纸卷看来是被人抛进此室的，其时该室早已长期弃置不用，地面上已积起一英尺厚的黄土浮尘。

西侧两间穹顶室中北面的那间完全被堆积填满；可以看出，人们曾在其中沿东西向加筑了一道支撑墙——这一做法在南面那座穹顶建筑中，以及如我们所见在 T^{1} 号遗址中，同样用于支撑穹顶。两室的穹顶本身都只保存下角部的贝形拱；至于人们如何构筑那层作为较晚建筑地面的新的平顶，可惜未及观察。

北面那间只有成堆的碎渣，南面那间却整个塞满了尚穿着衣物的人类干尸，杂乱无章地层层堆叠在一起；我们在此采集了若干头骨和几只鞋子，但工作一开始，工人们很快就干不下去了——因为从这座人体遗骸堆中升起一阵阵稀薄却气味难闻的细尘。由于中国人对惊扰死者安宁一事尤为不满，这项本来也毫无结果的工作遂告停止。〔译注：此处德文原文因双栏排版，OCR 将两栏文字交错混合，今据文意复原。〕还须提及的是：在南墙中段，由于穹顶安置不够精确，形成了一处平面图上未曾标出的、狭窄的空场；此空场上立着一件以泥塑成的十字形物件，用途不明。



文中插图 6　泥制十字形物平面轮廓，用途不明

原书无图注；此线描随文排印，见原书第 8 页　|　原书第 8 页

两室的门口均已毁坏，那些不规则的开口被相当粗糙地封砌起来；墙体的旧有部分显示出若干竖向凹槽，早先其中大约立有木质支柱（图版六九 f）。北面那座穹顶建筑北侧一处奇特的、龛状的小间，我们始终无法理解；它或许与一段今已不存的台阶有关。

甬道东侧的各座穹顶建筑破坏得极其可怕；我们在那里的工作除了一小块摩尼教（？）壁画残片之外别无所获——那残片表现蓝底上的一列神祇（图版二 a），是在南面那座建筑的堆积中发现的。在它们以东，首先又是两个与上述第一对穹顶室之西的房间布置相似的房间，随后与上述建筑相连的，则是一处规模宏大、但已被拉运碎土的农民彻底清空的建筑。这处建筑未及完全绘出草图，我们的平面图上只还出现了它最西面的一个房间。

更值得注意的是东南面与之相连的「藏书室」建筑群。这组建筑中对我们最重要的房间，同样是一间穹顶室和东邻的一条长甬道——后者我们称之为「藏书室旁的甬道」。这条甬道早先或

许是一座筒形拱顶室，自上而下填满了堆积；就在这些堆积之中——因而并非在甬道的地面上——发现了大量摩尼教写本、绢画与织物残片。我们收藏的全部摩尼教寺幡（图版三）都出自此处〔原注 2〕。

〔原注 2：不过，在那里发现的绢画、织物及其他古物残件数量极多，因而只能选取若干件加以影印。有一件书籍封面颇为有趣，它大约属于那类以彩色墨水极其精心书写的摩尼教小型赞美诗册——此类册子中有一部相当完整的本子，连同许多来自其他册子的散叶，均藏于我们的收藏之中。插图所示的这一封面是摊开的，书脊由那道竖向褶痕标示出来。此封面以褐色皮革制成，因受潮的作用略有变形，故前封面的上部（图中左侧！）比下部略窄。

图案是镂刻或冲压出来的；透过图案可见的、贴有皮革的纸板封面表面，包有金箔。

封底只在中央有一处冲压或刻出的纹样，其大部分已毁；其余表面则饰以刻划的纹饰。

此处另附一件书籍封面残片的影印：那是一小块半透明的羊皮纸，染成紫红色，并以錾具精巧地打出花纹。

左侧冲有一竖排圆孔；其旁是一道压出的凹槽，凹槽向右接续三排錾出的纹饰。第一排是「开心形」纹样，第二排是椭圆形小环，第三排是更小的花朵，每朵由一个圆圈及圈内以 6 个圆点组成的图案构成。

出自同一地点、此处影印的一件摩尼教寺院画残片相当重要。它是一幅大型绢画的右外缘，其上还留有一块早先染成紫色的丝织物的残余。这块织物呈现白色花纹，看来是以「蜡染」（batik）或「绞缬」（cunari）工艺染成的。

画面的绢地施以美丽的群青蓝底色；所绘为两身坐姿神祇形象的残余，旁有童子作为侍从；两位神祇上下相叠排列；其下则出现供养人。

上方的神祇形象坐在一朵大莲花上，花瓣绘成浅玫瑰色，带深玫瑰色的晕染。莲蓬的起始部位以一道贴金箔的线条表示。衣饰残余为白色，以猩红色线条勾勒；头光以金箔制成。

第二身神祇形象坐在橙色莲座上；其衣着同样为白色、以猩红色勾边；在大腿与头光之间还可看到一件深红色披衣的部分。

头光为金色，围以猩红色边缘；其右下方出现的身光部分，外圈为金色，向内依次为一道深蓝、一道浅蓝、一道深猩红与一道浅猩红的色带。在所绘形象的大腿部位旁，只保存下舟形背光最外侧金色带的残余。

画面最重要的部分，是右侧越过头光而出的十字架；它满贴金箔，以猩红色线条镶边，并以黑色线条作纹饰。竖杆的上端与横杆的两端各嵌有三颗白色、红色勾边的宝珠。

下方神祇左侧那位跪着的童子身着白衣；披衣为褐红色，腰带为橙红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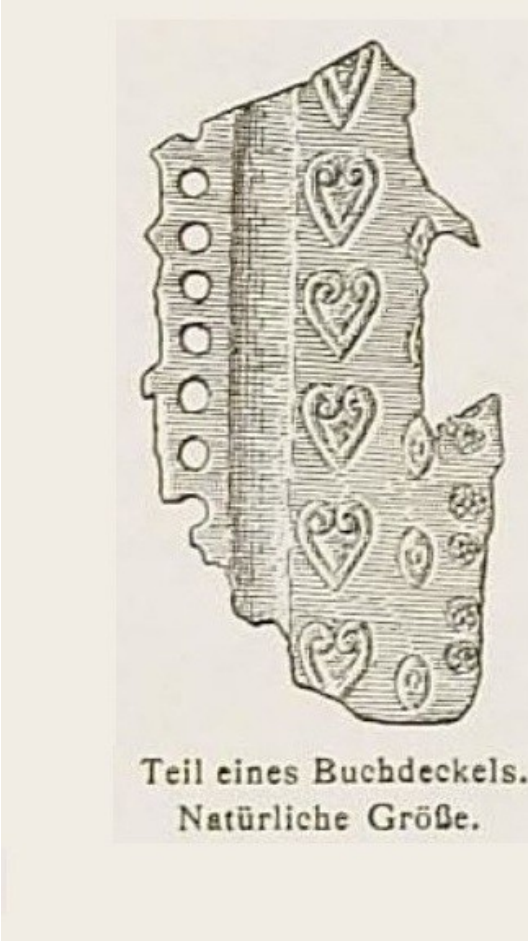
出现在莲座之下的供养人头部，梳着那种日后还将屡屡提到的奇特的蘑菇形发式；发髻根部以一条红带缠绕。衣袍为褐红色；向左还可辨认出一位妇人的发饰残迹。

那些缝在布条上的残片，其位置因与该布条相连而得以确定；至于左侧出现的三块较小残片是否安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则无法证明；无论如何它们属于这幅画。下方那位跪着的童子肯定应属于此画的另一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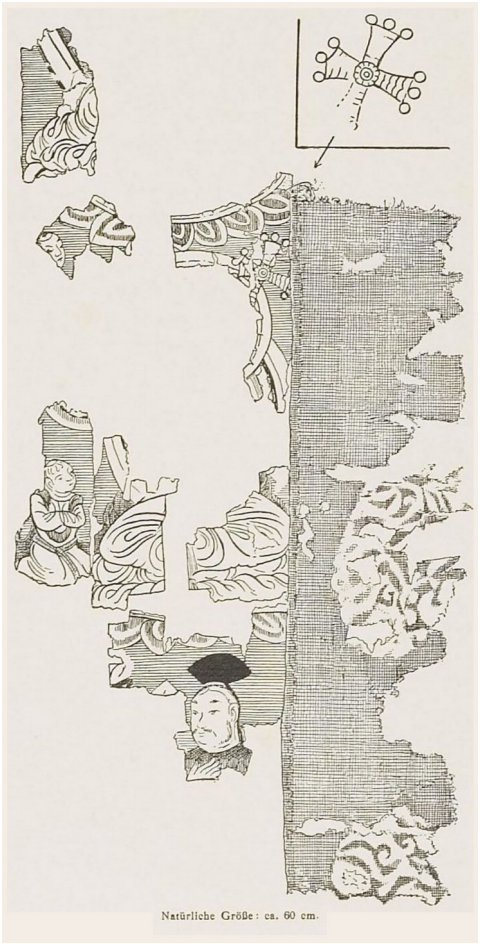
文中插图 7　书封。原大。

皮革贴于纸板，镂空花纹，下衬金箔　|　原书第 8 页



文中插图 8　书封残件。原大。

半透明羊皮纸，染紫红，冲压花纹　|　原书第 8 页



文中插图 9　原大约 60 厘米

摩尼教绢画右外缘残片，附紫红缬染绢（batik／cunari 扎结防染）；右上方框内为画面上贴金嵌宝十字架的放大摹绘，箭头指其在画上的位置　|　原书第 8 页

紧邻此甬道以西的那间方形穹顶室连同其前廊的残迹，在西北角与东南角仍可见角拱。地面以一层约 3 cm 厚的经磨光的白色石膏铺成。就在已毁的入口之前、西侧，发现一具完整的成年男子骸骨仰卧于地面上，裹在一件黄色衣袍的残余之中。穹顶室本身的整个地面覆盖着一层约 8 cm 厚的深色、松软、潮湿、富含金色与各色颜料的物质；稍加细察便立即看出，这整整一层乃是由于受潮而完全腐烂的、完整的（即并非被敌人撕碎或割裂的）摩尼教书籍构成的，其中许多装帧极为华丽。这种物质的若干块在干燥时显露出整行整行以多种颜色书写的、华美的摩尼文字母；然而尽管百般努力，终究未能挽救这座无价的藏书：干燥时这团物质碎裂为许多多边形的鳞片，一经触碰便立即化为黄土浮尘。最上层的若干块被当作样品带回；但事实证明无法加以利用。

墙壁大多已被剥去抹灰层及其上所绘的画面；据堆积中偶尔出现、但破坏程度极高的残片可知，部分墙面曾以一种华美的蓝色打底；类似我们在北面某间穹顶室中发现的那种神祇画像（图版二 a）〔译注：OCR 作 Tafel 22，据文意订正为 Tafel 2a〕，看来曾安置于此处。此外，在抹灰残块上也时而可见以鲜艳色彩绘于蓝底之上、略显僵硬的花卉纹饰的残迹。西壁低矮壁龛旁的壁画残迹仍在原位，即：龛北是身着白衣、头戴形制奇特的白帽的小型男性形象的残迹（图版二 d）；龛南则是以另一种风格绘成的、一座中国式房屋屋顶的表现残迹。

西壁西南角发现了一列向右行进、持弓箭与旗枪的武士形象的残迹（图版二 c）；据其头后（或头前）所置的白色榜题小牌可知，这些武士是回鹘将领。南壁西段呈现类似表现的残迹，只是此处所绘武士是向左行进的。同一角落的堆积中还发现了画技高超但破坏严重的头部残迹——一位蓄须的摩尼教徒和两身神祇（图版二 e）。在入口附近地面的空处，我手下人锐利的眼睛还发现了若干枚圆形玻璃珠。

与这间我们称之为「藏书室」的穹顶室之间隔着一条甬道，西面是一间矩形房间，其墙体只保存到约与人等高。此室的发掘一无所获，只在南侧能辨认出微弱的莲座残迹以及这里那里破坏严重的恶鬼头部；当时我们把它们视为佛教壁画的遗存，但它们也很可能属于摩尼教的神祇体系。南面那两个长条形房间的墙上有些地方还留有丰富贴金的残迹；发现的东西只有一枚象牙小棋子（参见图版六四 e），它躺在藏书室以南那个较小房间靠门处的地上。

在整座建筑群大致的中心位置上，有三座共同构成一个宏大矩形的大厅〔原注 3〕，其中南厅最大，北厅最小。

北厅的四壁均部分毁坏，因而无法确定入口原先可能位于何处；此厅墙体的西北角部分损毁，就在这里、与墙体最下一层砖同高的位置上，躺着一块不规则的圆形石头，直径约 75 cm，侧面凿有极为粗糙的莲瓣。石头呈绿色，因土中所含盐分而受到严重侵蚀；当我让人把它翻过来时，可以看到朝下的那一面刻有一篇篇幅可观的汉文草书铭文。这块碑石被粗略地凿成台座状，想必一度用作某尊塑像、或许也可能是某根柱子的基座。一件雕饰丰富的木质柱础（图版六一 a）躺在约一米深处，靠近因北墙毁坏而形成的入口，且在入口的东侧。除这些物品外，此厅中别无所获。

中厅的破坏程度最轻；只有北墙有一部分被拆去。东面封闭该室的墙保存尚可，还留有旧有的入口；此入口与本地区佛教建筑上所开的门洞有显著区别。原来，后者的门柱在很多情况下是斜收的，以致向内张开〔原注 4〕；而此建筑中门柱的侧面则彼此平行；门柱的转角处则以直角切出凹口——大约是为了嵌入木梁。

此厅西侧，在原有墙体之前另立了一道较晚的、较为单薄的墙；被这道较晚的墙所遮蔽的旧墙表面，仍保有原有彩绘的一部分。墙面中央是一幅已毁至无法辨识的画像：一位身着绿、红衣饰、看来黑发、蓄浓密黑色络腮胡的人物正面端坐于一朵红色莲花之上。这些细节已很难辨认。在同一墙面更靠北处，原先安置着一幅摩尼教大祭司像（图版一），他望向刚才描述的那位神话人物（即朝向他自己的右侧）；就在我们抵达的那一刻，此画正被寻宝的农民撕扯下来，我们来得正是时候，得以从这些人手中把它买下，并查明其来历的详情。正如第三次考察队在此处的发掘所表明的，在那位神祇的另一侧也绘有一幅类似的大祭司像；这一情况可能使我们「此画乃摩尼（Mani）的传统肖像」的假定显得可疑。在墙以东的堆积中发现了若干摩尼教写本残片，其中有一叶，一面是一幅破坏严重的细密画，另一面则以摩尼文字母、中古波斯语列举了回鹘可汗的宫廷职官〔原注 5〕。

南面封闭此室的墙，其南侧建有若干伸入大南厅之内的方形小附建体；此处发现了各种陶片，还发现了一枚有趣的中国形制铜钱，钱上有粟特文（「回鹘文」）铭文。这是一枚突骑施可汗的钱币，大约属于 8 世纪的最初数十年〔原注 6〕。

南厅内的发掘完全没有收获。

紧挨着这组厅堂西墙的下方，地势下沉，形成一种洼地，其底部由一层极易碎裂的黄土构成。这层土中发现了无数体量可观、密布纤细长根须的根茎块；它们虽然体积很大，重量却极轻，总

的说来给人的印象是，它们必定属于某种水生植物。分布着这些根茎块的地带，自厅堂群西墙南半段的下方一直延伸到那座位于平缓斜坡上、但地势相当低的方形穹顶建筑附近；随后它继续伸入穹顶建筑与恰在此处保存得很高的围墙之间那片没有废墟遗存的地面，并在那里达到最大深度。自穹顶建筑的大门向西，植物遗存便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在此发现了大量器皿残片，其中还有几件以各色陶土烧制、造型颇为秀美的钵盘（图版六五）。此处曾有一处水池设施，看来是毋庸置疑的；但由于土壤性状使得早先存在一座普通池塘一事不大可能，或许可以设想在厅堂与穹顶建筑之间、以及穹顶建筑与围墙之间的空地上，曾有一处台地式的水池设施。我们带回的根茎块标本装在一只画箱里，可惜在开箱取画时遗失了。

那座大穹顶建筑（图版六九 a、b、c）位于厅堂群以西一处不高的地面隆起之上，保存状况不佳。穹顶几乎完全毁坏，只在西南角与西北角，于这类建筑所特有的角拱或贝形拱之上还保存着其拱面的一部分。除南侧外，各面墙体均被强行凿穿；只有南侧保存完好，那里就是入口大门，高约 2 m，基部宽度相同，以一道宏大的券拱优美地起拱。由于吐鲁番绿洲所有类似的穹顶建筑都只有一个入口，我们推测这座建筑也只有这一个入口。内壁的抹灰层早已被剥除，我们在建筑内部多次进行的发掘也没有收获。尽管如此，作为高昌保存下来的、我们从波斯所熟知的那种建筑类型的最大实例，这座建筑仍具有特别的意义。

在环绕整个 K 号废墟群的大围墙的西南角，我们发现了若干晚期的蒙古文文书〔原注 7〕；它们埋在十分松散的黄土中，深度不大。

〔原注 1：由于格伦威德尔教授希望亲自执行考古工作，我在其他各处也只为自己勘查过的寺院绘制了平面草图。然而当第三次考察队访问吐鲁番时，要做的其他工作实在太多，以致根本无法考虑在高昌与胜金口测绘寺院平面图。因此我也把自己其余的平面草图一并奉上，并希望人们把它们视为各寺院平面的示意图。〕

〔原注 3：这些厅堂在某一特定时期曾供摩尼教崇拜之用；它们或许可以视为我们从摩尼教忏悔文（《忏悔词》[Chuastuanift]）中所知的「斋堂」（Caǐdan）的实例。参见 F. W. K. 缪勒，*Uigurica II*，第 93 页，载《普鲁士皇家科学院论文集》1910 年卷，G. Reimer 1911；以及 A. v. Le Coq, *Chuastuanift*，第 36 页，载《普鲁士皇家科学院论文集》1910 年卷附录，同上，1911。〕

〔原注 4：类似的入口见于拉萨大寺的侧殿，参见 Waddell, *Buddhism of Tibet*, London 1899，第 302 页。但它们在克什米尔的古寺中也有出现。〕

〔原注 5：此后已由 F. W. K. 缪勒教授刊布于《维尔海姆·汤姆森纪念文集》，Leipzig, Harrassowitz 1912。〕

〔原注 6：参见 F. W. K. 缪勒，*Uigurica II*，第 95 页注，载《普鲁士皇家科学院论文集》1910 年卷；G. Reimer, Berlin, 1911。〔译注：OCR 作 "4ck F.W.K.MÜıLer"，即脚注 4「cf. F. W. K. Müller」，本译文按本节脚注顺序编为原注 6〕〕

〔原注 7：参见 G. J. Ramstedt, *Mongolische Briefe aus Idiqut-Schähri bei Turfan*，《普鲁士皇家科学院会议报告》XXXII，1909，G. Reimer, Berlin。〕

立有碑石的窣堵坡寺院

在环绕「汗王宫」的围墙西南角以西南偏南约 150 m 处，一座低矮的台基之上，立着一座破坏极其严重的小寺院的残迹。只有东壁和北壁的一部分（门原在北壁上）以及窣堵坡的东侧尚存；仅仅还能确定，此寺院由一座前廊、窣堵坡以及环绕窣堵坡的甬道构成。在清除堆积时，发现了一块红砂岩石板，高约 98 cm、宽 56 cm、厚 22 cm；石板上刻有一篇汉文铭文，斜倚在前廊的东墙上，距通往甬道的入口只有几英尺。台座——如果曾经有过的话——已不存，我们也无从知晓发现地点是否真的就是此碑石原定的安置位置。

各壁上的壁画处处毁坏，只有东北角除外：在那里，距地面约 1 m 高处，北壁上保存着一幅精美壁画的残余。这幅小画（尺寸为 75 cm 与 30 cm）被切取下来；它是优楼频螺（Urubilvā）神变的一部分（参见 Rockhill, *Life of the Buddha*, Trübner, London 1884，第 41 页）。

可以清楚地辨认出一位头发染成蓝色、身披豹皮的婆罗门，他似乎站在一座橄榄灰色的编织小屋前。在他身后和身前（下方）站着另外两位婆罗门，身躯染成靛蓝色；第四位的双腿出现在右上角。小屋的门柱贴有金箔，并饰以黑色勾边的圆圈。小屋门前可见一条巨大的吐火之蛇身躯的一部分，以白色、黑色与橄榄色调绘成。火焰以带深色分隔线条的金箔表现。这条蛇似乎正没入一个深色的圆形物体之中——那也许是佛陀的钵，而佛陀想必应被设想为站在它的左侧。

这幅小画已严重褪失；W. 冯·登·施泰嫩（W. von den Steinen）先生用明箱（camera lucida）将它摹绘了下来。



文中插图 10　优楼频螺（Urubilvā）神变壁画残片摹绘：披豹皮的婆罗门与吐火之蛇

出「立有碑石的窣堵坡寺院」北壁东北角，画面 75 × 30 厘米；W. 冯·登·施泰嫩以明箱（camera lucida）摹绘　｜　原书第 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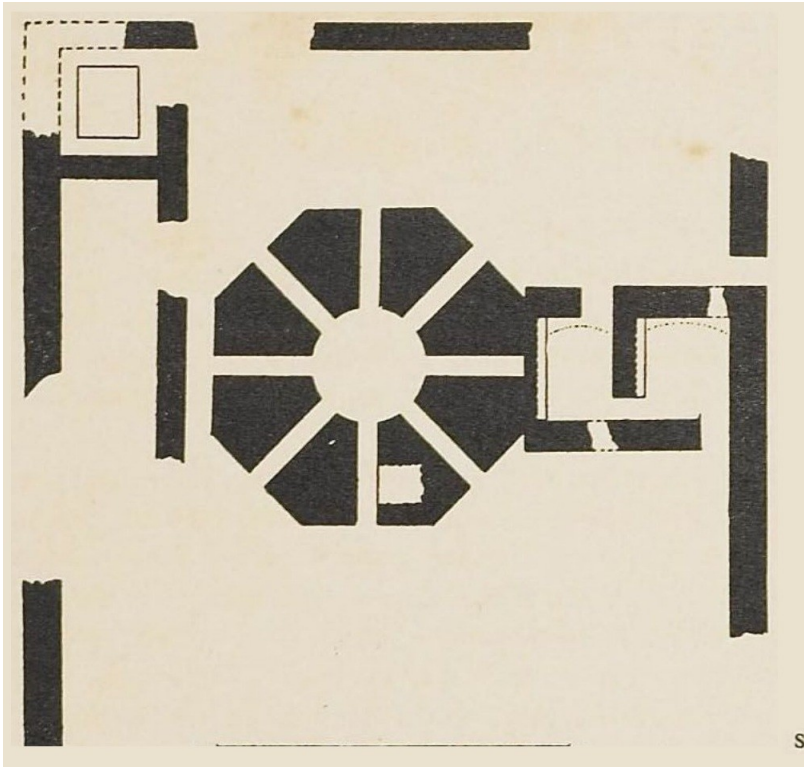
北窣堵坡群中的「最大窣堵坡」

格伦威德尔所称「北窣堵坡群」中最大的一座窣堵坡（参见《亦都护城》第 112 页），其圆形的内部为约 3.50 m 高的墙体所环绕，里面藏有大量堆积、砖块以及若干粗糙的梁木与板条，后者的用途我们始终不明。窣堵坡基座的平面为八角形，并有八条低矮的拱顶甬道。窣堵坡的南部，在厚实的砌体中开有一个大龛，无法断定它究竟是偶然形成的，还是营造者原本规划、后来

被破坏了的一个空间。两座筒形拱顶室——每室西侧均有低矮的台座式坐台——加建在窣堵坡的东部。

清理这座建筑所得的唯一成果，是图版五六所示的表现僧人的小型木雕像；它们躺在圆形内室以夯实黄土构成的地面上，且在其西北部；紧靠通往北甬道的入口处，靠墙躺着一小块抹灰面，上面绘有一列向左行进、身着回鹘装束的女子形象；她们头旁的榜牌以回鹘文写出她们的名字，可惜至今尚未释读。此画已严重褪色。

除这些东西之外，此建筑中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之物。



文中插图 11　「最大窣堵坡」平面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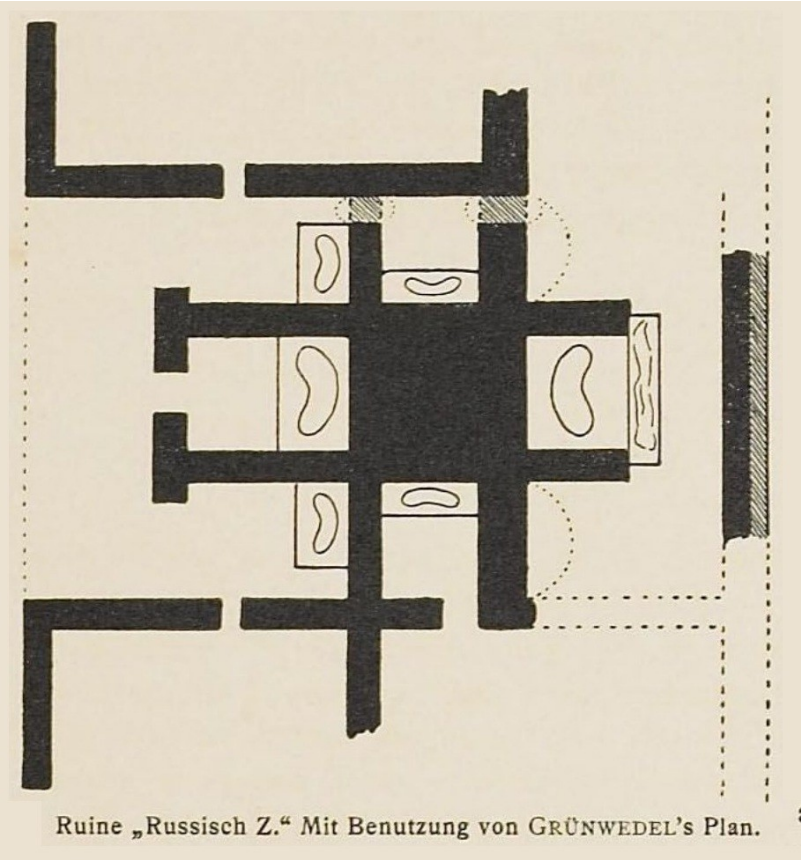
图上附比例尺，1 米—15 米　｜　原书第 10 页

「俄国人 Z」寺

格伦威德尔（《报告》第 108 页）如此命名的这座大寺院，位于旧城墙东北角以东、通往鲁克沁（Luk-Tschun）道路的北侧。南立面（图版七一〔译注：OCR 作 "Tafel 71,2"，子图字母漫漶〕）在西侧可见一座形制简陋的现代客舍；就在朝南开敞的主室正前方，同样立起了两道粗劣的现代墙体，构成一个新的入口。东南侧可以看到一座以泥土砌成的现代烤炉的低矮锥体。据说所有这些新建之物都是不久前奉鲁克沁的王（Wang）额敏和卓（Ämin Chödscha）之命修建的。

朝南的主室已被突厥农民清空，室内堆积的瓦砾与砖块都被搬走——后者被他们用来修建那座小客舍等等。沿后壁的宽阔的、条案式坐台仍可辨认，早先那尊巨大的佛像即端坐其上；同样，右上臂的一部分还从同一后壁的西段以高浮雕形式凸出，它一如既往，是在若干粗木棍与芦苇捆扎成的内芯外面用泥塑成的。各壁上均看不到彩绘的痕迹；但对墙体的细致勘查表明，这座寺院与「K」号建筑群的中厅以及别处一样，也曾在旧墙之前另立较晚的墙，具体而言，西侧壁与东侧壁即以这种方式被包覆。旧西墙与佛像肩部之间的空间，几乎完全被这道墙填满；其下部在条

案式台座的高度上破坏得相当严重。拆除这些墙之后，东壁上只发现了小块壁画残迹，即一位身着褐衣的跪姿僧人形象，以及在被新墙厚度所遮蔽的那部分后壁上，一具保存不佳的蓄髭恶鬼头部（大约是一幅金刚手 [Vajrapāṇi] 表现图的残余）；此画以奔放的线条画得颇为熟练，但略嫌粗率。西壁则在移去较晚的墙之后，显露出一幅巨大的佛像壁画（图版七一 g）；在佛足旁北侧，绘有一位手持香炉、面朝佛陀跪着的僧人形象。佛陀南侧则是一位身着我们称之为「回鹘式」服装的女子形象（图版一一 d）。那处略呈圆形的转角受到墙体窄面的保护，为我们保存下一位手持长颈净瓶的阿罗汉形象。所有这些画都以寥寥数笔大胆的线条画得极为流畅；色彩则显出某种单调。佛陀身着褐红色百衲衣，衲片的接缝以硫黄色条带表示。身光同样为红褐色，带黄色边缘。粗略画出的莲花有褐色与红色的花瓣。佛像只有下半部分保存尚可；上半身大部分毁坏，虽然左肩的一部分尚可辨认，但彩绘已模糊到如此地步，并且被融雪或雨水冲下的泥土所覆盖，因此不宜揭取如此大的一片画面。旁侧的诸身像则被切取并收存。



文中插图 12　「俄国人 Z」号遗址（据格伦威德尔原图绘）

原书第 10 页

建筑中朝东的部分（图版七一 f）破坏极其严重；在昔日立于此处的三（？）间屋子中最居中的一间里，原有一尊涅槃佛（Nirvāṇa-Buddha）。卧佛的大致轮廓仍可辨认，但没有一处保存得足以供研究之用。清除相当可观的堆积之后，台座露了出来；台座正面的一篇铭文被切取下来，此时可以看出，不仅这座建筑、连同台座也曾多次经历改动。据我们的确认，台座曾三次重新抹灰并彩绘。最早一层的彩绘除少许颜料残迹外已荡然无存；最晚一层的彩绘则除了绘于南三分之一处的那篇铭文之外，全部消失。中间那层抹灰面上却还留有若干以高雅风格绘成的壁画残迹；它们只在台座的南半部保存下来。这层抹灰面上保存得最好的一身形象附于此处，以便对其风格略有印象。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僧人画得格外拙劣的双足。



Mönchsfigur vom Sockel des Nirwāṇa-Buddha. Hautfarbe weißlichbraun mit rötlichen Schattierungen. Kleid purpurrot mit gelbem Muster und Borte. Flammenaureole rot in drei Tönen, grün, graublau. Zickzackmuster in denselben Farben, Lotusblätter am Sitz rot und gelb. Natürliche Größe: ca. 68 cm hoch.

文中插图 13　涅槃佛台座上的僧人像。肤色白褐，带红晕。衣紫红，缀黄色纹样与镶边。火焰背光作红（三色阶）、绿、灰蓝。之字纹同色。座上莲瓣红、黄。原大约高 68 厘米。

逐项色彩记录，复原可径用　｜　原书第 10 页

最后，朝北的主室几乎完全被坍落的砖块填满。我们让人通过北墙旁向东、向西开设的拱顶门道把它们清出，随后在南侧发现了一尊佛陀的（已毁的）巨像，立于一座宽 3.02 m、高约 90 cm 的台座上（图版一二）。在堆积中找到的佛头被砸得极其严重；仍可确定它属于我们从柏孜克里克寺院的（绘制的）誓愿图中十分熟悉的那一类型。这个房间的侧壁（东壁与西壁）同样被较晚的墙所遮蔽。西侧，在墙的南半部有三身画得很好的佛像，属于图版一一 a 所示的类型；而在南壁那处圆转的转角、较晚墙体窄面之后，保存着一身金刚手形象的残迹。

东侧原有一列类似的佛像；它们与填充南角的那身立像一样，破坏极其严重。在台座与通向东面的门之间，发现了一处极为奇特的表现：一尊以同样色彩绘成的立佛，右手持杖，正扬起作击打状！（参见图版一一 b）

关于这尊佛像台座的描述，请参见图版一二的说明文字。

四、高昌周边的发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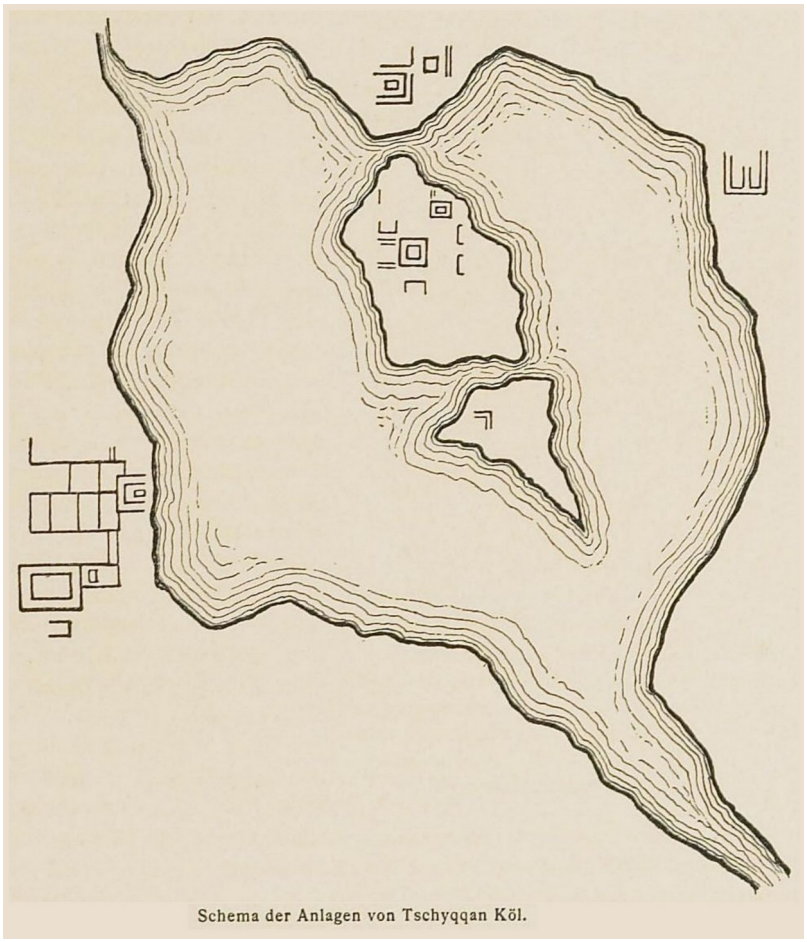
> 底本：Albert von Le Coq, *Chotscho*, Berlin 1913，PDF 页 21–23（原书页 11–13）。

> 章题原文：DIE GRABUNGEN IN DER UMGEGEND VON CHOTSCHO。

〔底本 PDF 页 21 ／ 原书页 11〕

齐干湖（Tschyqqan Köl）

二月初前后，酷烈的严寒稍稍缓和。我们与当地突厥农民〔译注：原书以「突厥人」称吐鲁番一带的维吾尔居民，下同〕已渐渐结成友好的往来；其中一人在此时告诉我们：在胜金口峡谷（Schlucht von Sängim）一条名叫齐干湖（Tschyqqan Köl）的支谷里，有一处从未有外人到访过的古代聚落。我们随即动身前往这个距哈拉和卓（Qara-Chödscha）约 25 km 的地方，一番寻找之后找到了那处聚落。为抵达该地，我们沿着通往木头沟（Murtuq）的道路，取道胜金口峡谷、循河流左岸而行；在木头沟河汇入处的桥上渡过河去，随后沿右岸继续溯流而上，直至一条较小溪流的汇入口。溯这条小溪进入它的谷地，我们忽然置身于一片相当开阔的平原之上；平原中央为一个小湖所占据，湖中含有两座小岛，周长估计约 3½ km〔译注：原书此处分数 OCR 残损，据行文体例当为 3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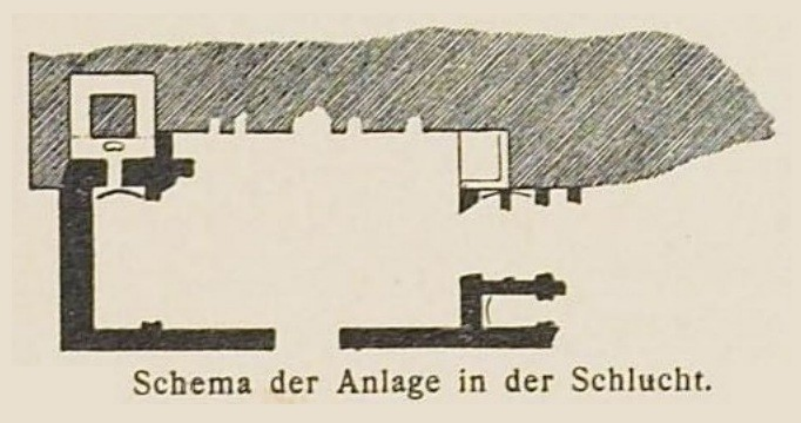


文中插图 14　齐干湖（Tschyqqan Köl）建置示意图

高昌周边遗址　｜　原书第 11 页

在这片浅湖或曰沼泽的岸边四周，环列着为数众多、惜乎保存不佳的废墟；它们是一些寺院建筑，与胜金口峡谷中的寺院相仿，其大部分或许属于一个相对晚近的时代。岛上同样有类似建筑的废墟，其中较大的（北面的）岛上一座较大的塔庙（Stüpentempel，参见图版七〇，图 i）是最重要的建筑物。湖的西南方有一组废墟，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一座「tura」式的、即金字塔状的实心砖砌建筑，以及位于其南面的一座塔庙（参见图版七〇，图 k）。这座小塔庙内有两尊奇特的、以托座固定于壁面上的半身像，图版五四 b 中已加影印。这些建筑的北面还有许多保存不佳的寺院，其中一座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它依照与胜金口峡谷第 7 号寺院建筑群西南侧那座较小的附属建筑相同的平面建成。不幸的是，临水之近对这些建筑是致命的：湿气自下而上侵入了寺院所立的夯土（Löß，黄土）台基，也侵入了台基之上的墙体；在我们所调查的一切寺院中，壁面装饰的任何痕迹都已荡然无存。因潮湿而变硬的地面里，只出土了少量汉文写本、一件精美的刺绣（发现于岛上最大的那座塔庙内），以及若干件未经烧制的泥塑小像和小像头部（参见图版五四）。

在湖的西南方约一公里处，一条带有干涸河床的狭窄峡谷汇入谷地；就在这条峡谷的谷口附近，我们发现了隔谷相望的两处寺院建筑群，其中位于河床右岸的一处较大。它由若干石窟寺组成，其前方有几座地面独立建筑和一个长长的前庭。这一组寺院所凿入的岩体所在的山脊之上，另有三座毁损严重的小窣堵坡。



文中插图 15　峡谷中建置示意图

胜金口峡谷　｜　原书第 11 页

这些寺院大多因顶部塌落而毁坏严重，以现有的人力物力进行调查已属不智；只有其中一座、即位于西北方的那座，得以部分清理。它由一间狭窄的前廊、塔柱（Stüpapfeiler）以及绕塔柱而行的甬道构成：其平面的示意图附于此处。

前廊中的壁画尚有一部分保存下来。主尊像——一尊塑像——已毁。诸背光以黑、绿两色的折线纹饰于白地之上；背光的边缘上绘有若干头光与身光皆施金的小佛像。前廊墙壁的两个短边上原有佛陀及其胁侍的图像，但大部已毁。前廊的拱形顶部绘有方格藻井的图样；在起拱处、通往甬道诸入口的上方，绘有双排的飞行形象（乾闼婆 gandharva），演奏着各种乐器。塔柱的正面、佛陀背光的左右两侧，绘有僧人或神祇的立像；甬道之中也处处保存着类似的形象。这些壁画中尚可辨识者，都费尽气力被切割取下；它们的绘制风格较高昌与木头沟所存的多数画作为古，依我们之见，与图版一〇诸图在画法上相通，当归入五世纪或六世纪。因此，依我们的看法，峡谷中的这处寺院建筑群比湖畔的诸建筑更为古老。图像未予影印复制，因其以摄影方式只能得到很差的再现。

由于几乎完全没有获得写本方面的收成，我们放弃了在这处建筑群（以及湖畔诸建筑）内的进一步工作；河床左岸凿入崖壁的诸室仍完全为黄土堆积所充填。入口处施工的粗糙，以及门附近墙面全无任何装饰这一情形，使我们推测那些是居住用房。调查遂延至日后进行。

我们在胜金口峡谷获得了有趣的成果；峡谷内的各处建筑，我们是自南向北推进着调查的。

胜金口峡谷（SÄNGIM AGHYZ）

早在进入峡谷（äyiz、〔原文此处漫漶〕）之前，河的右岸、紧靠道路处便有一座巨大的空心建筑，当地人以「tura」一词称之（参见图版七二，图 a），其形状类似一座截去顶部的金字塔。

它在南面正立面上开有一个入口，内部空间估计可容 8 至 10 人。此类建筑（此处及彼处的同类者[1]）究竟是隐修者或数名僧人的居所（vihāra 精舍），抑或是祭祀场所，又或者它们其实更多地服务于军事目的（例如作为扼守峡谷入口的哨所），我们存而不论；它们也有可能在不同的时代先后服务于上述所有用途。

格伦威德尔（Grünwedel）标为第 1 号与第 2 号的两座寺院（参见图版七二，图 a 与图 b）位于溪流左侧的高地上，未产生任何具有重要性的结果；格伦威德尔此前已经勘察过它们，而由于他未曾切取任何一幅壁画，我们也就没有尝试抢救古物，而是把一切考古工作都推迟到日后。我们所受的特别嘱托——即抢救写本——并未因清除上寺内的沙土与瓦砾堆积而得到推进。而下寺中困难得多的发掘，同样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收获。

自第 3 号寺院稍向下游、与位于那里的哈拉和卓村[2]最末几户人家相对之处，在最后一段高峻陡峭的岸边崖壁上，发现了一座毁坏极其严重的石窟寺，从中抢救出了若干泥塑小像的头部；但无论在此处，还是在位于河流分岔处下方的「山坡后」寺（Tempel „hinter der Berglehne"，第 5 号），都没有找到写本。后者的主室与甬道（参见图版七二，d）虽被仔细清理至铺有白色光滑灰泥的地面，但除了图版五四 f 所影印的那件头像之外，一无所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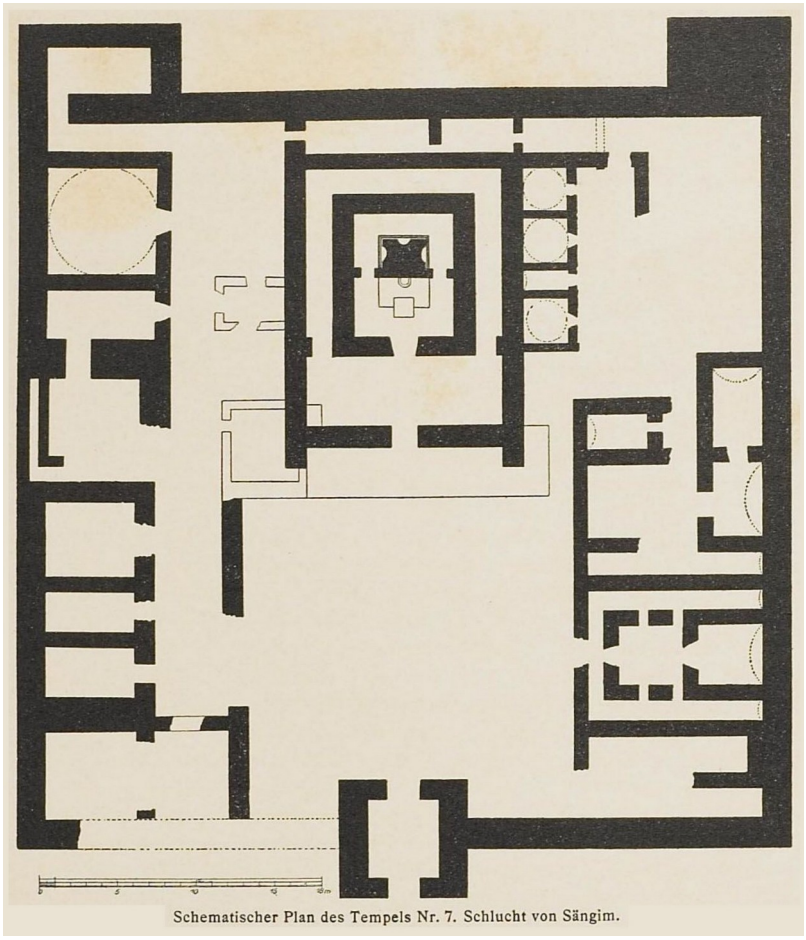
第 7 号寺院则给了我们较好的成绩。它见于图版七二，图 e 与图 f；随附的平面示意图将说明其布局。该建筑群构成一个大的长方形，四周为一道厚实的围墙所环绕，围墙东侧建有两座塔楼。入口位于西墙正中，原先以两道、也许甚至四道门加以防护。入内者右手边是一座较小的寺院，主寺则与入口相对，倚东墙而建。其余各室的用途已无从确定。

〔原注 1：一座类似的塔状建筑位于哈拉和卓溪流的下游、村中一座园圃之内，被突厥农民用作粮仓或住房。第三座、但为实心的这类建筑，位于胜金口峡谷内溪流右岸一处岩石的崖头上，靠近木头沟河的汇入口（参见图版七三，图 h）；第四座位于木头沟第一组石窟寺之前；此外尚有多处。

另有一座同类建筑，但呈圆形，位于自哈拉和卓通往吐峪沟的道路以南、距雅库布伯克（Yaqüp Beg）的城堡不远处〔译注：即阿古柏〕；它的奇特之处在于有一道低矮的坐台，除入口一段外绕内室一周。不过许多「tura」是全然实心的，内部并无房间。〕

〔原注 2：并不存在一个名叫「胜金口」（Sängim-Aghyz）的地方。〕

〔底本 PDF 页 22 ／ 原书页 12〕



文中插图 16　胜金口峡谷第 7 号寺院平面示意图

图下附比例尺　|　原书第 12 页

图注：胜金口峡谷第 7 号寺院平面示意图。（原文：Schematischer Plan des Tempels Nr. 7. Schlucht von Sängim.）

我们先来考察这座主寺。其正面之前有一道低矮的台地，由台地经一道拱门进入前廊。我们发现这座前廊内积有少量瓦砾以及大量砖块，堆积高度不大。清除这些碍事的堆积物（Impedimenta）之后，可以看出地面原先铺有磨光的白色灰泥，其残迹处处犹存。

墙壁上已剥去了一切装饰；西北角上立着一座用未烧制的土坯砌成的高大而低矮的台座，其抹面与装饰均已无存。

环绕主室的甬道自左右两侧通入前廊；但这些甬道中的堆积因屡次融雪而板结成极硬极黏的黄土块，以致其中已不可能指望有写本；依我们的经验，古物在这样的土层中要么根本找不到，要么已毁坏到无法供研究之用的程度。约 2 m 厚的堆积中，只有最上面几层是干燥的，它们使少数尚存的造像作品免于毁灭。

我们自前廊向主室推进，发现主室本身又构成一座完整的寺院，具有前廊、塔柱以及绕塔柱而行的甬道；因而它虽是一座以土坯砌成的建筑，却令人想起更西面诸聚落中那些更为古老的、凿岩而成的石窟寺。至于为何要在这座本身已然完备的建筑之外，再加一重带有宽阔甬道的前廊，则不得而知。

主室及其内层甬道系统的地面覆有一层厚实且保存良好的磨光白色灰泥。在塔柱正面、与门相对之处，立着一座低矮的五边形台座，用以安置主尊像；而深深刻入地面的沟槽——构成一个

长方形、其前部又嵌入一个正方形——大约标示出原先设置栏栅与供桌的位置。塔柱朝向各甬道的一面设有三级矮阶，并各设一龛（每条甬道各对一龛），每龛供奉一尊神像。值得注意的是通入甬道的诸入口之狭窄。

紧靠主尊像台座之前、以及右侧甬道入口之前，杂乱无章地散落着若干未经烧制的泥塑头像和一具躯干（图版五五），它们原本都属于恶魔（Dämonen）塑像；在供桌大约所占的那块方形区域的左侧，躺着那件小木塔（图版六二，图 i）；而台座之上则放着那件奇特的木质器物（图版六二，图 b），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看作香盘。



文中插图 17　供养人像，第 7 号寺院。原大高 46 厘米。

戴高冠之男像　｜　原书第 12 页

在圣所内侧门墙的右（南）半部墙面上，约与人等高之处，尚可辨认出一排三个男子头像（供养人像）；他们都戴着那种高高的金色帽子，这种帽子我们从摩尼教细密画（图版五）以及柏孜克里克第 12 号寺院佛像台座（图版三八，c）上早已熟知。这面墙显示出明显的火烧痕迹，图像又因烟炱和融雪之水而损坏严重，以致只有一幅得以抢救下来（见本页插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那种以浮雕表现帽上纹饰的技法。在这座前廊的堆积中，我们还找到了一幅以同样奇特的技法绘制的恶魔像（参见图版三九，b）。

令我们遗憾的是，此处同样没有找到任何写本；不过在外层甬道的北道与南道墙面上，处处还保存着一些图像残迹。

在南甬道的入口处，北壁之上、与塔柱相对，立着图版一三所示的那个恶魔形象。南侧还保存着若干壁画，即图版一四所影印的诸图，以及该图版说明文字中所述的地狱图。

在这条甬道中还发现了一段长 66 cm、宽 14.5 cm、厚 6 cm 的梁木，其正面在美丽的棕红色底子上呈现出与图版一四，a 上缘所见相同的卷草纹。这段梁木或许属于门框一类的构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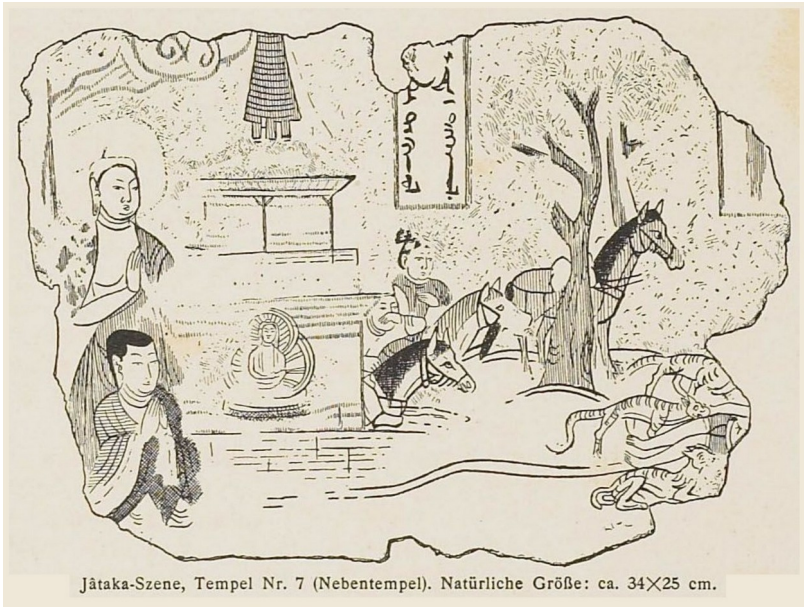
北甬道的墙壁上，壁画几乎已被水彻底毁去。仅在南壁上、距门约一米处，保存着一幅宽 100 cm、高 64 cm 的画面；可惜其状况极差，画面内容很难辨识。因此未予影印复制，我们仅以简短的描述为限。

画面的中心为一群少女或妇人所占据，她们跪在一位僧人长长伸展的遗体周围恸哭；向左则出现一名骑者，正纵马狂驰向左疾去。他全身披挂，挥舞着一柄直剑；左臂上带着一面圆盾，盾的外表面呈现出涡旋纹样（锤揲工艺？）。画面右侧的诸形象则几乎无从辨认：我们以为，在一大片涂成黄色的半圆形面之前，可以看到一位僧人的头部。——

其余诸建筑或许部分为居住用房，部分为杂务用房；只有那座在进入建筑群时立刻可在右手边、庭院南侧望见的大型建筑，显然是一处祭祀场所。

这处布局颇为异样；据我所知，只有齐干湖西岸的一座寺院可作为第二例。其主室与前廊由一个筒形拱顶覆盖。前廊有一个主入口，两侧墙上又各开两个较小的门洞。这两处空间的北、西、东三面绕以一条狭窄的甬道；但主室南面之后并无这样的甬道：此处即以巨大的围墙充作建筑的墙体。这处建筑群的壁画所存无多；盗宝者已将主室的南墙毁去大半，只在东南角我们还找到了少许尚可辨识的壁画残迹。

其中较大的一处位于该角落、距地面约 1.20 m 高处；那是一幅画得相当粗率的本生（Jātaka）图。在右下角



文中插图 18　本生故事画，第 7 号寺院（附属小寺）。原大约 34 × 25 厘米。

画面右侧有回鹘文题记　｜　原书第 12 页

可以看到一位菩萨的身体，他已将自身舍与三只饿虎为食；再往左是他系于树上的马，以及寻找这位少年的仆从（？），神态中透出惊恐。他们的左侧立着为纪念这一舍身之举、为安奉菩萨遗骨而建的窣堵坡，塔前有若干礼拜者正在行其虔敬之礼。榜题牌上的文字中可辨出两次出现「……tigin ol」＝「这是……王子（tigin）」。

最后，我们在这个房间的堆积中还找到了一小幅保存于一块坠落抹面上的婆罗门像，身披虎皮。它以另一种风格绘成，早先曾满施金地为底。

在这座寺院中同样没有找到可用的写本。

〔底本 PDF 页 23 ／ 原书页 13〕

与这处寺院建筑群相对、但位于溪流右岸，有一座小殿（参见图版七二，f），其门向东开启：若人站在主寺主室内主尊像的台座之上，用照相机穿过诸门洞的中心瞄视，便会发现这座小殿西墙的中点，恰好正对我们这座寺院主室墙上原先安置主尊像的那一部位。

谷中与山脊之上的众多窣堵坡都作了调查，但未能有重要发现；在所有窣堵坡中都找到了婆罗米文写本的碎片，回鹘文或汉文写本的碎片则较为少见。一件尚属完好的摩尼教写本，以及带有藏文题记的陶范押捺像、一种锦葵属花卉的干花，还有带回鹘文与婆罗米文涂鸦的怪诞图画（例如一幅分娩场景），是在右岸最上游的那座窣堵坡中找到的，该塔紧邻第 9 号寺院以北那座狭长的建筑废墟（参见图版七二，h；该建筑与诸窣堵坡在照片右侧模糊可见）。所有这些小型建筑都曾用于安置亡者的骨灰；骨灰或贮于罐中，或贮于葫芦壳中，被放入窣堵坡内那个小小的长方形空腔并就地封砌。

随葬的鲜花常常代之以用彩纸或金纸剪成的、手掌大小的小花。此外，盛有火化遗骸的罐子，也处处见于寺院或僧舍的墙体之中；例如胜金口峡谷第 10 号寺院内，以及高昌 K 号遗址群「停尸堂」上方的墙体内，都有此例。

正当我们忙于这些工作之时，两名老妇与一名男子在溪流右岸、与「宿曜窟」（Nakṣatra-Höhle，即格伦威德尔的第 6 号寺院）相对、距桥不远处，掘开了一座毫不起眼、高约 1½ m 的砾石丘：他们在丘下发现了高度不大的墙体残迹，围成一个约 2½ m × 2 m 的长方形空间。长方形的内部铺有白色灰泥并磨得平整；不见门的痕迹。在这个空间里找到了大量婆罗米文及其他文字的写本，此外还有五个极大的头像，其中三个影印于图版五五。这些头像必定属于大型塑像，而对于它们原先所立的位置，我们不敢妄下结论：上文描述其墙体残迹的那个空间，很可能是一座极大的、但据堆积物推断高度不高的窣堵坡的塔室。墙的厚度已无法确定，因为砖坯在潮湿的作用下，向外一面已化为寻常黄土。

如果说获得这批写本——其中包括吐火罗语的书叶——是我们婆罗米文写本收藏的一大丰富，那么接下来的几处遗址将使我们此类写本、尤其是回鹘文文书的存量更为增加。

极其巨大的第 9 号遗址呈现出一派最为可怖的毁坏景象（参见图版七二、七三）。构成该建筑群的整个长方形为厚实的围墙所环绕，南侧以三座尚存的塔楼加固，北侧则仅有两座较小的、大部已毁的角楼作侧翼。西南角楼格外雄伟；东南角楼则不过是一个土坯砌成的实心块体，其上建有一座小寺，寺门向西开启。这一布局上的特点使人怀疑，这些塔楼是否曾用于防御——若为此目的，向外开设的射孔之类当更为合宜。主寺极为宏大，与厚实的入口大门相对，位于围墙所圈空间的后半部，并被占据该空间另一半的一座庭院与大门隔开。

对这座庭院的考察极令人沮丧：黄土地面纵横交错着为数众多且极深的裂缝与开裂，表明由于东墙有一部分损毁，融雪之水年复一年地在此汇集，把地面浸透到一米之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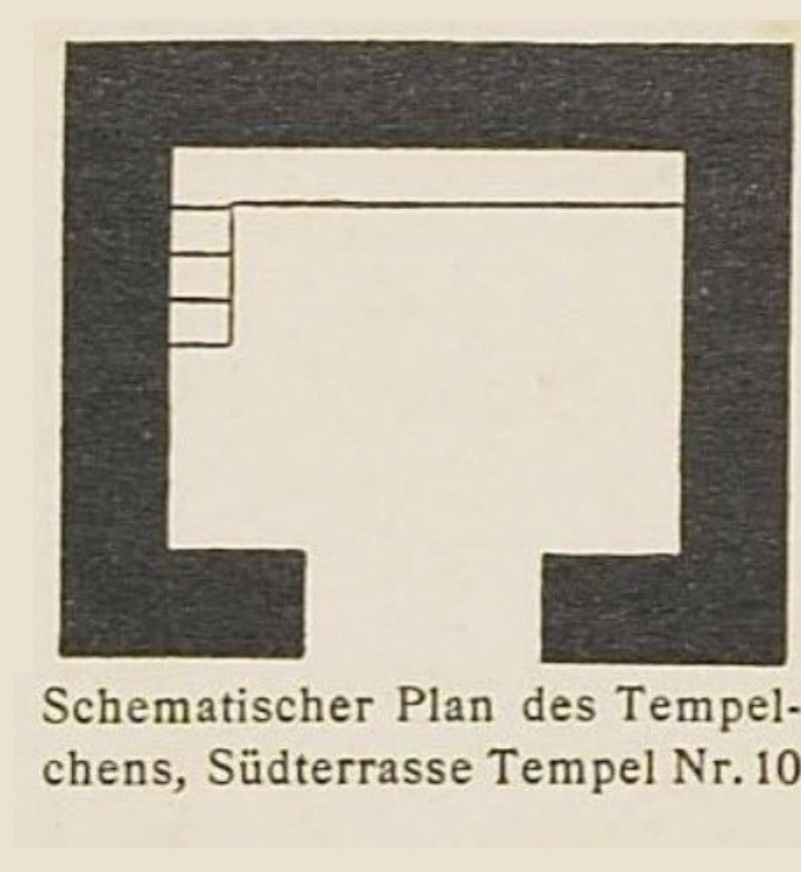
这座寺院所依的平面，与第 7 号寺院的平面颇多相似之处；如果我们没有看错，此处同样有一条巡行甬道环绕着一座由前廊、塔柱与甬道组成的主室。我们未对这座结构复杂的建筑作精确测绘，而是像在别处一样，把考古工作推迟到格伦威德尔教授到来之后——其到来已宣告为指日可待。

圣所周围的甬道浸水极重；毫无疑问，它们原先曾有以高浮雕形式施于彩绘墙面上的人物形象。尽管彩绘已无丝毫留存，但那些数量众多、却因盐碱与潮湿而变得完全无从辨认的形象残迹，仍证明此类装饰昔日曾装点着这些甬道。

在确认了这一于我们的任务不利的情形之后，其余各处空间也作了调查；它们在南侧形成一片厅堂与房间的杂乱组合：此处到处都渗入了大量的水。庭院北侧的情况则较为有利，那里僧人的居室长排延展，其中一部分仍填满旧日的堆积，可谓招人前来发掘。在最东北角的最后三间居室中，果然获得了一批以回鹘文为主的写本，即所谓《弥勒会见记》（Maitreya-Samiti）经的大幅「贝叶」（pothi）书叶。这些居室尺寸为 8 × 12 英尺，一部分带有拱顶；其中许多室内设有火炉，与格伦威德尔书第 172 页图 164 所影印的火塘相类，只是开口上方施红彩的浮雕装饰相对小得多，而开口本身则大得多。

在第 10 号寺院南台地上的一次小规模发掘，所获写本较少。依我们之见，该寺不过是一处已不复存在的巨大建筑群的一部分，那处建筑群原立于哈拉和卓小河「转弯处」上方经削平的山坡之上。（同样地，更上游一带经削平的崖壁上想必也曾有若干其他类似的、极为庞大的建筑——凡岩壁经人工削平、并存有墙垣遗迹之处，皆可见人手活动的痕迹。）

上述第 10 号寺院的南台地，在其南端建有一间极小的寺室，室内仍填有旧日的堆积。清理之时，显现出一种奇特的布局：



文中插图 19　小寺平面示意图：南台地第 10 号寺院

原书第 13 页

即：在左壁正中有几级狭窄的台阶通往一个狭长的凹室，该凹室占据了这座小寺的整个后部，其用途我们无法解释。这个凹室，连同阶梯所在的空间，都填满了各类写本（据我们所知，类似

的设置仅见于第 7 号寺院对面那座小殿中）。此处所获之物中，包括为数不少的、可惜已遭火损的婆罗米文书写而语言为突厥语的贝叶书叶。

紧靠这座小寺之前，我们在台地上发现了一座台座的残迹。据在堆积中所获之物判断，其上缘原带有婆罗米文书写的梵语题记。侧面似乎曾有种种图像，其中如下一幅场景得以保存：一位身着红衣的僧人立于一小片涂成蓝色的水域岸边，水中溺者（？）的头颅正满怀恐惧地仰望着他。带有这幅图像的抹面残块，就其形制而言，必定曾贴附于台座某一侧面的左外棱。

自这座寺院向上游，垂直削平的山坡处处仍显示出昔日建筑群的所在；峡谷上段的道路当中，还立着一座巨大的实心「tura」，为若干墙垣所环绕。河流在此已毁坏了右岸的黄土崖壁，因此这里的峡谷比更上游处宽阔得多；河谷两岸生长着若干果树与柳树。「tura」下方、左岸紧靠道路处，有一座近乎方形的小型遗址，虽毁坏严重，但内墙上仍带有若干壁画（图版七三，g）。在清除了尚属干燥的上层堆积之后，我们不幸遇到了硬如石头的干黄土，它以至少 1.25 m 的厚度填满了这座寺院的下部。壁画恰好保存到这一因反复浸水而硬结的黄土块体的上缘为止，但在下部面上已朽坏到无从辨识任何东西的地步。该室的尺寸大约为 2.50 m × 2.80 m〔译注：底本 OCR 作「250 m × 280 m」，据文意当为 2,50 m × 2,80 m〕。后墙（东墙）已部分损毁。东南角上还保存着一条抹面；其上呈现出一位身着黄衣、约与真人等大的僧人的头部与双肩，因种种损伤而几乎无从辨认；在他右肩处，还可隐约看出榜题牌的一部分，上有两三个汉字的淡弱残迹。南墙上带有图版一五所影印的壁画；北墙则在正中呈现出一个巨大的绿色恶魔的形象。

这怪物长着一个巨大而畸形的绿色头颅，生三目，血盆大口张开、獠牙外露，浓密的头发以水波纹样表现。颈部两侧各探出一个骇人丑恶的头颅；左右各伸出三条戴着臂钏、肌肉虬结的手臂。

在画面右侧黄红色的背景上，还可看到一个笔致洒脱的鸟形形象的一部分。这幅图像过于残破，无从辨明画家的意图：不过第三次考察队在这一带又发现了同一图像保存更好的摹本，其上这怪物被表现为伏卧于一座山巅之上：一道强劲的水流如瀑布般自其张开的巨口中倾泻而下，注入深谷，从而将这恶魔标明为水神。

自这座小寺的近旁，可以饱览胜金口峡谷南段尽头的一片不俗景色（图版七三，h）。峡谷在此向西作一大转弯，随后又折而向北。峡谷得名所自的胜金（Sängim）村落（我们从未到访过），位于峡谷北段的北出口处；据说该段中不再有古代聚落的遗址，而就我们对该段的了解而言，确实也没有。

木头沟的柏孜克里克寺院

〔译注：本节自原书页 13 末尾起，正文续于下页，属本章后半部分。〕

我们的随从称为「Serig-sü」（黄水！）的那条河，在其转弯处、右岸突出的崖壁之后（参见图版七三，h），有木头沟河汇入；照片上位于茂密柳丛左侧的那道崖壁的最后一处凸角，其顶上冠有一座「tura」。

跨越 Serig-sü 河、亦即哈拉和卓河，有一座在照片上为右岸突出崖壁所遮挡的简陋桥梁；欲前往木头沟，须过此桥，沿木头沟河而行，直至抵达向北延伸的高大丘陵山脉（其壁立的峰顶在照片左上方、右岸诸高地之侧清晰可见！），如此便到达木头沟河的狭小谷地。（而通往齐干湖的道路则引旅人沿哈拉和卓河溯流而上，直至另一条自西北而来的溪流的汇入口，再循此溪前

行，即可抵达该聚落。不过，人也可以翻越锥形山以南那道漫长陡峭的山脉（参见图版七三，h），再循艰难的小径抵达该谷地；我们初次造访这处聚落，走的正是这条路。）

〔原注 1：克莱门茨（Klementz，《关于帝国科学院所遣吐鲁番考察队的消息》，圣彼得堡 1899 年）称之为「乌普伦河」（Upreng-Fluß）；这一名称，正如阿萨古城附近那片盐沼的名称「博疆塔」（Bodschanta）一样，为我们的随从所全然不知。此外，这两个名称也都不像是突厥语的固有词汇。「Upreng」（Oprang、Uprang）之名见于色勒库尔（Särigol），用以指称叶尔羌河的一条支流（参见寇松（Curzon）所绘地图，载科博尔德（Cobbold）《最内亚洲》（*Innermost Asia*），伦敦，海涅曼书局，1900 年〔译注：底本 OCR 作「ConpoLD」，当为 Cobbold〕）；该名当为伊朗语源。〕

〔译注：本篇承接前节「木头沟畔的柏孜克里克寺院」（原书第 13 页末），自原书第 14 页起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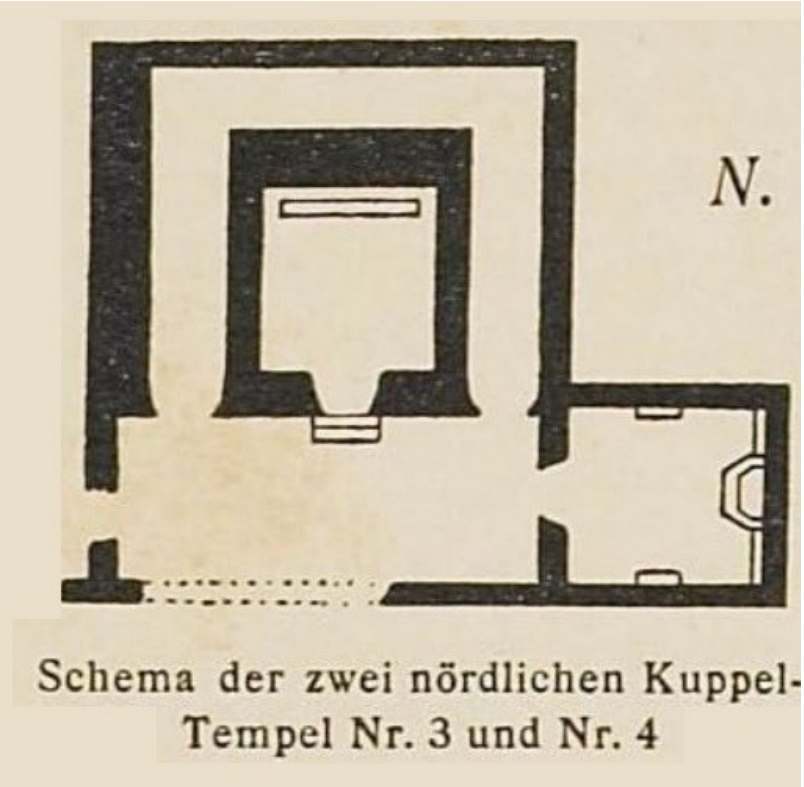
木头沟溪（Murtuq-Bach）的右岸，在其汇入谢里克苏（Särig-sü）的入口不远处，可经由一道低矮而颇为陡峻的山口抵达；越过此口之后，便沿着一条在岸边崖壁上随溪流曲折而行的小径前进；骑行约 5 公里，可望见一座硕大而奇特的山丘，其山脚前展开一片广阔的平地：这片平地以一道陡壁向河流跌落，而在这道陡然下落的壁面之中，以及在其前方层叠的台地之上，便开凿着众多石窟寺院——今日突厥农人称之为柏孜克里克（Bäzäklik，意为「有壁画或纹饰之地」）。

由于格伦威德尔（Grünwedel）教授曾特别郑重地嘱托我，要把这处遗址的发掘权留给他，我们起初并无在此发掘之意；但我们决意从胜金口峡谷骑马过来，把这处建置群察看一遍——据当地人说，自格伦威德尔—胡特考察队来访以来，此处已遭受了不少破坏。

我们来访时发现，近来确实有一些东西被毁掉了；巴图斯（Bartus）先生早先就熟悉这处遗址，他尤其惋惜的是：一座他在第一次考察队来访时曾勘察过、被称作「异族人洞」（Fremdvölkerhöhle）的洞窟寺院，因一次地震而全然坍毁。按他的描述，该窟中必定曾有全区域最为奇特的壁画，即一幅很可能属于摩尼教的「逃往埃及」图。

然而，仍有许多寺院（图版七四，a）被古代堆积所充填，另一些则被较晚近的堆积所充填；它们预示着写本与壁画的丰厚收获。又因为一个名声很坏的盗宝人、名叫拉迪尔（Radil）者已把其中一座寺院部分掏空，我们便决意把工作继续下去，以免在我们离去之后，那些已被揭露出来的图画遭到砸毁。此外，关于格伦威德尔教授的健康状况及其成行与否，消息始终不确，因此有必要通过获取一批独一无二的博物馆藏品，来确保此次考察的成果。

由上方通往台地的古代入口是一道阶梯，它自图版七四，c 上右侧出现的那座圆锥形建筑，通向台地北端、最末一座建筑上方岩壁中所开的门。在这座建筑与台地上的诸寺院建筑之间，横着一片堆积面，直抵台地北端两座穹顶寺院的墙垣。这两座寺院中较小、位置偏北的一座，其门向南，仅由一间主室构成；其旁立着一座较大的建筑，有一间长方形主室以及环绕主室的甬道；主室之门朝东，很可能通向一座两寺共有的、已毁的前廊（参见随附的示意平面图）。



文中插图 20　北侧两座穹顶寺院示意图：第 3 号与第 4 号

图中标注 N. 为北向　｜　原书第 14 页

我们沿用格伦威德尔教授在其即将出版的著作中给这些寺院所编的号码，称北面那座建筑为第 3 号，称其旁较大的寺院为第 4 号〔原注 1〕。自前者仅切下一小幅图画，已影印于图版三八；自后者则出自影印于图版三五 b、三六与三七的诸幅壁画。

〔原注 1：由于疏忽，这两座寺院在各图版的说明文字中曾多次被冠以我自己旧用的编号 1 与 2。〕

在这一组之南，还有一些被严重掩埋的建筑，其主要空间似为筒形拱顶；再往南，便出现了这片台地上最大的一座寺院，其正面明显自台地边缘向后退缩；它与相邻诸寺院向前突出的侧墙共同围成一种庭院，一道宽阔的堆积坡自那扇上部已毁的门中倾泻而入（图版七四，a）。这座寺院我们只稍稍开启，随即又重新填埋；它与这处建置群中其余仍富有图像作品的寺院一样，被我们保留下来，以待已经预告的格伦威德尔教授到来。

（自第 4 号寺院我们切下了以下若干图像部分：一、左甬道右壁上的众僧（图版三六 b）；二、该甬道的顶部装饰与饰带（图版三五 b）；三、一幅剃发（剃度）场面（图版三五 a），与第 9 号寺院中类似的表现（图版一九）相对应；四、奉献香炉的菩萨，与图版二五上的同一形象相对应；五、「波斯人一组」，与图版二八右侧的一组相对应；六、供养礼拜者一组，与图版二二左下角的一组相对应；七、异域人头像，与图版一九左侧金刚手（Vajrapāṇi）下方僧人的头像相对应；八、苇棚前的婆罗门，与图版一七右下角的形象相对应；九、擎伞者，与图版一八上的一组相对应。）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

> **【增订者按】**　以下数页是本书——也是整个吐鲁番考察史——分量最重的一段记述。勒柯克在此详述了他如何丈量、编号，并把第 9 号寺院三条甬道墙上的十五铺誓愿图连同壁面一同切割下来，装箱运往柏林。文字冷静、精确，近乎工程记录。

> 这批壁画运抵柏林后，被以水泥嵌固在博物馆大厅的墙上，外罩玻璃。1943 至 1945 年间盟军空袭柏林，因画幅巨大、又已与馆墙浇铸为一体，无法拆卸转移，馆员只能在外侧堆叠沙袋。轰炸之后，其中相当一部分连同馆墙化为尘土。学界通常认为，二十余铺被搬走的柏孜克里克壁画中，超过半数毁于此役；幸存者散在柏林、圣彼得堡、东京、首尔、新德里等处的收藏之中。
>
> 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这些壁画的原址空空如也，原件大半不存，而它们最完整的形象，保存在本书的珂罗版图版里。我们复原工作的起点，因此不得不是这本书。
>
> 千佛洞美术馆第一期复原计划所指向的，正是本节所记的这条甬道。工作分三步：先在分散于各国的图像之间比定关系，像拼图一样把碎片接成完整画面；再把一百年前 A4 大小的黑白照片还原为三米四米的实际壁画尺寸；最后依矿物颜料的折光特性与色阶灰度反推，把黑白影像还原为彩色。2019 年 5 月，八幅巨幅誓愿图完成；同年经扫描、标记、拼接，在高 5 米、长 21 米的甬道中重新组装。至本书增订之时，甬道尚有一半未竟，其中一幅壁画的一角，我们至今没有找到它的图像。

紧挨着这座宏大的寺院建置群，另有一座建筑高高耸起，其前墙距台地的坡缘仅约半米；这座寺院（格伦威德尔编为第 9 号）已被剥去了屋盖；它由一间主室及其甬道，以及一座横置于前的前廊构成，自前廊有一门通入一座狭长的侧屋——一座自东向西的筒形拱顶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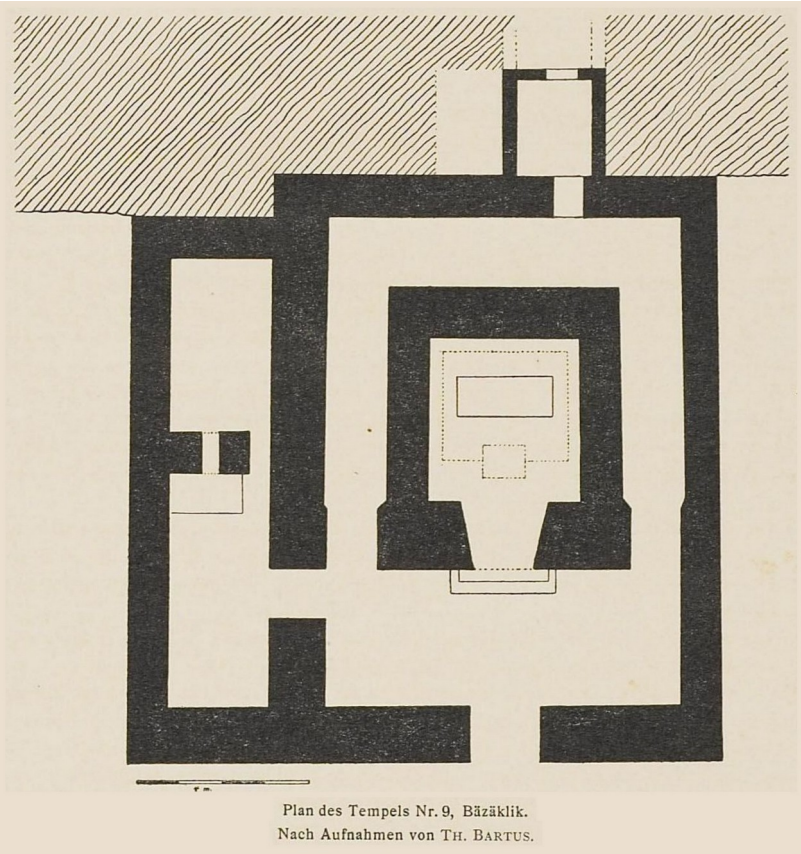
主室的诸甬道自下至上填满了细腻的灰色山沙，沙质全然干燥；而主室与前廊则仅充填至其高度之半左右，堆积为层理不规则的黄土与沙土。

这座寺院对我们而言是最重要的，因为图版一六的众僧群像、图版一七至二九的誓愿图、图版三〇至三三出自主室的诸图，以及图版三四的荼吉尼，还有图版三五 a1 与 a2 的顶部装饰，均出自此寺。

在着手描述这座寺院之前，我们还要提一句：今日突厥农人所用的通往台地的入口，可在图版七四照片 a 上、第 9 号寺院左上方的台地壁面中看到：那是一道或由人工、或由天然形成的斜向裂隙，它把下行者引至前述台地上最大寺院（第 8 号）被掩埋的建筑部分之上。在这里堆积起来的大量渣土之中，我们找到了各种风格的壁画残块（参见图版三九），其中还有那尊小佛像的足部（图版三四，t）。

第 4 号寺院曾被拉迪尔掘开〔译注：此名在底本此处 OCR 作 „Ranır“，当即前文之 Radil，同一人〕，我们已决意把其中所含的图画切取下来，从而使之免于自然的逐渐毁坏，或免于突厥农人闲手所致的骤然毁坏；可惜的是，只有甬道中的图画尚算差强人意地保存着，而且也只是部分如此。（此外，画在每一铺誓愿图上方之榜题牌上的题字均已佚失。）主室中的图画褪色殆尽，以致只能极为吃力地加以研究。

因此，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在勘查第 9 号寺院时发现，其主室含有与前者相同的图画，尽管风格略有不同、在艺术上不及前者完善；而当我们进一步查明，甬道中的壁画也仅在少数细节上有所差异，此外却完善得多，并且还附有长篇婆罗米文题记之后，我们便限定自己：只抢救第 4 号寺院中保存最佳的一部分图画，而把第 9 号寺院的全部图画〔原文此处漫漶〕



文中插图 21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平面图。据巴图斯（Th. Bartus）实测。

誓愿图所在之寺　|　原书第 14 页

第 9 号寺院前廊、主室与甬道的屋盖，以令人费解的方式消失无踪（唯有紧邻的、含有两个房间的筒形拱顶建筑完好如初！），而在上述诸空间之中，任何足以据以推断屋盖形制的遗存也全然不见；但我们不妨假定：主室曾覆以半球形穹顶，前廊与甬道则覆以筒形拱顶——正如第 4 号寺院的主室与甬道所仍保存的那样。依后者及其他寺院的建造法式推断，无论墙垣之中还是屋盖之上都不曾开设窗户，因此寺院内部的照明在任何时代都必定是人工的。

在把堆积于寺内的沙土与泥土清除之后，可以看到：甬道中的壁画一直保存到被齐整截断的墙缘之上；主室中的壁画则严重受损，其中保存最好的是西壁的壁画；至于前廊，最后只剩下光秃的抹灰覆盖着墙面的粗糙表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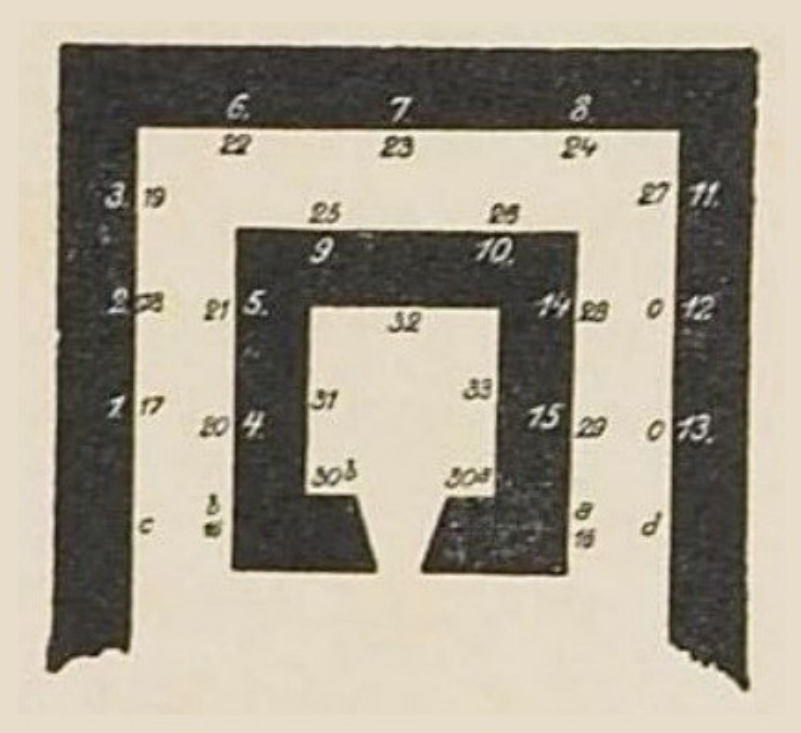
甬道中的地面铺着精美、制作精良而不施纹饰的方砖，砖为细粒灰色烧土（0,32 平方米）〔译注：底本此处作 „0,32 gem“，系 OCR 讹误，当为 qm，即平方米〕；在主室中，方砖则代之以一层打磨光洁、并以真正的湿壁画技法（al fresco）加以装饰的地面。

在诸甬道向前略为收窄的入口处，两侧墙面的抹灰上都绘有壁画，各绘出三位僧人的形象（参见图版一六）；左（南）甬道的六位僧人身着黄色僧衣，其梵文名号以婆罗米文书于每人头顶上方所设的名牌之上。与此相对，右（北）入口的六位僧人中，南壁一组身着紫色，其名号以汉文与回鹘文标出，可辨知他们是东亚人。此入口的第二组（北壁）则又着黄衣，且具梵文名号；此组仅存上半身，画面其余部分已坠落，消失无踪。

由左（南）甬道进入、走过众僧群像之后，〔接下页〕

〔原注 1：揭露这些壁画之时，色彩是那样新鲜，令人得到一种相对晚近之作的印象：在发现的那一刻，我把它们估定为大约十四世纪的作品。后来，由于题记的释读，这一印象被证明不大可能成立，如今我所持的看法是：我们可以把这些图画归入约九世纪中叶〔原文此处漫漶〕〕

——誓愿图便呈现于眼前。此类场面共计十五铺；每条甬道含五铺，即外侧较长之壁上三铺、内侧较短之壁上两铺。誓愿图的编号自左（南）甬道的南壁开始，以最前一幅为第 1 铺；先数外壁诸图，再数内壁诸图，且外壁上的壁画自观者之左向右数起，内壁上的则自右向左数起。（随附的平面图或可说明这一计数方式；大号（白色）数字表示誓愿图的编号，小号（黑色）数字表示本书中影印相应场面的图版号。）



文中插图 22　甬道画面编号示意图

数字为原书所标画面序号；a、b、c、d 标四角　｜　原书第 15 页

【增订者按】　勒柯克的誓愿图编号自南甬道左（西）侧起始，依次绕行三条甬道，共十五铺；本书图版一七至二九所刊为其中十三铺（第 12、13 两铺仅有文字描述而无图版）。千佛洞美术馆复原件的编号沿用此序，故本书卷二以下各图版中，「誓愿图第 N 铺」与复原件「祈愿图 N」所指为同一铺，读者可径相对照。凡编号有出入或复原件另有所本者，均于该图版说明中标出。

还须提及的是：所有这些壁画都保存完好，唯独北面外壁上的两铺誓愿图例外——它们占据该壁的中部与东部，编号为第 12 铺与第 13 铺；这两幅图之所以受损，是因为绘制其上的抹灰层大部分已经坠落、不知去向。出现在第 13 铺旁边的那组僧人像同样因抹灰坠落而受损；不过此处缺失的是画面的下部，而那两幅巨幅壁画被毁的却是图的上部。抹灰是沿一道斜线剥落的：此线起自第 11 铺图右侧的上方，自上而下斜穿第 12 铺与第 13 铺，最终在甬道之外、约当僧人群像足下之处触及地面。

至于僧人像上方的墙面原本可能饰有什么样的壁画，则已无从得见，因为那里的抹灰处处都被潮气、以及被风暴掷向墙面的沙团的磨蚀剥去了一切装饰。这两铺部分被毁的誓愿图（第 12、13 铺）未制作复制图；我们仅限于对它们作一简短描述。

誓愿图第 12 铺

此图有一部分已经坠落；断裂线起自左上方的饰带，垂直穿过榜题牌的起首处，以及填满左角的一身僧人形象那向左侧转的头部。自此，断裂线折向右下，穿过佛陀的耳廓与鼻尖。那两块（由我们切下的）画板，本可显示此图与下一图上断裂线的进一步走向，却因一名工人在当地失手出事而毁坏；右下角的图像保存高度约为 1,70 米。下一铺誓愿图在其左侧三分之二处保存的高度相同，但在第三个三分之一处，现存壁画的高度仅有 1,50 米。

佛陀的姿态与服饰与前一图中者相同；其左臂已缺，右臂下垂，手执黄色衣角。舟形身光（Mandorla）与誓愿图第 9 铺（图版二五）中佛陀的身光相似。莲花的花瓣呈浅肉红色。

右下角（此侧所存者仅此而已！）为一组人物所填满，与第 3 铺（图版一九）左下角所绘的一组相似。一位菩萨正由一名僧人为其剃除头发。他着印度神祇装束；裸露的上身缠绕着绿色与红色的披帛，胯部裹以一方黄色、镶绿边的布，并系一条固定此布的灰蓝色腰带；下裙（dhoti）为鲜红色。肤色作肉色，黑发黑目；面部因极稀疏、成缕的髭须与颏须而引人注目。双手合十，头虔敬地俯于佛陀之前。这位菩萨坐在一座长凳式的座上；右腿盘于左腿之下，左足着地。

行剃发之礼的年轻僧人肤色浅肉色，头发灰黑，蓄有一圈修剃过的须——覆盖上唇、口角与颏侧，并沿颌缘以细线上延至耳际；就类型而言，他与第 11 铺（图版二七）中的两位年轻僧人相似。

头光（Nimbus）为红色，镶绿、黄二色边；衣着为一件紧身的、背心式的黄色长袖内衣，其外罩一件浅胭脂红、以绿与灰蓝作衬里的衣服。上身还披着一件褐红色的百衲衣，其上有同色而较深的横缝，衬里为灰蓝色。

左下角立着一身着印度神祇装束的天神（Devatā）像，其光轮（Aureole）与服饰的色彩，与第 11 铺（图版二七）中站在同一位置的天神像完全相似。在此像之后、之上，另有一位身着黄衣的老僧向右侧转身而立，他因面部狂热的表情与浅蓝的眼睛而引人注目。略泛红晕的面孔呈明显的欧洲人类型；（剃过的）须雪白，头颅剃得精光。光轮为绿色，镶红、黄二色边。

左上角那身半毁的僧人形象，在各方面都极酷似图版二七右侧的中间一身（僧人）。此图宽约 1,90 米。

誓愿图第 13 铺

此铺的奇特之处在于：佛陀的法衣在此为红色，而不像其余各图那样为黄色。内衣一如惯例，为黑色与红色。双足立于莲花之上，莲花绿色的花托为双层花瓣所环绕；上层花瓣呈肉色，下层为灰蓝色，二者皆有白色的分界线。舟形身光大体上与图版一八所见者相同。

右下角，最重要的一身胁侍形象跪于一座印度式苇棚之前。苇棚外面绘作绿色，里面绘作红色，棚顶的弧面上搭着一张虎皮。跪着的这位菩萨是一名婆罗门，面色泛黄，褐发，蓄浓密的褐须。其装束与誓愿图第 15 铺（图版二九）左角婆罗门的装束相似，只是他在虎皮围裙之下另着一条红色下裙。他向佛陀奉献一张豹皮作为供物——豹皮的头、腿与尾均未除去；佛陀伸出的左手在舟形身光处可见。

左角有第二名婆罗门向右侧转身而立，奉献一张镶红边的虎皮；他与图版二九右侧的婆罗门一模一样。

在甬道地面上发现的一块带有榜题牌的抹灰残片（已成碎块），究竟属于此铺场面（它是在此铺之前被发现的），抑或属于前一铺，尚不能确定；我们姑且附录于此：

> Ṛṣibhūto hy upātiṣṭhaṃ s. — trelokanāyakaṃ

> valkalena manāpenācchādito — — tā mayā.

>

> 「我身为仙人（Ṛṣi），前往趋近……三界之导师，

> 「以一件可爱的树皮衣（曾？）为我所覆。」

实际尺寸：宽约 1,85 米。

在誓愿图第 8 铺（参见图版二四）的左侧，可见一处低矮的门状开口；它通向一间空无一物的小型双联室，该室凿入寺院后方的岩壁之中。透过此室南壁的裂缝可以确认：在这间双联室之南还有第三间同样空无一物的房室，但因其空无所有，便未加开启。这些房室后来由第三次考察队作了勘查。——

自前廊有两级覆以白色光滑灰泥的台阶通入主室，台阶高 0,25 米。门洞侧壁的抹灰上原先绘有图画，但左侧门柱上剥落甚多，以致人们只能辨认出一身衣饰华丽的女性形象的等身大画像的残迹。右侧门柱上尚可见一身男性形象下半身的若干部分，其甲胄样式与主室壁画中反复出现者相同。在此门柱的左侧、该尊神的右足旁，跪着一名衣饰华丽的年轻魔怪，作持灯者状，此像已被切取下来（参见插图）。所表现的很可能是俱毗罗（Kubera）与诃利谛（Hārīt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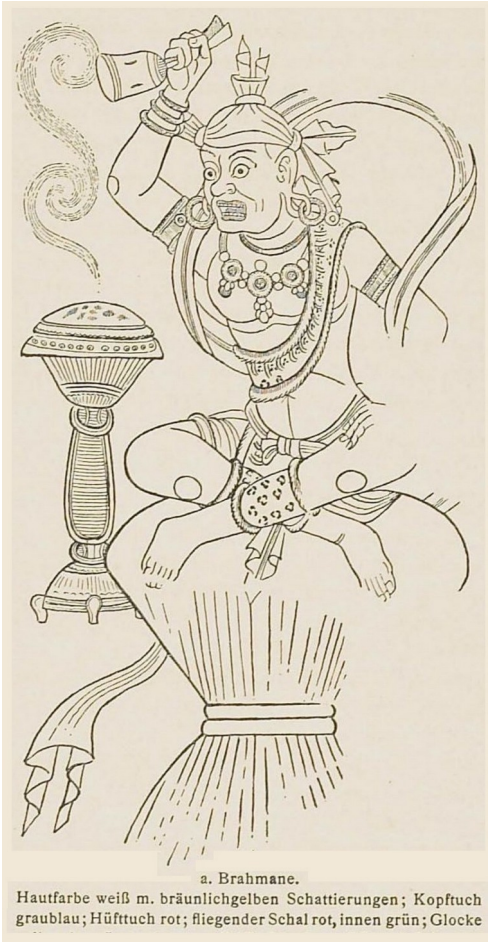
Dämonischer Lampenträger des Kubera. Hautfarbe fleischfarben; Haar schwarz, Augen braun; Mütze mit weißem Bande und rotem Aufsatz. Panzer blau mit grünen Brustplatten und braunen Ärmeln, Bauchschutz grün und rot; Schamschutz rot, Gürtel weiß, Beinkleid rot

文中插图 23　俱毗罗（多闻天王）之持灯鬼卒。肤作肉色；发黑，目褐；帽缀白带、红顶。甲蓝，胸甲绿，袖褐，腹护绿与红；裆护红，带白，胫衣红。

逐件色彩记录　|　原书第 15 页

主室的地面覆有一层平滑的灰泥，作橄榄绿色，用真正的湿壁画技法绘成；一道约 5 厘米宽的黄色边框线（平面图上作虚线！）绕室一周，并在门前与一个由同样色带构成的长方形相接，其中以黄色描绘着种种法坛器具（香炉、铃、法螺等）；在边框线上、约当主室中部的南北两侧，各出现一个同样以黄色绘出的童子头，以及一朵带枝叶与卷草的莲花。地面的这种装饰大约是要表现一方水池，而前部的长方形部分则在布置上与胜金口峡谷第 7 号寺院中所述的沟槽刻画相似，或许是对供桌以及环绕圣所之栏楯的图像式表现。

主室约 5 米高的墙壁，如今只在有堆积倚靠、因而使其免于毁坏的部位还留有壁画。门旁的两面窄壁为我们保存下了若干供养人像（参见图版三〇）；南壁上有一幅保存不佳的图，其中心为一位骑马出猎的王者（参见图版三一）；与门相对的西壁上绘着主尊像（一幅观世音〔Avalokiteśvara〕像，参见图版三二）；北壁上则表现一名被迦楼罗（Garuḍa）掳去的孩童获救的情节（图版三三）；这些图画全部被移取。主尊像之前立着一座低矮的白色基座，其上原先想必立有一尊神像，很可能仍是观世音；然而此像已丝毫无迹可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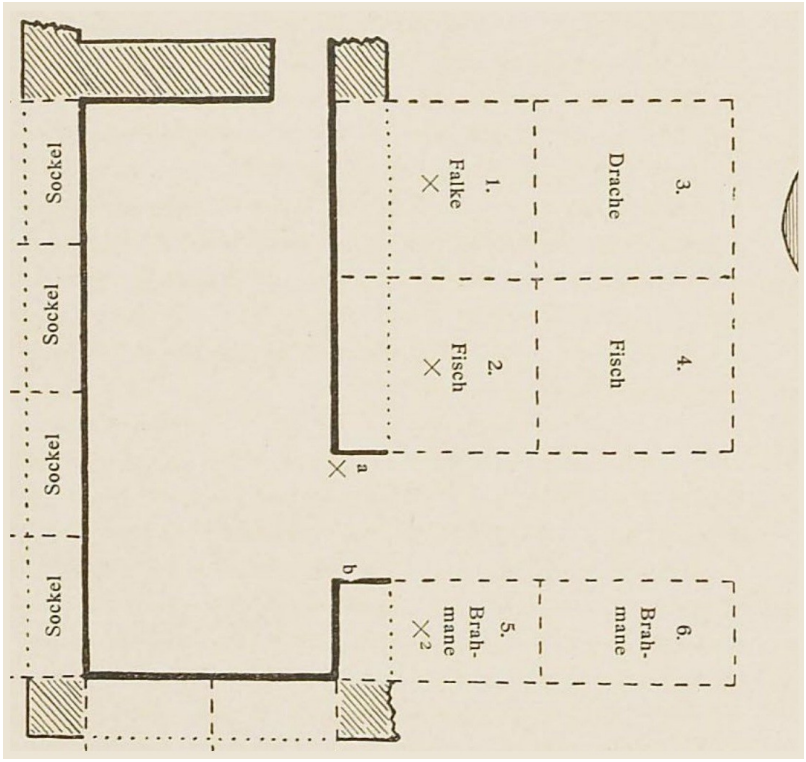


文中插图 24　a. 婆罗门。肤白，带褐黄晕；头巾灰蓝；腰布红；飞帔外红内绿；铃黄，柄绿与红；香炉与饰物黄；苇座绿。

逐件色彩记录　|　原书第 15 页

寺院的附属侧屋自其前廊〔原注 1〕经由一道约 2 米高的门进入。右（西）侧门柱上，于白色底子之上绘有一名婆罗门的等身大形象（示意图中的 a；参见插图 a）。他坐在一张绿色的苇编矮凳上；身旁立着一只高大的黄色香炉。他手中挥动着一只铃，怒张的双目与那也许正在念诵禁咒的口，似乎表明他正与迫近寺院的、看不见的魔怪搏斗。值得注意的是那条奇特的头巾。整

根门柱上都被以中亚婆罗米文、以及回鹘文与汉文刻划的题记涂满，但就可辨读者而言，其中没有一条含有值得称述的信息。



文中插图 25　附属室四壁画面配置示意图

格内标「鹰／龙／鱼／魔／婆罗门」等题材与序号　｜　原书第 16 页

（东）侧门柱（示意图中的 b）上绘有一名站立婆罗门的等身大形象。此画因移取时所伴随的危险而未能抢救：该门柱已经开裂，有坍塌之虞。

进入室内本身之后，可见四壁满绘着诸神与婆罗门的图像。顶部为筒形拱顶；顶面刷白，间或饰以一朵花结状的莲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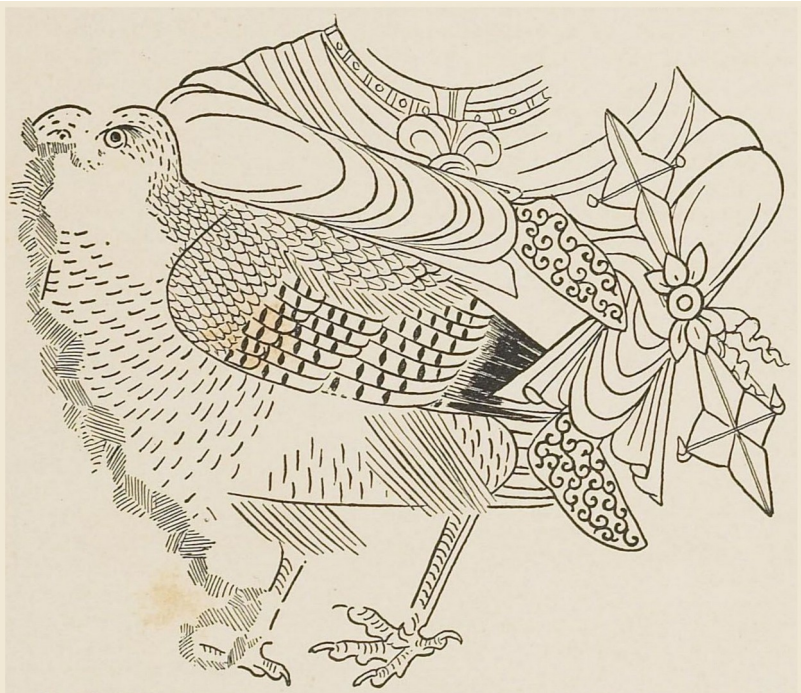


Abb. 1. Nr. 1. Falke. Unterkörper und Brust weiß mit schwarzer Strichelung, Rücken und Flügel ebenso mit braunrötlichen Schattierungen, Schwanzfedern weiß und schwarz; Fänge weiß und schwarz. Höhe: ca. 0,53 m.

文中插图 26　插图一．第 1 号．鹰。下体与胸白，施黑色细线；背与翼同，兼带红褐晕；尾羽白黑相间；爪白黑。高约 0.53 米。

逐件色彩记录　|　原书第 16 页

〔原注 1：前廊的墙壁上，绘饰已被剥蚀殆尽。〕

〔原注 2：在本示意图的复制件（图版三四的说明文字）中，由于疏忽，第 3 号（婆罗门）处的十字标记被漏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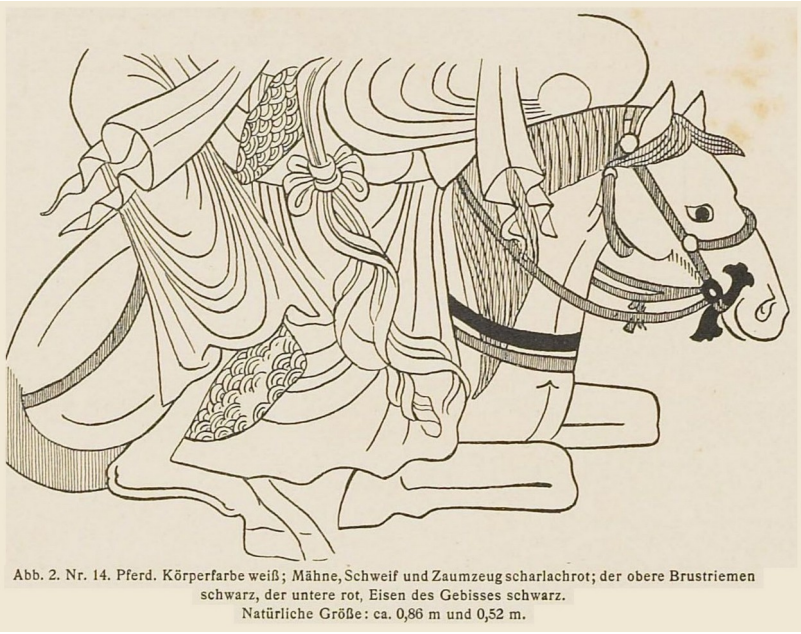


Abb. 2. Nr. 14. Pferd. Körperfarbe weiß; Mähne, Schweif und Zaumzeug scharlachrot; der obere Brustriemen schwarz, der untere rot, Eisen des Gebisses schwarz. Natürliche Größe: ca. 0,86 m und 0,52 m.

文中插图 27　插图二．第 14 号．马。体白；鬃、尾与辔具朱红；上胸带黑，下胸带红，衔铁黑。原大约 0.86 米与 0.52 米。

逐件色彩记录　|　原书第 16 页



3. Nr. 12. Dämon. Körperfarbe weiß mit braungelben Schattierungen; Haar grün, Gewandung Schmuck gelb. (Der Dämon bei Nr. 8 ist ganz ähnlich, aber nach links gewendet). Natürliche Größe: ca. 0,60 m hoch, 0,52 m breit.

文中插图 28　插图三．第 12 号．魔。体白，带褐黄晕；发绿，衣绿；饰物黄。（第 8 号之魔与此极相似，惟朝左。）原大约高 0.60 米、宽 0.52 米。

逐件色彩记录　|　原书第 1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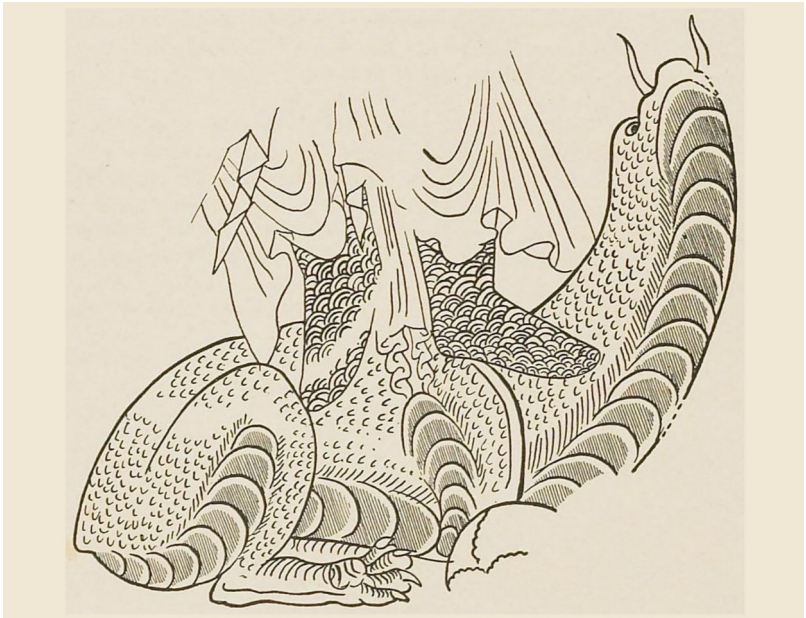


Abb. 4. Nr. 15. Schildkrötendrache. Die den Rücken bedeckenden Schuppen sind grün, der Bauch und die Unterseiten der Schenkel tragen braune Schuppen mit heller Umrandung. Der Unterschenkel des Vorderbeines ist durch das am Unterrand der Zeichnung erscheinende Schädelattribut der darunter stehenden Ḍākinī verdeckt. Natürliche Größe: ca. 0,60 m × 0,38 m.

文中插图 29　插图四．第 15 号．龟龙。覆背之鳞作绿；腹与股下侧为褐鳞，缘色较浅。前肢小腿为画面下缘所见荼吉尼（Dâkinî）之髑髏持物所掩。原大约 0.60 × 0.38 米。

逐件色彩记录　|　原书第 16 页

拱顶起拱处以下，墙面上环绕着一道绿色的装饰边饰，紧接其下则有一道绘出的垂帐纹绕室一周（图版三六 a）。约为等身大的形象共 18 身，其中两身表现婆罗门，其余 16 身则表现女性魔怪（荼吉尼，ḍākinī），她们站立在各种坐骑（vāhana）之上（参见文内插图）。第 1 号处的坐骑是一只猎鹰（插图一），第 14 号处是一匹马（插图二），第 8 号与第 12 号处

是一名魔怪（插图三），第 4 号、第 11 号与第 15 号处（插图四）是一条龙（龟龙或螺龙），第 2、3、7、9、10、13、16、17、18 号处则是一条鱼（参见图版三四）。

诸形象的分布可由随附的、带墙面展开投影的平面图看出；所加的 X 记号标示已为博物馆抢救下来的形象（见第 16 页）。

标为第 5 号与第 6 号的墙面上各绘一名婆罗门（参见插图五）；第 6 号处的墙面已因抹灰坠落而丧失画面，但我们毫不怀疑：在渣土中发现的一大块抹灰，其上保存着一名十分相似的婆罗门的上半身，正是属于这一墙面的壁面贴层的一部分。

绘于其余各壁的 16 身神祇，显然是荼吉尼，即女性魔怪。除出现在第 2 面（参见图版三四）与第 10 面上的形象之外，所有这些荼吉尼都是四头的；而第 2 号有 3 个头，第 15 号则仅有一个头。但她们无一例外都是四臂，并且执持以下持物——尽管未必总是在相同的手中，且姿态仅有微不足道的差异：刀、罥索、金刚杵与颅碗；她们或立或坐于各种坐骑之上，其中以一种奇特的鱼最为常见。坐骑之下，又出现一座绘出的、棋盘格状的基座，用以表现石砌台或墙垣。



文中插图 30　插图五．第 5 号．婆罗门。肤白，带褐黄晕；发与须灰黑（须依印度式梳理张开）。三叉戟灰蓝，白缘。腰布绿，红边；飞帔绿与红。原大约高 1.64 米。

逐件色彩记录　|　原书第 17 页

西端的窄侧墙面借一个小窗口和一道窄门与其后一间空室相通，此处立着一座基座，上有一头以泥塑成、施浅灰色彩绘的低矮牛像，其上原本或许曾承载阎摩（Yama）或湿婆（Śiva）的形象；然而该尊神像已丝毫无存。总的说来，这座附属建筑给人的印象是：它属于比主寺更晚的时代。

就文书与小件遗物而言，这里的工作没有取得任何值得一提的收获；在该寺前廊、北甬道入口之前，发现了数块以黍面制成的古代烤饼。

柏孜克里克台地北端的寺院

在柏孜克里克寺院主台地——即承载第 9 号寺院的那片台地——的最北端，我们发现了一座其余部分均已毁坏的寺院的极小主室。自我们来访之后，它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很可能是因一次地震而坍落；据巴图斯先生的报告，第三次考察队已找不到该建筑的任何痕迹。

主尊像画面长约 1,95 米，如今仅保存到约 85 厘米的高度，因而神像本身已毁。只有其宝座尚可辨认，尽管敷绘其上的色彩大部分已经消褪。宝座占据画面中央，坐落在一道城墙的中门之上；此城墙为红色，饰有古老形制的阶梯形雉堞，并绘以红色卷草纹，它自画面中央向画面两侧对称地升高，在画面左右两缘各显出另一座城门——因而共计三座城门。城墙之前坐着四尊湿婆派神祇；每一座城门中都出现一位披甲的天王（Lokapāla），其前有一位菩萨跪伏。我们从画面左侧开始描述。

城门的砖砌拱券为白色，带灰色条带（两种颜色的烧砖）；门扇及其上的梁架为胭脂红色；雉堞亦为同色。城门之上，在一座灰白二色的石砌台上安置着一座白色的中国式小屋；它与图版二六所见的门楼极为相似，屋脊上也有那种奇特的鸟头——虽已严重毁损——因其过于模糊，故在图上略去未画。

在城门中跪于石砌台上的菩萨身着铠甲；其前立着一位身披绿甲、佩剑的天王，一手作告诫状举起。他立于一座莲花座上，座上的花瓣却忘了画出。座下的地面为红色，饰以黑色勾边的卷草纹。同样的场面在其他各门重复出现。



文中插图 31　柏孜克里克台地北端寺院主尊像下段摹绘：中为城门与门中跪坐的披甲菩萨，左右为诸神（长卷线描）

原书随文排印，无图注；正文记城门砖砌拱券白色间灰带（两色烧砖），门扇及其上梁架与雉堞皆作胭脂红　｜　原书第 17 页

诸神祇之中，左侧所坐的一尊为白色，带蓝色晕染。兽首上围有一条红色额带，其上出现一顶冠，冠上三枚金盘之上各有一颗骷髅。焰发作金色与红色；披风、腰布，以及把一张白色人皮束缚在身上的腰带，均为红色；首饰为金色，嵌红、绿宝石。其坐骑（vāhana）为一头褐色的公牛，正回首凝望其主。八只手执持以下持物：最后一对手正忙于在神祇背后高举一张淡红白色的象（？）皮；右侧的第二只手执巨大的双头三叉戟，第三只手执罥索，第四只手则握拳置于膝上。左侧的第二只手执刀，第三只手执金刚杵，第四只手不持物，撑于左大腿之上。此神单腿盘坐。

在其右侧坐着第二尊神祇，双腿交叉，坐于莲花座上。其坐骑的形象部分显现于她身后、部分显现于她身下（？），那是一只孔雀或雉类的鸟（「凤凰」），其尾在该神祇右侧诸臂之后可见。此鸟绘作红色头羽、绿色下颊与喙、红色背部、黄色腹羽。此神的肤色为白，间或带若干绿蓝色调；眼与发为褐红色；头光为绿色，镶胭脂红与黄色边。波斯形制的翼盔为黄色，双翼上有红色圆盘，并有红色缨饰；衣物亦为红色，唯腰布的一部分似乎原为绿色。护腿以豹皮制成。右

侧诸臂的持物为：最后一臂持一红色圆盘（日），第二臂持一面红色旗幡，上有黄色徽纹（？）与绿色镶边；第三臂与左侧第四臂一同在胸前合掌作祈祷状，第四臂置于膝上。左侧最后一臂持一白色圆盘（月），第二臂挥动罥索，第三臂将法螺举至口边，第四（最前）臂之手与右侧第三只手合掌作祈祷状。

第三身形象似乎表现一位女性神祇。她双腿交叉，坐于其坐骑之上——那是一头卧于莲花上的绿色公牛。牛角为黄色，唇作肉红色，舌作血红色。女神的肤色为绿，唯面容呈浅褐色肌肤；头发浅蓝，（三只）眼睛的颜色深暗。头部右侧出现一个白色的小兽头，其下隐约露出两个小人头；左侧颈后另有一个小的附首，灰蓝色的束带中则有一颗骷髅。头顶之上、宝冠带之上，立起一个鬃发直竖的小魔怪，双手在身前展开一方红布。因此，这尊神祇（除髭须之外）与图版四六，f 所见的魔怪相似。衣着由豹皮围裙与豹皮护腿、一条白色腰带、红色腰布与红色披帛构成。

四对手中最后的一对，同样执持日（右）与月（左）；右侧第二只手执一柄短的双头三叉戟，系红、绿二色绦带，第三只手叉于胯上，而最前的一对手则合掌祈祷。左侧第二只手持一面旗幡，其半圆形的幡面左侧为绿色，继而为灰蓝色（带一枚徽纹），再为白色；半月形幡面的右侧缝缀着一条锯齿状剪裁的红色飘带。幡尖之下的毛缨为黑色。第三只手持一只椭圆形的瓶，其长颈与糖塔形的上端在画面上仅能极模糊地辨认。

若说这身形象与第二身有某种相似之处，那么第四尊神祇则又与第一尊有某种相似之处。这是一尊可怖的神祇（大黑天〔Mahākāla〕？），兽面，焰发为红色、镶黄边。肤色作肉色，带褐色晕染；肌肉的表现高度程式化。衣着为一件红色披风，以及一条由绿色腰带束住的红色腰布。首饰为金色，嵌绿色以及若干红色宝石。此神并无真正的座位，而是

其右大腿由一名肤色偏白的小魔怪扶托，而另一名相似但为绿色的小魔怪跪着承受左大腿的重压。二者身上都有若干红色的衣饰部分。

图中共绘出八只手。右侧最后一只手挥动金刚杵（红色与绿蓝色），第二只手持一枚镶绿宝石的金臂环；第三只手执一具红色的犁，犁铧为白色；第四只手撑于膝上。

左侧最后一只手持轮（cakra，金色与蓝白色），第二只手持剑（金柄，蓝白色剑身），第三只手持（褐色的）罥索——最前的一只手置于左膝之上。

在图中所复制的诸神祇之后（之上），还出现第二排湿婆派神祇——它们毁坏得太厉害，以致不宜加以描画。因此，W. 冯·登·施泰嫩（W. von den Steinen）先生只画出了下面一排。

在该寺的左侧壁上，发现有上下水平并列的两排长方形小画的残迹（各约 32 × 42 厘米）。仅有下排中绘在墙面最下角的那一幅，以及其上方第二排（上排）小画的一部分保存了下来。

前者绘一位身着红衣的佛陀趺坐于莲花座上；右下角，两位礼拜的菩萨坐于一顶蓝色宝盖之下，其后为两位礼拜的僧人；毁坏甚剧的左角中，一些魔怪形象正用一柄三叉戟搅动一口盛满人头、沸腾翻滚的地狱之锅，其后另有一身（女性？）形象以哀求的姿态向佛陀伸出一臂。

上方的小画表现的是波罗奈斯（Benares）初转法轮；莲花座之前，一对偃卧的羚羊之间立着三叉戟与法轮。

此小画的左侧已毁；右侧跪着一位礼拜的菩萨，其左后方为一位带熊熊焰形头光的僧人。更向右则出现一位跪着礼拜的僧人，其后为一名礼拜的魔怪形象。——

在柏孜克里克的工作结束之后，我们还探访了木头沟村落本身附近迄今无人知晓的遗址；不过此处不再进行较大规模的发掘；我们还要提及：在泉边穆斯林圣所（yögam）〔原文如此〕旁已毁的窣堵坡中进行小规模发掘时，出土了若干回鹘文写本与图画残片。

吐峪沟

吐峪沟的这条小山谷，是整个吐鲁番绿洲中最美丽、最富庶的一带。它位于高昌以东约 30 里的「红山」之中，谷内众多的无核白葡萄（kischmisch）园与杏树，兼有几株白杨，与那荒芜不毛的山间旷野形成令人心神一振的对照——它就这样毫无过渡地嵌入其间，宛如因某位神祇的一记剑劈而生成。

在前部西侧的一座山丘上，耸立着「七眠子」清真寺（Moschee der Siebenschläfer），这是一处穆斯林圣所，年代恐怕还不足 200 年（参见图版七四，g）；据称此寺是鲁克沁（Luk-tschun）诸王的墓庐（麻扎，Mazār〔原注 1〕），但吐峪沟今日已不再属于他们的辖境。我们来访时，看到墙上有几块粗劣的、带阿拉伯文题记的面砖；洞的深处被一些旗帜遮蔽着，据说那是阿古柏（Ya'qūb Bek）时代自东干人手中缴获的。

〔原注 1：「吐峪沟麻扎」这一名称只用于圣所，而不用于那个小村落，后者径称「吐峪沟」。〕

据我的随从们说，这座麻扎是修建在一座古老的「Qalmaq öiyi」（蒙古人的房子）之前的——此地一切佛教寺院皆有此称——而与此地相系的七眠子传说，很可能可以上溯到佛教时代。我未获准进入那座古洞：当时我还不知道，一份送给伊玛目或谢赫的礼物本可以化解这种阻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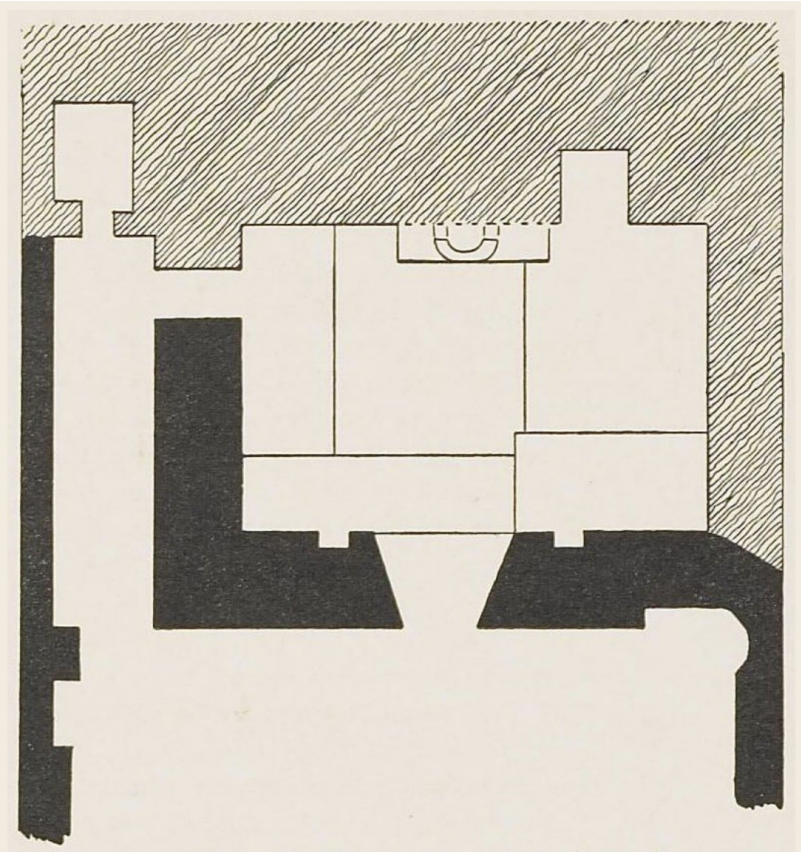
人们有时加于哈拉和卓（高昌）城的名称 Apsäs（以弗所）或 Dāqiānūs，与该传说在此一带的在地化有关。

在峡谷北端、相当可观的高处、陡峭山坡之上矗立的那两座大寺院，首先吸引了我们的注意。那条自西北偏北而来的小河在此折向东流，其位于这一转折以上的河床是一条极其狭窄、裂隙纵横的峡谷，不见一丝植被或古代建筑的痕迹。

峡谷西侧，亦即溪流右岸，有一处大型寺院建置群（图版七四，h），但它因自山中渗流而下的融雪之水侵蚀甚重，以致无法指望有写本方面的收获。我们在寺院台地南部作了一次小规模试掘，结果为阴性——所获仅有几件小陶像（图版五九 m、p、q）——随后便在左岸的大型寺院废墟中安排了一次发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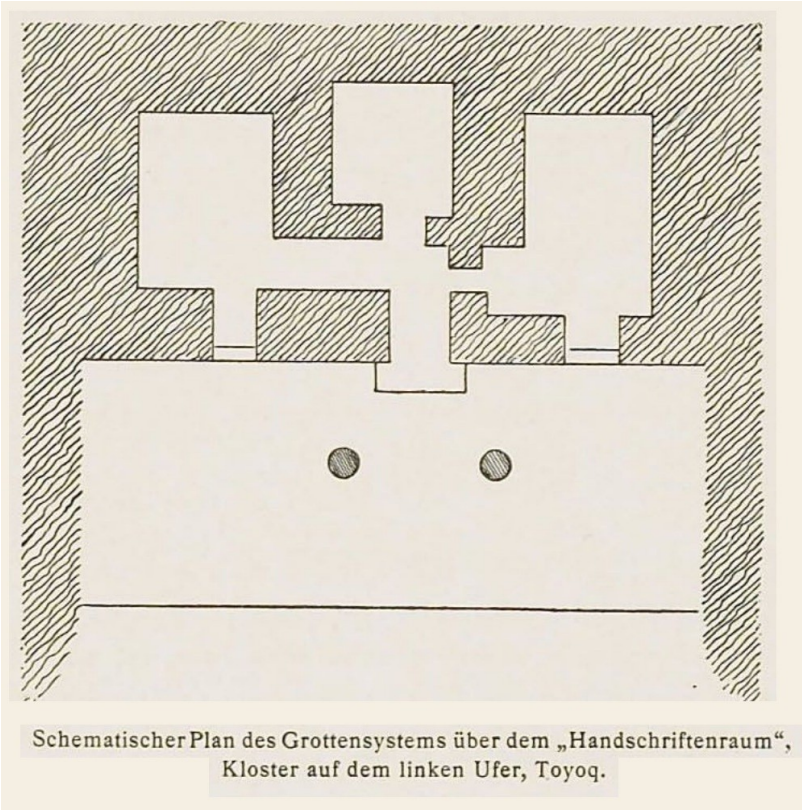
这处由许多建筑（独立建筑与凿入岩体的洞窟）构成的建置群（图版七四，f），占据着溪谷自西向东、继而折向南的转弯处的高地，其分布使得其中某些寺院大致朝向东南。其中最重要的是照片上清晰可辨的那座大型窣堵坡寺院。其中部分尚差强人意保存的壁画，我们一无移取，因为紧邻该寺以东的一间房室——我们给它取名为「写本室」——立刻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其一，紧贴其门开始堆起的渣土锥中，掺杂着数量惊人的细小纸片；其二，室中央矗立着一大团质地松软的巨石。这里正是那种罕有的、尚未被今日盗宝者染指、预示着写本出土的房室之一。

显然，这块巨大的岩块早在很久以前就已从建置群诸建筑后方高耸的岩壁上崩落下来；它压塌了该室的穹顶，并以自身的碎块充填了室内。〔原文此处漫漶（约一行）〕



文中插图 32　「写本室」平面示意图，吐峪沟「左岸寺院」出土大量汉文经卷之处　|　原书第 18 页

……在这些沙土、石块与砖瓦的堆积之下，保存下来大量写本，其中尤以汉文卷子为多，保存状况有好有坏。此外，我们还在此发现了一件古突厥（köktürkisch）字母表的残片，附有这些字符的名称（或音值），以摩尼文书写〔原注 1〕；以及一叶以古突厥「卢尼」文书写的较长文本〔原注 2〕；此外还有以婆罗米文与笈多体书写的印度写本残片，其中若干（诚然是小块的）写在桦树皮与贝叶之上。另外还发现了回鹘文、粟特文、叙利亚文与摩尼文书籍及卷子的残余，一件卷子的若干残片——其文字经 F. W. K. 缪勒教授鉴定为白匈奴人或嚈哒人的文字——以及一整叶和几个半叶，所用文字迄今不明、未经释读，或许与佉卢文有亲缘关系，无论如何是自右向左行款的印度系文字。在这一片杂乱狼藉之中，还发现了几件以「韦伯写本」（Weber-Handschriften）之文字书写、但使用洛伊曼（Leumann）所谓「第二语言」的小残片，我愿意把这种语言称作塞人（Saka）的语言。此室此外还藏有图版五二那批精美的辫绣，以及木雕的残件（图版五六 m、n），还有图版六一，d 的舍利容器。



文中插图 33　「写本室」上方石窟系统平面示意图，吐峪沟左岸寺院

原书第 18 页

此室在入口右侧设有一张板铺，与之斜对处设有一座颇为讲究的壁炉，从前想必是一位僧人的居室。书籍是否曾贮藏于此，我们不得而知；藏书处更有可能是在该室上方凿入陡直岩壁的那三座洞窟之中：在那里发现了若干梵夹装书叶（pothi），它们原本属于在下面那间房室即「写本室」中所发现的书籍。

这些洞窟共三座，有一个共同的入口，以及两扇位置相当高的窗户，为两侧的房室提供采光，而中间一室则只能经由那道相当低矮的门取得光线。这些洞窟之前有一片台地，在门两侧、略靠门前之处，凿有圆形而浅的孔洞，其中原先或许立有两个柱础。这处建置在照片上位于写本室诸墙之上，并被其半掩，尚可辨认。——

在与清真寺相对的「城堡山」（图版七四，d）上，我们找到了几个颇为精美的小塑像头部；在我们探访的其余寺院中，则未有较重要的发现。

只是还值得一提：在清真寺旁两座窄堵坡中偏南的一座里（图版七四，e），发现了影印于图版五九 t、u、v 的押捺像，以及一块极大的、用苎麻（Boehmeria）纤维织成、仔细叠好的白色布料〔原注 3〕。

〔原注 1：A. v. 勒柯克，《吐鲁番所出古突厥文献》（Köktürkisches aus Turfan），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报告 1909 年第 XLI 号。〕

〔原注 2：参见维尔海姆·汤姆森（Vilhelm Thomsen），《吐鲁番出土的一叶突厥「卢尼」文书》（Ein Blatt in türk. „Runen"schrift aus Turfan），会议报告 1910 年第 XV 号。〕

〔原注 3：该植物纤维的种属，由罗斯托克的科贝特（Kobert）教授鉴定确认。〕